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合读本

39 《栲茧谱》与沙滩三贤实学经世的意蕴 谢孝明

46 铜仁杨氏土司的形成与历史功绩 杨通清

民族文化

52 从《皇清职贡图》说贵州僰人 王 义

58 黔东南侗坛绝技 喻诗涵

60 布依族“搭桥”民俗 岑海燕 王忠寿

沧桑留痕

62 “滇黔锁钥”关索岭 胡应铃

66 省城东大门前的龙洞堡 谷多林

人物春秋

70 李侠公留学苏联的前前后后 李 芳

75 红色特工宋良诚的一段“枉事” 吕金华

封面 秦陵彩绘铜马车

封三 《贵州文化遗产》征稿启事

封底 “平天下——秦的统一”文物展



习近平：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8日下午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专家陈星灿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习近平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习近平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4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要围绕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和学科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

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习近平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积极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为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创造良好条件。

（摘自中国网《文化中国》）



贵州省博物馆隆重推出 “平天下——秦的统一”文物展

文 / 周小炜

说到秦国，你能联想到什么？是兵马俑的气势，还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00年，从一个弱小的西陲之国逐渐壮大最终一统六国。漫长的五百年里，历代秦国君王励精图治，凭借其务实的性格、开拓的精神、包容的胸怀、创新的理念，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王朝——秦朝。这一体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秦始皇因此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2021年初，贵州省博物馆承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9年度“全国十大精品”展览，联合了国内20家文博单位，将“平天下——秦的统一”文物精品展在贵州省博物馆隆重展出。展览内容包含了秦俑、虎符、云梦秦简、凤鸟衔环熏形铜器、两诏文铜权等文物精品，共有展品155件/组。它是在秦始皇兵马俑发现45周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40周年之际，在总结近年“东周时期区域文化系列展”的基础上成形的，向观众集中展示了秦国由弱小部族，历经数百年的经营，成长为统一帝国的漫漫征程。

展览以秦国由弱小部族，成长为统一帝国的漫漫征程为主要脉络，记述秦人历经数百年的经营，抱定一统的雄心，一步步从西

陲向东挺进，历代君王的励精图治，最终成就了天下一统的壮志。通过气势恢宏的展览叙事和独出心裁的陈列设计，展示了秦“由封国到帝国”的发展之路，为您展示一段别开生面的帝国史诗。

故事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家书——云梦秦简中的“黑夫木牍”开始，以两个普通的秦国士兵“黑夫”和“惊”的视角，透过秦楚大战前兄弟二人的对话，回首2200年前的世界。

云梦秦简“黑夫木牍”共计527字，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家信实物，体现了烽火岁月里的纸短情长。这封家书也从多个层面反映出秦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当时正值公元前225年，秦的统一战争已近尾声，大将王翦带着60万秦军，杀到楚国边境，那时候的最大规模的国家级对拼拉开序幕，双方都拿出了全部家底，持久作战，不留后路。在这场战争中，两个来自安陆县的小伙子，一个叫黑夫，一个叫惊，作为秦军兵士，挥戈执戟。“其后，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亡。”

“符”是中国古代常用的一种信物，一般分为两半，两半相合，就能作为办理某类事务的定约和践约的凭证。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即来源于此。杜虎符为左半

云梦秦简家信木牍



符，背面有槽，颈上有一小孔，其上有错金铭文 9 行共 40 字，字体为小篆。该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 50 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许可。作为中国历史上调兵遣将的凭证，虎符起源很早，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虎符就已经开始使用。而且，据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为把持军权，都实行了类似的制度。

在公元前 221 年，秦将王贲破齐，俘齐王。六国皆亡，全国统一。然而，为什么是秦人统一了六国？秦人凭借什么力量完成了统一？为什么布衣百姓会追随秦的统一战争？秦统一后是如何保证帝国政令的通达的？“大一统”政体的创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在《平天下——秦的统一》展览中会找到答案。

秦人祖先在首领非子的带领下，在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一带）过着农业与畜牧业并举的生活。由于善于养马，后被周孝王召至“汧渭之会”专门负责给周王室养马。后来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准许它们在秦（今甘肃省清水县秦厅附近）修筑城邑，从此“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公元前 770 年，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这是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开端。“兼并”与“争霸”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战乱一直持续了 500 余年。在这五百年里，秦国的三十五代国君发奋图强，将弱小、被轻视的西陲小国发展成为实力强劲的一方霸主。虽然其中所经历的艰辛难以言表，但他们的努力最终为实现统一的梦想，做好了“大出天下”的准备。

公元前 770 年（秦襄公八年），秦襄公银率兵救周，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

为诸侯。周王室将“岐（今陕西宝鸡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并准许秦与其他诸侯“通聘享之礼”。襄公“始国”，终使秦这个地处西垂，地不足百里的附庸小国，上升为可与中原齐、晋等强国平起平坐的一方诸侯国。从这两张形势图也能看出，在这短短的百年岁月中，各国的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秦襄公之后的几代秦君，立志要真正拥有周王赐予的“岐陇之地”，于是与戎族各部展开了争夺生存空间的长期战争。

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圆顶山遗址中出土了大批陶器、青铜器等文化遗物，发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秦城和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秦人墓，对探讨秦人早期历史和秦早期都邑的建立等，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公元前 763 年，继位已经三年的秦文公率兵 700 人进行了将近一年的“东猎”，终于在公元前 762 年到达汧水和渭水会合的地方——汧渭之会（在今陕西宝鸡），并在此定居下来。

公元前 716 年秦文公死后，秦宪公继位。为主动向戎人进攻，秦宪公于宪公二年，将都城由汧渭之会迁往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县东阳平村）。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平阳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这对寻找秦国早期都城及了解迁徙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前 659—前 621）秦立国后的第十五代国君。在位 30 余年间，他网罗人才，广纳贤士，大胆任用非秦国之人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史记·李斯列传》）。至此秦国首开客卿制度之先河，广纳人才。在一批贤才辅佐下，秦穆公东征西伐，开疆拓土，极大的扩张了秦的版图和影响力。向东，占领关中东部地区，与强大的晋国争雄，并取得一系列胜利，领地扩展华山脚下、黄河西岸。穆公还积极参与中原各国竞逐，尤其是与强邻晋国，关系密切而又复杂，时而结为婚姻，

杜虎符
金当卢



所谓“秦晋之好”；时而兵戎相见，尔虞我诈。向西，并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秦与晋的关系相当复杂，或相互联姻，或大打出手，或互涉内政，终究是为了一己之利。秦穆公在位期间，也是晋献公在位时期，秦、晋两国通过联姻基本保持友好往来，也始开“秦晋之好”。

秦公大墓是整个秦公陵园中最早发现、唯一发掘的最大墓葬，故称秦公一号大墓，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墓内有 186 具殉人，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椁室中有东周时期葬具等级最高的“黄肠题凑”（“题凑”是一种葬式，始于上古，多见于周和汉时期，汉以后很少用）。

“黄肠题凑”是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堆垒成的框型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的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金缕衣等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用。重要代表：秦公一号大墓、扬州高邮“天山大墓”、北京大葆山广阳王刘建与王后合葬墓规格最高，最宏大。椁室两壁外侧有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

秦穆公去世后，秦国公室内部长期内斗不断，导致国力下降，在与晋的对峙中处于

下风，不断地丢城失地，也让东方诸侯瞧不起，被视为夷狄之类。到了战国时期，秦献公开始改革，力图振兴国运，一度把都城迁到靠近晋国的关中西部栌阳。在献公改革的基础上，孝公决心恢复穆公时期的荣光，颁布求贤令，广招天下志士。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把都城迁到咸阳（今西安市北、咸阳市东郊的窑店一带）。实施了“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衡和建立郡县制等一整套新的政策措施。经过变法，秦国确立了一套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秦惠文王（前 337—前 311）时期，继续孝公的改革之路，秦国日益富强，大批有志之士也齐聚秦国，为其走向强盛出谋划策。惠文王听取张仪“连横”的建议，大破六国的“合纵”之法，迅速提升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使秦国在崛起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 316），秦惠文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将蜀王降为侯，又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治理蜀国。秦采用怀柔政策治理巴蜀，并兴修水利，使得巴蜀成为秦的富庶大后方及兵源之地，为出兵函谷、攻伐六国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不断强大的秦国，已成为东方六国的众矢之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合



秦公铸
凤鸟衔环熏形铜器
商鞅镞

九九乘法表木牍
两诏文铜权
太后池鼎
跪射武士俑



力抗秦，以抑制秦国势力的发展。秦惠王则在张仪的建议下，分别与其他六国联盟，离间他们的合纵关系。秦国的“连横”活动，破坏了六国间的“合纵”，实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为秦最终实现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昭襄王（前 306—前 251）中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之一。他执政期间，秦在与六国对峙中逐渐取得了绝对优势。在七国之间数十年的领土争夺战中，秦国对六国的攻夺一直是主轴，秦昭襄王也就一步步成长为那个时代的霸主。他重用魏国人范雎，将“远交近攻”作为对付六国的总方针；他任用白起等名将，多次打败六国联军，还攻下了楚的都城郢，使秦的领土扩张到了今天的山西、河南、湖北等省境内，甚至到了齐国的大门口。同时，秦昭襄王在位期间派遣李冰作为蜀守，加强对蜀中的治理。李冰建成都江堰，并使巴蜀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同时，秦还设置巴、蜀、汉中三郡，三郡之下置四十一县。为加强对巴蜀的经济建设，李冰兴建成都、郫和临邛三城，开凿广都盐井，在成都、临邛设立盐铁市官，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这些措施使巴蜀地区成为秦国战时最重要的物资储备基地。

此时，秦统一六国的攻势已锐不可当，昭襄王的时代也成为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昭襄王的时代也成为秦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决胜时代。

经过孝文王和庄襄王的短暂治理，在韩国人吕不韦等人的辅排之下，王者之王秦王

政（始皇）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前 247 年，十三岁的嬴政登上王位，二十二岁亲理朝政。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迅速整顿了内部，打掉嫪毐和吕不韦两个政治集团，重用李斯、尉繚、蒙骜等大批名将，迈开了统一六国的阔步。

公元前 230 年—公元前 221 年，先后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最终横扫六合，完成了统一大业。

秦始皇的统一，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不但实现了自秦穆公以来历代秦君的强国梦想，而且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千百年来受到人们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称他为“千古一帝”，而有的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暴君”。不管怎么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了度量衡、货币、车制（交通）、法律、文字等，实行三公九卿和郡县制，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融合和技术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秦灭六国之后，并未停止军事行动，而是继续向南向北推进。向南，派屠睢等领兵 50 万，征服百越；向北，派蒙恬率 30 万大军攻打匈奴，使其退却七百余里。秦帝国的疆域东到大海及朝鲜，西到临洮、羌中，南及广大岭南地区，北至阴山、辽东一带。不但使原来属于华夏诸国的领土归于一统，而且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了版图。新开辟的领



土与设置郡、县加以管理，从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北到今天的秦皇岛，东南到绍兴、南达湖南地区，东到江苏山东沿海一带，并在邹峰山（在今山东省邹城市）、泰山、芝罘山、琅邪、会稽、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等地留下刻石，宣扬秦帝国的政策，歌颂自己的功德。

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还下令，从六国故地迁移大量人口到咸阳、长城和百越地区，一方面削弱了六国贵族的势力，另一方面充实了边区人口，大大巩固了秦对边疆的统治。

秦人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吸收、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并将之创新，以此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具有秦文化典型特征的器物如蒜头壶、茧形壶等。他已不仅仅局限于秦人的故地，而是随着秦人东进的脚步，推广至全国。遍布各地的秦人墓葬，也反映了秦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后产生的多彩文化面貌，可见秦文化其实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秦帝国社会制度的统一，对发展生产和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方面，秦帝国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集百家之长，在冶金制造、数学、化学、堪舆地理和工艺加工等领域，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后来中国科技实力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秦人在由西向东不断征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独特的地域风貌形成了秦人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连年的战争培养了秦人尚武好战、骁勇善战的民族品格，尤其是历代秦国君主广纳人才、博采众长、求同存异等服务于现实的务实精神。秦文化呈现出包容、多元的特征，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两千年过去，秦帝国早已成为陈迹。然而，1974年的春天，它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瞩目。这就是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

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

秦始皇在位时，就着手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把生前享有的权力和财富全都以不同的方式模拟到地下，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地下王国”。象征着秦帝国军队的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随葬珍宝中的明珠！

展览借云梦秦简中的人物“黑夫”和“惊”之口，展示秦人几百年的奋进岁月。通过大出天下、迈向统一、百代秦政三个单元，讲述了从襄公立国、穆公宣志、孝公图强，到惠文王崛起、昭襄王称霸，再到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三十五代国君历经数百年，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的故事。秦始皇创立的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管理体系，对中国后续两千余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为巩固统一而实施的社会治理措施，更是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❶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秦二世诏版
骑马俑

穿越历史赤水河文化

文 / 陈 政

赤水河，因河流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在川、滇、黔三省接壤地区。

赤水河，是中国长江上游南岸较大支流，四分之三流域在大山中，所以赤水河是国内唯一一条没有被污染的长江支流。赤水河河源一带陷穴、暗河极为发育。流域呈桑叶形，支流东南岸多于西北岸。河水清澈透底，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洪、枯流量变幅大，全河总长444.5公里，上游云南境河段长73.5公里，川黔界河三段共长194公里，完全流经贵州境的河段共长126公里，完全进入四川境的下游河段51公里。赤水河在茅台以上为上游，茅台至丙安为中游，丙安以下为下游。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北角镇雄县大湾鱼洞乡之大洞口，上源称鱼洞河；河源向北流数公里后转东流，至洛甸小河口折东北流，经过一段伏流至龙洞河口折东南流，至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折东北流，称毕数河，水量增大，至石关折东南流，至保和河口折东北流，至茅台折西北流（三省界至茅台段为川黔界河），至岩寨折西南流，至古蔺河口折东北复转西北流（沙滩至古蔺河口段复为川黔界河），下行经习水县的土城镇、元厚镇至大群（古蔺县太平镇）折东北流，至金沙折西流，至龙岩小河口折西南流，至大同

河口折东北流，经赤水始称赤水河；至鲢鱼溪流入四川境（大同河口至鲢鱼溪段为川黔界河），至合江城东注入长江，浩浩荡荡。

赤水河，1935年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四渡赤水，导演了四渡赤水这一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英雄河之赞。

赤水河，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水文气候特性，酝酿了茅台、董酒、习酒、郎酒、望谟酒、潭酒、怀酒等数十种蜚声中外的美酒，称美酒河之誉。

赤水河，秦汉时称罽水，流域为南夷君长之一的罽部治邑，故名。汉至两晋，称大涉水、安乐水。东晋称巴涪（符）水；唐天宝十年（715）鲜于仲通征南诏，在为南征造势的檄文中第一次出现赤虺河的称名。赤者，流卷泥沙，每遭雨涨，水色浑赤，河以之名也。虺指毒蛇，浑赤的河水中处处有毒蛇出没。其实，赤虺河的虺字，喻指赤水河惊涛雷吼的赫赫声威。明洪武十五年（1382），在四川叙永置赤水卫，改赤虺为赤水。杨升庵诗中说：“君不见，赤虺河源出于芒部虎豹之林。猿猱路，层冰深雪不可通，十寻健木撑寒空。明堂大厦采梁，工师估客穿蒙笼。此水奔流飞箭，缚筏乘桴下蜀甸。暗淡滟滩险倍过，海洋流沙第一线。

谁驱乌鹄驱鼉鼉，波涛旋回息盘窝。柏亭云屏济川手，奠民枕席休干戈。安得休为夷庚道，镌刻灵陶垂不磨。”古芒部辖治很大一块地盘，出芒部是泛指。与杨升庵同时代的吴国伦也有一首《赤水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恐惧的、避之忧恐不及的情绪。诗云：“万里赤水河，山深毒物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桔穿怒石过。郎即今莫渡，不只为风波。”此外，《古蔺县志》载：“曾称齐郎水，枝溪”。《仁怀县志》载：“清曾一度称仁怀河”。《习水县志》载：“《太平寰宇记》和《四川通志·山川门》称安乐溪、小江；有的河段曾名斋郎水（古有苗斋郎居此，故名）、仁水、之江等”。《合江县地名录》载：“《名胜志》中称之溪”。赤水河，是一条穿越历史赤水河文化史书。

赤水河，源头所在《新纂云南通志》记载：“赤水河源出镇雄东北三十里，诸河既会，称赤水河。”1986年，几位贵州学者溯赤水河上游考察，确认赤水河源出镇雄县的场坝镇安家坝村与罗汉林村（罗汉村）山箐。以《镇雄县志》为准，赤水河，源出镇雄县境西南场坝镇豆戛寨山箐，由西南流向东北。

赤水河，流域水文工作开展较早，1941年导淮委员会治河工程局在干流上茅台、赤水设水文站，为整治滩险而设淋滩等19个水位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贵州省水文总站在干流恢复赤水、茅台水文站，新建赤水河水文站和大河水文站，有3—38年实测水文资料。山区性质的河流，洪水暴涨暴落，峰高历时短。流域气候地域差异较大。上段三岔以上为暖温带高原气候，气温稍低；中下游四川盆地丘陵地带，则具有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的特点，河谷内气温较高。

赤水河，水利资源丰富，尚待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赤水河干流由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管理，支流由地方水行政机关管理。国家有关部门

和川黔两省对赤水河的保护、治理、开发，作过多次调查、研究及规划。

一、古人类的发祥地

赤水河流域是中国南方远古民族的发祥地之一。1971年曾在桐梓县九坝紫山岗南麓发现“岩灰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后又在习水县土城发现磨制石器（石斧）；保存有自秦、汉起的古代文物，如岩墓、摩崖碑刻、石窟寺等。

鰼国，是地处赤水河流域，在历史著作中很少记载也缺乏研究的一个古代国家。鰼，最早见于《山海经·北山经》：“涿光之山，器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鱼，其状如鹄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其音如鹄，可以御火。”鰼鱼，传说中一种会飞的鱼，龙头鱼尾。《尔雅》说鰼为鱼龙。郭璞《尔雅注》：“今泥鳅也。”《辞源》《辞海》均释鰼是鳅，即泥鳅。鰼人、鰼部、鰼部水、鰼国皆因鰼鱼而名之。古鰼鱼是鰼人的图腾，灵物。鰼部，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江通鰼部。”鰼部水，最早见于《水经·江水篇》：“江水东过符县，北邪东南，鰼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酈道元《水经注》：“鰼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其鰼部之水，所未闻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鰼国：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有记载：“鰼，国名也。”关于鰼国的来源，《鰼国·姓·鰼部·习水》说：夏禹划天下为九州，今贵州习水境域属梁州西南徼。鰼人（又称）部落经过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和奴隶制社会，占着独特的生存空间，即长江南岸赤水河、习水河和桐梓河的天然屏障，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到商周时期，鰼人部落已十分强盛，周武王伐纣，包括部落在内的巴蜀八大部落出兵助其成功，武王为褒彰“巴师勇锐”，封为屏藩——鰼国。据周春元等编著的《贵州古代史》对鰼国的考证：鰼国，大约存在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308年之间。国的称谓源于西周，

当时诸侯称国。《周礼·天官·太宰》“以佐王治邦国”。据历史记载，西周灭商以后，实行分封制，分给功臣封地或食邑，称为国。鬲国正是这时期产生的。古鬲国不在大夜郎范围。《贵州历史笔记》说：“今德江、正安以北是古巴国的南境，绥阳、遵义、桐梓一带属于鬲国，习水附近归鬲国。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说：“考牂牁古国，见于《管子·小匡篇》，在躡前四百余年。又，既云改且兰为牂牁矣。”牂牁古国远在牂牁江流域，今习水不可能属之，古鬲国与之并存。《遵义府志》的《建置》说：“鬲部水，即今仁怀赤水。然则仁怀为古鬲部地。汉之称鬲部者，或秦前有鬲国欤。”其中说的仁怀，包括今天的仁怀、习水、赤水等地，主要区域是习水一带。据此推断：在习水这块土地上，秦以前曾经建过鬲国，它的范围大致是今习水以及比邻仁怀、赤水，古蔺、叙永、合江、江津、綦江、桐梓等县市交界地区，可能还包括遵义、绥阳、道真等地区。随着历史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庄躡入滇灭且兰、夜郎与滇诸国，西汉在夜郎故地建牂牁郡，拆鬲部县置平夷县，隶牂牁郡，但是夜郎国已经不存在了。后来先后沿用“夜郎”这一称谓设置的夜郎郡和夜郎县，也未包括古鬲国地域。

二、神秘的丝绸古道

赤水河，勾通川黔两省物资交流重要水道之一。贵州省食用川盐及生产竹木，煤炭，多靠赤水河输进运出。流域东部桐梓县一带有含量较丰的煤炭和硫以及造水泥用的石灰岩等矿藏。存在南方丝路古道。南方丝路古道也称“蜀身毒道”，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为先秦至唐宋以四川成都为起始地通往南亚、东南亚的总体上呈南北走向的商贸通道系统。

赤水河历来就是川、黔间大宗货物运输的重要水道，航运早兴，清代曾称为怀河。自清乾隆年代起经过整治滩险，小型木船可

分段上行至金沙县老虎滩。建国后，经两次大规模整治和设立绞滩站，赤水市以下已可全年通航120吨机轮和4×150吨拖轮船队，赤水至二郎镇可季节通航10-25吨机轮，二郎镇至茅台镇白洋坪可季节通航10吨机轮，常年通航5-10吨木船。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认识，南方丝路古道总长200公里，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荃经）、旄牛（汉源）、越嶲、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樊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市）、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主要有两条线路就意味着还有其他路线；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地理、人文情况都会发生变化，交通路线应该是呈蜘蛛网似的，南方丝路一定还有因记载疏漏而被人们遗忘的古道。那么，张仪、司马错、唐蒙、司马相如等这些曾经经过这里的历史人物，行走的究竟是哪条路？

赵永康先生多年来坚持对南方丝路古道进行探索。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合江县陆续出土了一批汉代画像石棺，再现了汉代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2000年在川黔故道上的合江县榕右乡，发现了《唐代商队人物群像》等摩岩，其中有胡人，说明晋唐年间这条古牂牁道依然畅通，而且古代胡人早已通过这条古道进入泸州。根据典籍记载、考古新发现，围绕探索西南丝绸之路的遗踪这个论题发表了多篇论文。认为经过赤水河这条商路，有可能就是学者们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西南丝绸之路。新发现的汉棺、摩崖为西南丝绸之路穿过这一地区提供了证据。古代商旅行人往来和物资运输主要依靠水运。从成都经岷江到宜宾入长江，过泸州到合江转赤水河进入贵州，转牂牁江（即北盘江），再转红水河、西江，可以直到广

州。从广州沿珠江出海到交趾和印度，一路水运，远比走从云贵高原翻山越岭、穿过缅甸而去印度，要方便得多。这条“牂牁古道”，当时已由唐蒙开通，走这条路，遭受劫掠的可能性，远比穿越云贵高原为小。出土的《王母御舟图》和《王母王公六博图》等文物都说明，汉代合江，水运已经比较发达。在以水上交通为支撑的古代，赤水河无疑为秦国将士负辎重而行解决了交通难题。由“兵道”身份，逐渐演变为和平时期的商道。据史学界初步考察，证明赵永康先生对南方丝路古道的探索是基本正确的。在西南川黔的密林之中，很可能还存在着一条神秘的“西南丝绸之路”在赤水河这一带，古代有着很多原始部落，而又处于大山之中，所以遗留下来的文献史料并不多，但实物不少。

三、最著名的美酒河

赤水河，世界最著名的美酒河。两岸民间自古酿酒。《史记》载有公元前135年唐蒙到此闻枸酱事：“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出窃市夜郎’”西汉年间赤水河就酿造出令汉武帝“甘美之”的赤水枸酱酒。赤水河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水文气候特性，酝酿了茅台、董酒、习酒、郎酒、望驿台酒、潭酒、怀酒等数十种蜚声中外的美酒。《仁怀厅志》于是有“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菹酱知何物，赚得唐蒙罽部来”一诗。抛开神奇的传说不提，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上最早记载赤水河畔有“枸酱”，《说文》：“酱，也，从肉从酉，酒以和酱也。”有学者认为，“枸酱”是一种用拐枣加入粮食酿制的酒，是当今酱香型白酒的原版，称之为原始茅台酒。

赤水河，乃中国白酒地理之酒核。流域内以农业生产为主，酿造业尤为发达，仁怀市茅台镇是有国酒美誉的茅台酒的生产基地，遵义市董公寺镇是中国名酒董酒的产地。以事实辅证：一条赤水河全长500公

里，不出百里必有好酒，流经地域出产了以茅台为首的大小数十种名酒，占中国名酒的60%。以赤水河为核心方圆500公里内汇集了大量名酒，除了赤水沿岸的茅台、郎酒、习酒外，向北沿长江沿岸为浓香酒的代表五粮液和泸州老窖，再向北到四川绵阳、射洪，汇集了沱牌曲酒、剑南春、全兴大曲，还有水井坊来源华夏酒报、天号陈，绵阳有丰谷酒，平昌有小角楼、江口醇，邛崃有文君酒、邛酒，万州有诗仙太白酒。往南到贵州安顺、都匀一带，则囊括了镇远青酒、都匀匀酒、平坝窖酒、安顺安酒、金沙窖酒、贵阳大曲、兴义贵州醇，向西至遵义则有董香型的董酒。“集灵泉于一身，汇秀水而东下”的赤水河畔，从来就不缺乏美酒的故事。赤水河是一条美酒飘香的河，它是中华民族有史记载最早酿造美酒的地区，并因出产茅台、郎酒、习酒等美酒琼浆，而被称为中国最后一条没被污染的生态河。茅台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产自茅台的所有美酒中，最好的当数被后人以地名冠于酒名的茅台酒。在今天林林总总的中国传统白酒品牌中，茅台酒理应是历史最为悠远、品质最早享誉中外的名酒之一，郎酒、习酒的历史和文化也很悠久，影响也不小。酿制茅台、郎酒、习酒的用水主要是赤水河的水。赤水河水质好，用这种入口微甜、无溶解杂质的水经过蒸馏酿出的酒特别甘美。在过去，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揭示赤水河为什么产美酒。赤水河畔悠远的酿酒历史，茅台地区特殊的气候、水质，独具匠心的酿酒工艺，早为古人所知并加于总结。被梁启超誉为清代“府志第一”的《遵义府志》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用纯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纳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黔人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这足以见证当时生产的规模和用料、工艺的讲究。

赤水河区域盛产酒，酒伤肝，赤水河区

域就有护肝的灵药赶黄草。赤水河乡民，人人善饮酒，然而该地区肝病发病率却极低。这一现象引起了肝病学者的关注。原来是当地广泛野生的赶黄草具有令人吃惊的解酒功能。赶黄草是载于《救荒本草》的一种药用植物，含有的没食子酸和槲皮素等成分均为已知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和保肝作用的有效成分。

四、独特的民族文化

赤水河，流域为典型少数民族地区。有近千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50万左右，约占25%。神奇的是，全国共有56个民族，而居住在赤水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中，就有仡佬、苗、侗、满、彝、回、布依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特征形成了赤水河流域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

赤水河流域的民族蜡染文化值得一提。蜡染文化是夜郎古国文化的一块瑰宝，闪亮于赤水河的古老岁月。《后汉书·南蛮列传》记载：“织绩木皮，梁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志》《溪蛮丛笑》《南史》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明清以后，有关的记载就更多更详了。明代《嘉靖图经》：“西南苗，妇女画蜡花布。”《黔中记闻》：“仡佬有斜纹布，名顺水斑。”这些记载说明赤水河流域的民族蜡染，开始于秦汉以前，发展于唐宋时期，盛行于明清年间。赤水河流域的民族蜡染是当地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的一种传统印花染色方法，古代称蜡缬、蜡幔，当地少数民族叫蜡花，尤以苗族人民使用最为普遍。

赤水河流域有许多群众喜闻乐见、融健身娱乐为一体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在首批列为遵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83个项目中，就包含有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竞技类8个：仡佬族高台舞狮、打篾鸡蛋、独竹漂、抱蛋、打欢喜团、采月亮、五马棋、余庆龙灯；民间舞蹈类4个：黔北花灯、矮人舞、仡佬族踩堂舞、打杯舞。还有许多深受当地居民喜爱的一批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和

民族体育项目，如芦笙舞、摆手舞、唢呐、锣鼓、竹马、脚竹杆舞、滚山珠、爬花杆、打陀螺、打钱杆、走高跷、扭扁担、比竹笛舞，等等。独竹漂发源于赤水河流域，原是当地人的水上交通方式。1998年在赤水复兴马鞍山发掘的汉晋时期的古崖墓群中，有一座墓穴的石棺壁上，就有一幅一人双手持竿立于一独木上的石刻图案。后有诗云：“茅台斜阳映赤水，残阳几叶贩酒船。独竹飞流飘然过，纤夫逆行步步难。”独竹漂后来逐渐发展为赤水河流域的一种独特的黔北苗族民间绝技，并成为少数民族的娱乐、比赛项目。要求运动员脚踏直径约20厘米、漂流在水面上的单棵楠竹，手执一根细竹竿为“桨”，左右点水、保持平衡、破浪前进，以耗时最少者为胜。“赤水独竹漂”被列入贵州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类似蜡染、独竹漂这样的赤水河民俗文化，见证了赤水先民勤劳智慧的历史，也是赤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鲜活物证。

五、毛泽东得意之笔

毛泽东在1960年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我的最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川黔边境时，曾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众所周知，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不得已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大转移，即长征。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当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

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整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长征。当时摆在红军面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数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追击、堵截和包围，红军能不能打破这种极端严峻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在云贵高原展开了灵活的运动战，其中最突出并成为经典战役的就是“四渡赤水”。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红军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在此转危为安，造就赤水河名满天下，赤水河也因此在红色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和渡口。一渡赤水。1935年1月29日，从贵州土城、元厚渡口过河，进入川南古蔺。二渡赤水。1935年2月18日至20日，从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三个渡口过河，折回贵州。三渡赤水。1935年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渡口过河再次进入古蔺。四渡赤水，1935年3月22日，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过河，从此长驱北上。现太平渡口、二郎滩渡口于1981年经四川省文化局批准，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长征途中，曾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至习水县土城间四渡赤水河，迂回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尾追堵截，扭转了战局，继续胜利前进。在四川省古蔺县当年渡江口岸之一的太平渡，建有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纪念馆。

六、古盐道四大口岸

赤水河，为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贵州素不产盐，自古以来民众食盐均靠从周

边产盐省份输入，主要行销川盐、淮盐、粤盐、滇盐，并以川盐产地距贵州最近，又有通过长江联结永宁河、赤水河、綦江、乌江等水道的交通运输之利，而成为在贵州销区最广、销量最大的食盐。田雯《盐价说》记道：贵州食盐“仰给于蜀，蜀微，则黔不知味矣。”因受交通制约，运入量小，盐价甚高，其价以谷计，“谷日贱而盐肯平，十钟不易一豆，”人们食盐甚艰，“当甚匮也，代之以狗椒”，“即遇其饶，也止沾唇而量腹”。直到清乾隆年间赤水河经过整治以后，川盐通过这里源源不断输入黔省内地，贵州各地盐荒问题逐渐得以缓解，同时，由于川盐通过赤水河中下游地区，推动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快速发展，使之很快成为贵州古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地区之一。

清永宁道赵藩有诗评述：“亦是故乡水，源从芒部来，蜿蜒腾赤虺，疏凿谢黄能，客路层峦转，人烟对岸开，蜀黔交错地，水藿劫余灰”。明末奢安之乱后勘定为川黔界河，自此即成为四川与贵州疆域的天然界线。是时，因巨石蜃岩，耸峙中流，万仞之山，壁立两岸，滩高浪激，势险路纤，不能通航。清乾隆十年（1745）当局因滇黔铜铅每岁由陆路转输，节节皆崇山峻岭，鸟路羊肠，驼载艰难，运费浩大，且黔省不产盐，须从川省肩挑负运至贵州猿猴（今元厚）转贩，始定疏凿，开通河道。上游白天鼓岩（赤水公社境内）至兴隆滩（新华公社境内）一段共27滩，经初步开凿，费时一年有余，支银万两以上，能通航之地仅鱼塘河至兴隆滩及二郎滩至太平渡口两段可行小木船，而天鼓岩至鱼塘河一段由于河身狭窄，沿河各滩乱石堆积，水势陡险，仍不能通航，兴隆滩至二郎滩一段，其中心蜈蚣岩（亦称无功岩），俗称十里长滩，水深，滩险，岩如刀削，船不能过，至1949年仍未通航，运往上游的土特产和川盐均靠人力背运过山，其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终年均以背过山盐为生。解放后，（下转第29页）

雷山县创建系列博物馆概述

文 / 潘定发

2017年1月，中办和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雷山县创建系列博物馆工作进行概述。

一、创建系列博物馆的目的

雷山县党政领导通过学习上级指示后认识到：博物馆是了解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最佳场所，是促进各地文化交流，增进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机构，它通过收藏有限文物把文化遗产安全的交给子孙后代，为乡村振兴、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焕发精神文化力量。博物馆作为陈列、研究、保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实物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机构，被称之为“物化教育”或“直观教育”。这些藏品作为直观教材，对大众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机补充。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时代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实物见证，蕴藏着时代的历史文化知识，是民族精神的命脉，情感的源泉。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设立了每年的5月18日为“国际

博物馆日”，每年分别确定一个主题，例如：1992年是：“博物馆与环境”，2002年是：“博物馆与全球化”，2006年是：“博物馆与青少年”，2016年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2018年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2019年：“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这一主题的涵义是对博物馆的作用有了新的诠释，是文化的中枢。将聚焦博物馆作为社区活跃参与者的新角色。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不同于过去静止不变的机构，当今的博物馆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变得更具交互性，以观众为中心，以社区为导向，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和可移动性。它们成为了文化中枢，是创意与知识相结合的平台，观众可以共同创造、分享和互动。

雷山县党政领导通过学习认识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后，人们从博物馆中发现历史进程中的必然规律。突出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重要作用，它是是连通社会生活、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的纽带。人们通过参观、观赏来认识其文化源自远古时代，又代代传承生生不息，以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爱自己家乡的热忱，从而提高全民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心。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指出：博物馆中的“文化遗产”会进一步变为改善民生的力量，因为文化生活也是民生的重要部分之一。历史和祖先如今赋予了我们这一责任，我们不能只固守我们的文化，也应该创造我们的文化”。

二、创建系列博物馆的简况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上级党委的重视和各职能部门的推进下，在省、州文物局和博物馆、文物局、省州苗学会、省民族文化学会专家学者的业务指导下，历届中共雷山县委、县人民政府，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发展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带领各族有识之士，整合各方资源和资金，先后建立了“郎德村寨露天博物馆”等下述博物馆（院），分布在县城和四个乡镇。她们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了旅游业与博物馆联手共建是当今开发旅游休闲娱乐与传播历史知识的最佳结合方式，也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要求。

现将各馆（院）收藏、陈列、展览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郎德村寨露天博物馆”。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由省文化厅重视支持创建起来的。之后，又逐年获得各级文化、宣传、旅游、财政、交通等部门的资助。它的特点是没有封闭的空间、橱窗、声、光、电等科学装置，而强调以山、水、田、林、路、民居、历史文物遗址等原汁原味的村寨村民优美的自然生态生活环境、淳朴的生活方式、远古的民风民俗，奇异美丽的苗族服饰和歌舞全部向国内外大众展示。1993年10月郎德上寨被录入《中国百座博物馆志》，1998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百座特色博物馆”之一，2001年6月获国务院以“郎德上寨古建筑群”为名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化部、国土经济学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先后给郎德上寨授予“中

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景观村落”等文化品牌称号。2008年6月13日，北京举行的第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起跑仪式，黔东南站就在郎德上寨的苗寨芦笙场举行。被誉为最精彩的路线段，再次向全国内外展示美丽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苗族风情的魅力。

（二）“方祥稻作博物馆”。是在2007年初，由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加拿大基金会资助建馆、方祥乡人民政府承办，雷山县苗学会协助建立。展馆设在方祥小学教学楼内，省人大原副主任、贵州省苗学会会长杨光林题写馆名。目前馆藏品种有：乡辖九个村落历史沿革、农耕稻作程序、稻作器具与习俗、稻作文化现象和流程简介、生产生活用具、节日、歌谣、资料、芦笙乐器、服饰、银饰品，瓜、菜、豆类、高粱、小米、黄豆、小麦、稻谷种类标本与其传统到改良变迁的文物、史料共数百件。从中感悟到苗族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轨迹和社会活动，以及民族感情与宗教信仰等。

（三）“西江苗族博物馆”。该馆的成立于2008年初。系因贵州省第三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第一届“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摄影展、第二届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主会场联合设在西江举办的契机，省委、省人民政府纳入建设项目，投入资金400万，建成干栏式吊脚楼一楼一底的博物馆，建筑面积1700平方。馆址在西江景区平寨中心区。展馆设有：综合厅、历史文化厅、生产习俗厅、生活习俗厅、节日习俗厅、原始宗教厅、建筑技艺厅、医药与体育厅、服饰与银饰厅、歌舞艺术厅、苗学研究与语言文学艺术厅。现藏品共有4500多件文物、图片和详情资料。于2008年9月26日开馆。此外“多彩贵州”音乐创作基地、摄影采风基地同时在西江挂牌，给这个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西江千户苗寨”增添了苗文化特征符号和品位。是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缩影，它涵盖苗

族悠久历史，突出农耕文明，凸现祭鼓节庆，演绎干栏式建筑风格，弘扬苗族科技成果，尊重原始宗教，铺陈苗族巫教巫术。让后人聆听到苗族祖先的迁徙足迹，透过时空看到苗族的过去与未来，观赏与评价苗族的发明创造与业绩。

之前，西江苗寨还有24户村民按照文化遗产保护评级标准在自己家里建立了“家庭博物馆”，其中有6户被文化部门授予“一级家庭博物馆”称号。形成了人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户户都是文化遗产管理场所的良好氛围。

（四）“雷山苗族银饰刺绣博物馆”。坐落在美丽的县城苗族银饰刺绣一条街，是县人民政府投资建立。该馆于2007年动工，2008年竣工，2009—2010年县里先后投入资金300万元征集实物。于2010年11月9日“雷山苗年节”举行开馆仪式。省人大副主任顾久、省人大原副主任、省苗学会会长杨光林、省文化厅机关党委书记罗运琪、省民委副主任刘晖、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画派联谊会主席刘文西等出席并剪彩，刘晖副主任宣读省民委关于同意设立“贵州民族博物馆雷山银饰刺绣博物馆”的批复。

博物馆设序厅、历史厅、动态服饰刺绣厅、旅游资源厅。所展实物有图片、文化内涵释义、绣片、背带，成套服饰刺绣品、成套银饰品、银具、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作传承人名录及所获的奖杯、荣誉证书等数百件，内容含盖国内苗族各支系的各种（类）藏品。该馆采用现代科技展示手法与传统活态演示方法相结合，通过灯光、浮雕及造型雕塑，将苗族银饰刺绣文化有关的一系列符号文化与神话传说进行集中展示，营造一种古朴、悠远溯源的氛围，充分揭示了苗族银饰与刺绣的文化主题。

（五）“郎德非遗博物馆”。座落在郎德苗寨景区大门的步行街，是县人民政府投资建立。该馆于2016年7月建成并对外开放。馆内将所获批的各级非遗项目名录：配实物和图片及文化内涵释义一一陈列展示。

这些名录分别是：国家级（13项）：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苗族芦笙制作技艺、苗族银饰锻造技艺、苗族织锦技艺、苗族刺绣（缂绣）技艺、苗族鼓藏节、苗年、苗医药·骨伤蛇伤疗法、苗族飞歌、苗族铜鼓舞、苗族芦笙舞、苗族贾理和仰阿莎曲艺。省级（15项）：嘎百福曲艺、苗族吃新节、苗族三月坡、苗族扫寨、苗族招龙、苗族酒礼歌、苗族服饰文化、苗族古瓢琴制作技艺、苗族古瓢舞以及2019年6月增加的苗族箜篌等6项。州级（19项）：苗族木梳制作技艺、苗族米酒酿造技艺、土陶瓷器制作技艺、苗族祭岩妈岩爹、苗族婚俗等……还有400多项县级非遗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郎德非遗博物馆”展陈栏目主题，有的是平面铺陈，有的是立体叙述两条主线，释义写作突出文化的先进性、科研性、历史性、民族性。从社会文明进程与科学技术发明、应用、推广、普及的角度，点明文化精髓、画龙点睛，立足于辞条化解释或诠注。

走进郎德非遗博物馆，你会感到苗族历史的久远，苗族心灵的美丽。当历史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形态沉积下来的民族智慧瑰宝，才能绽放光芒。

（六）“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是一所新型文化创智的博物馆。坐落在西江镇东引寨一苗家四间屋内。2016年2月创办，主营部门为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根据研究院和景区达成的合作协议，5月初完成了机构设置和团队的组建，先后聘请了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孙久霞教授、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吴忠军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苍铭教授、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汪文学等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和行业部门领导为主组成顾问团队，还先后聘请了中央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学院、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等多所学校的10多专家、学者作为本院的研究员。于同年11月5日举行揭牌仪式暨“首次旅游扶贫与

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论坛”。院长李天冀（西江籍人士、贵州民族大学教授）主持，与会者来自广西、北京、山东、江苏和省内多所学校及科研单位近百名学者参加，积极为西江未来发展建言献策，提供智慧。

目前，研究院内专家承担有《苗族古经采集整理研究》《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西江模式”研究》《苗医理语言文字基础及术语规范化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研究院秉承：“学术本位，文化传承，旅游创意”的目标定位，围绕民族地方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将研究院建设成为苗文化挖掘、整理、研究开发的学术高地，成为展示、传承、弘扬苗族传统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的新型创智平台。

（七）麻料村银绣博物馆。在国务院扶贫办与国家文旅部办公厅和2016年成立的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以及雷山县有关部门的推动下，西江镇麻料村建立了全国第一所银匠免费培训学校和麻料村银绣博物馆，与苏州工艺美院、凯里学院等多所高校合作建立相关专业学生的工艺课程实践基地。2018年4月26日，雷山县西江镇麻料村迎来了银绣博物馆开馆仪式。这标志着享有活态体、购、游的博物馆正式向游客免费开放，全国第一所银饰刺绣工艺学校也由此诞生。

当天就有大批游客到来，麻料银匠村正式开门迎客，该村从传统的银饰加工业步入加工与旅游相结合的时代。麻料村百匠银器农民专业合作社董事长李林书说：“我们村的博物馆既是银饰刺绣馆，也是银绣培训学校，我们村的银匠绣娘培训学校还是全国第一所银绣免费培训学校”。这个博物馆兼学校的综合体，集银绣精品展示、理论学习课堂、锻造加工车间、旅游商品购物、苗族歌舞表演于一体。

麻料村位于西江西北部，全村总面积为3.71平方公里，距西江景区13公里，雷山县城53公里。全村有183户，806人，80%的村民都是银匠和绣娘。

三四百年前，这里就以精致手工银饰制作在省内外颇为盛名。那时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银饰产品只靠游走形式加工销售，类似古代的行商。2006年5月，苗族银饰锻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麻料村的手工银饰享誉国内外。2009年初，麻料村就凭借底蕴深厚的银饰文化传承，被中国美术工艺协会评为“中国银饰之乡”。

2017年8月，麻料村两委成立了麻料村银饰公司，全村入股近100万元股金发展公司，同时申请58万元扶贫资金建起了银饰博物馆，重点以利益链接的方式惠及47户贫困户，带动全村群众就业创业，抱团壮大村集体经济，撬动乡村旅游发展。

据麻料村银绣公司董事长李林书介绍，公司正式运营之后，将充分调动全村银匠的积极性，鼓励大家返乡创业，统一加工订单，同时有计划地让懂加工、会经营的到全国各景区景点销售，树造品牌，做大做强银饰文化产业。

在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发展上，公司将推出系列旅游产品：一是诚邀全国银饰锻造爱好者，前来麻料村学习切磋技艺，让百年银饰技艺非遗全球共享；二是丰富银饰体验内容，除了理论课堂20分钟，车间作坊40分外，还增设麻料老人故事会20分，苗语、苗歌、苗舞激情互动20分。此外，根据天气情况配套野外徒步钓鱼、捉鱼、烧烤、野炊、干农活、露天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

据悉，麻料村通过“合作社+公司”的模式来带动村民的积极性。“目前我们的产品大部分是销往西江与黄果树居多，多以展销进行银饰的销售。但现在是在网络的时代，最近我们还正在筹划一个电商的平台，使我们的银饰可以远销一二线城市。”麻料村银绣董事长李林书信心满满说。

据李林书介绍，麻料村银饰公司年底分红按照入股的比例来进行，50%的纯利率用来作为公司发展的资金；20%用于公司的管理运营；剩下的30%中有24%是股东分红，

剩余的6%专业扶持贫困户。公司正式运营之后，将充分调动全村银匠的积极性，鼓励大家返乡创业，统一加工订单，同时有计划地让懂加工、会经营的到全国各景区景点销售，塑造品牌，做大、做强银饰文化产业。据统计，2018年，麻料村户均增收2.7万元，比2017年收入增加50%以上的有11户，增加20%以上的有39户，增加10%以上的有49户。

此外还分别于1988年创办“陶尧苗族语言文字陈列馆”、2010年5月建立了吉水寨水书博物馆、2014年10月4日成立“大塘苗家大院文化苑”、2017年11月26日成立“报德苗学书院”和2017-3-29建立阿幼民族文化博物馆。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记述。

三、创建系列博物馆的成效

雷山县上述博物馆（院）与社会教育，并依托旅游业的发展热潮，正逐渐延伸出“博物馆+民族旅游产业”的独特运营方式，成为具有独特魅力的知识型旅游产品。并发挥着“物化教育”作用，以此激发人们爱家乡、爱祖国的热忱，从而提高国民做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心。

历经20多年的时间，由于有上述各博物馆（苑）的相继建成，为雷山县打造乡村旅游，增添了文化品位，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参观考察，拉动旅游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雷山是苗族前几次大迁徙的聚集地，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4%左右，分布居住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区域内的300多个苗寨，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音乐、舞蹈光彩夺目，被誉为“苗族文化展示中心”，因此，先后获得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和国家有关部（委）旅游组织评为“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中国旅游王牌目的地”、“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贵州省十大影响力风景名胜区”，2011年和2016年中央文明办分别给雷山授予“全国文明县城”和“全国卫生县城”等

荣誉称号。此外，雷山还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3项、省级15项、州级19项，县级400多项以及有68个村寨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获得国家级名录最多的县城之一。雷山凭借绿色生态和苗文化资源两个宝贝而成为最具诱惑力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乡村旅游目的地。所以，于2016年2月获国家旅游局列为第一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据县旅发委统计，2019年全县旅游接待总人数达1321.95万人次，综合收入118.97亿元。取得这些实绩，与建立上述各博物馆（院）是紧密关系的。从上所述，博物馆无疑是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最佳场所，其历史价值在于贯通古今而惠及长远，通过有限实物和事实，展示人类的足迹。对当代人来说，守护文化遗产的命脉是责任，把文化遗产安全地移交给子孙后代是应尽之责，胸怀历史，传播历史，获得历史的功名，才是真正人文学者的眼光。

雷山县委、县政府为强化博物馆（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将“西江苗族博物馆”和“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升格为正科级单位，并增加配备专职馆员，实施馆文物的修复计划。其余馆苑均选定专人负责管护。要求进一步加强博物馆（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雷山县苗学研究会）

国宝南迁与安顺华严洞

文 / 杜应国

故宫博物院，是北洋政府时期因军阀混战而催生的一朵奇葩。

故宫实即紫禁城，就是原满清皇帝的居住之所。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被推翻，但按当时革命党人与清廷订立的清帝退位条件，即所谓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还保留皇帝称号，每年还享受着民国政府拨付的400万两银子，供养着维系其小朝廷存在的一班人马。其中，还特意规定逊清小朝廷须从紫禁城搬出，迁往颐和园居住。但此后，民国政府陷于战乱，溥仪等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故宫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故宫，并由此催生出了后来饮誉世界的故宫博物院。不过，其诞生过程却颇具戏剧性，足可谓一波三折。

一、一波三折 举步维艰

1924年10月，原属直系的冯玉祥，因不满贿选总统曹锟的统治，在奉命开赴前线途中，突然回师京城，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并将一直居住在故宫的溥仪小朝廷驱逐出宫，废止其皇帝称号。随后，临时执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清室善后

委员会”的组织，负责清点宫内公私物品。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有汪兆铭、蔡元培、鹿钟麟、张璧、绍英等14人。他们的主要任务，实际是对原清室以国家名义保存在故宫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损。

以清理后的清室留存文物为基础，1925年10月10日，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紫禁城宣告成立，同日对公众正式开放。

初期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以负管理之责。董事会成员包括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等。另选李煜瀛、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等组成理事会，推吴瀛为理事长。院以下仅设图书、古物两个馆，任命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易培基为古物馆馆长。

仅仅三年，故宫博物院忽又命悬一线。

1928年，忠于孙中山的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彻底终结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新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将北京改为北平，随即派人接管了故宫博物院。此时，身为国府委员的经亨颐却以故宫文物属遗产为由，

提出了一个“废除故宫博物院，将其物品分别拍卖或移置”的荒唐议案，并获国民政府通过。将清室以国家（朝廷）之名占有的历代宫藏，视为一人一姓所得之私，此说之谬，竟能瞒天过海，幸有张继、易培基、马衡、吴瀛、沈兼士等有识之士出面活动，大声疾呼，又得部分有力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支持，经亨颐提案方被重新否决，故宫博物院终得保存。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再次确认故宫博物院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同时组成一个包括政军文各界名流在内的37人理事会，负责对故宫博物院进行监督和管理，推李煜瀛任理事长。1929年2月，正式任命易培基为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院以下新增文献一馆。任命易培基兼古物馆馆长，马衡为副馆长；张继为文献馆馆长，沈兼士为副馆长；庄蕴宽为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李宗侗为秘书长；俞同奎为总务处处长等。

然而，又发生了一件要求拍卖故宫文物的荒唐闹剧。

1932年8月，因“九一八”事件后，日寇步步紧逼，国势危殆，北平政务委员会特意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保护好故宫国宝。詎料会上竟有人提出了拍卖故宫文物，以购买五百架飞机抗敌的荒谬建议，并形成了决议。幸亏易培基等博物院领导四处奔走呼吁，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此事方得以平息下去。

1933年，首任院长易培基因所谓故宫盗宝案而蒙冤去职，马衡先生临危受命，被任为代理院长（1934年实授院长）。马衡上任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故宫国宝的南迁。

二、烽火狼烟 国宝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距东北仅数百公里之遥的北平处于危险之中。国民政府几经考虑，决定将包括故宫文物在内的北平重要文物转移至内地保存，史称“国

宝南迁”。

未料，此议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对文物南迁很不理解，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不同阶层的强大反对派阵营。他们认为，文物虽然重要，但国难当头，如此重物轻人，优先迁走文物，不仅是动摇民心，甚至是置国土和人民安全于不顾。而且迁移途中，难保文物不会遭受毁损，由此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也有部分市民担心，文物一旦运走，就再难归返北平——这也是部分普通民众之所以反对文物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反对派不仅声势汹汹，广发言论，而且，以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为首，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的组织，声言要用武力阻止南迁，并时常以恐吓电话威胁主张文物南迁的人士，乃至部分故宫博物院同仁。

尽管如此，在力主文物南迁的院长易培基带领下，故宫博物院同仁从1932年起，就一直在做着文物南迁的准备——整理、挑选、装箱等等。其中，单是装箱一项，就让人伤透了脑筋。因有不少国宝如瓷器、玉器等等，皆属易碎之物。为防止搬运途中损坏、变形，博物院同仁为此专门请教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请他们传授包装技术，又经反复试验，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此后历经万里，转辗流徙，南迁文物几乎纤毫未损，证明此法确乎行之有效。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震动，文物南迁被紧急提上日程。嗣经国民政府批准，1933年2月5日凌晨，第一批南迁文物共2118箱正式装车启运。为防止意外，从紫禁城到火车站，沿途派军警荷枪实弹，实行戒严。故宫博物院特派吴瀛（吴祖光之父）担任总押运人，军方也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卫队随车护卫。列车自前门车站驶出，经平汉线转陇海线，以绕开天津，防止日军的轰炸破坏；然后再转津浦线，一路顺风，最终到达浦口。但由于此行仓促，浦口根本就没有找到适合保存文物的地点。直到一个月后，他们才等来了将文物转运到上海

的指示。此后，又先后有二批文物陆续运抵上海，前后五批合计19557箱。这些国宝最终存放在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随之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

就在这时，发生了易培基蒙冤辞职、马衡出任代理院长之事。

由于运到上海的文物只是暂时存放，新任院长马衡一面呈请行政院同意，加紧将南京朝天宫改建为合适的库房，以妥善安置暂时存放在上海的文物；一面组织人力，对所有运至上海的文物进行全面的清理、点收，并分类整理、编目。最后汇集为《存沪文物点收清册》，油印装订，以此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系统、完整的著录。

至1936年11月南京朝天宫库房修建完毕，这批文物在上海保存了将近四年，其间还挑选了八十箱精品文物，由庄严总揽其责，送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引起巨大轰动。1936年12月，所有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分批运抵南京库房。所以，此后发生的二次南迁（实为西迁）皆以南京为起点。

南迁文物有了合适的安身之所，故宫博物院的同仁们开始筹划举办一个大型展览，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一睹这些久藏深宫的皇家珍品。但没想到，很快就爆发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一个月后，上海沦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下令转移所有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这样，从1937年8月开始，一场历时更久，路程更长，条件更艰险的文物大迁徙拉开了序幕。

此番迁移，分三路进行。其路线图如下：

一为南路，线路为：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押运人员有：庄严、曾湛瑶、那志良、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等。

一为中路，线路为：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押运人员有：马衡、杭立武、吴玉璋、徐森玉、欧阳

道达、刘官鄂、朱学侃、梁廷炜等。

一为北路，线路为：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押运人员有：马彦祥、牛德明、李光第、王志鸿、吴玉璋、黄贵生、梁匡忠、那志良等。

三、天地妙蕴 国宝安身

且说第一批迁移的南路文物，于1937年8月14日装船启运，由水路运至汉口，然后再用汽车转运长沙，存放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这批文物虽仅80箱（北路为7286箱，中路为9369箱），但其主要构成却是1935年赴英国展出的书画精品，再加上撤离时又增添的部分艺术瑰宝，可称都是稀世之珍。

文物运抵长沙后，院长马衡曾亲往勘察，打算在附近的岳麓山下开个山洞来贮藏文物，但计划还未实施，日军就开始了对于湖北、湖南的轮番轰炸。长沙已非久留之地，行政院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因湘西一带土匪活动猖獗，行政院虑及文物安全，特指示绕道广西，经桂林、柳州入黔。并命湖南公路局派出十辆汽车负责运送，到广西边境再由广西公路局派车接运，至贵州边境则再换贵州公路局的车辆。幸亏转移及时，文物迁走未及一月，长沙即遭到敌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

1938年1月31日，80箱文物安全运达贵阳。但不巧的是，这一天正逢春节——夏历大年初一，适值各机关放假，无人办公。后几经联系，乃由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亲自出面安排，将文物暂存于当时的绥靖公署内，后经同意，复转移至位于六广门的蒋中正行营。

但不久，贵阳即开始遭到日机的袭扰。行政院担心文物安全，指示须尽快寻找洞窟保存文物。当年8月，为挑选赴美展出文物而专程来到贵阳的傅振伦，也加入到寻找山洞的行列。如其日记所载：

“十月十六日。敌机屡犯贵阳，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故宫博物院在贵阳保存的珍贵古物，寻觅洞窟存放，以策安全。省府派一秘书刘姓协助。本院主任约同朱家济、曾济时和我一同四出寻找洞窟。先至南岳山云鹤洞，是驻军处，旁有阵亡将士墓。次至簸箕洞，由南口入，多钟乳石，色形陆离万状，再入有一线天，上有孔可透日光。洞皆深邃潮湿……”

“十月十八日。我等又与贵筑县政府陈科员继续寻求洞窟。出南门，沿南明河至回龙山水口寺。山上有文武庙，供有“内史皇仓圣神位”。路旁挡箭碑，上横刻“长命富贵”四字，下直刻通达地名及里程，还写明“弓开弦，左走紫，右走蓝”等字，这是南方山地的指路牌。

前行为大川洞（一名红岩板），洞大且深，有向天口及侧口各二，经过之处粉书箭头，执火把而入。由石上匍匐而前，钟乳多怪状，行数里深不可测，由原路折回……”

但贵阳附近的山洞均不理想。后经省政府介绍安顺的华严洞，傅振伦等乃前往安顺勘察。其具体过程，傅氏日记亦载之较详：

“1939年1月3日。晴热。贵阳山洞多而潮湿，不便保存古物，省政府介绍去安顺华严洞。今日与曾济时买了两张公路快车票（每票三元四角），八时开车，九十八公里的路程，四小时就到了，住共乐天旅馆。”

“1939年1月4日。午饭后与曾济时发华严洞。南门外有木亭，民国六年（1917年）七三逸叟石农刻“红岩碑”于其北面；南行二里半为汪官屯（马鞍山之东），有指路碑，横书“长命富贵”，直书“弓开弦，左走红，右走蓝”。特商（贩卖烟土者）正在路旁筹建南山茶社。三里至张家坡下华严洞。洞口有关帝庙，建于南明永历间。清乾隆二年丁巳重立，道光十年又修。咸丰元年禅一和尚七秩立“鹞岭频开”扁额，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里人七十老人刘巩固撰联。前构木为厅，有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三月洪亮吉题“读书山”三字匾，下署“赐进士

及第、文渊阁侍直、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石经收掌、兼详覆官、提督贵州学政壬子科顺天乡试同考官、加一级、纪录四次、阳湖洪亮吉题”。其左房宇为军阀杨森为苗民子弟创办的小学校。洞内广阔，冬春干燥，颇宜保存古物。”

另在那志良《我与故宫五十年》书中，亦有如下记录：

“文物存在贵阳城内不到一年，理事会觉得万一贵阳有了警报，这里还是不安全，必须寻找山洞，或开凿山洞，把这批文物放进去，才能放心。在二十七年冬，在贵州安顺，找到了一个“华严洞”，洞在安顺南门外外的读书山，山名是当年洪北疆（江）先生起的，山下有一天然山洞，就是华严洞。洞很大，就在洞里建起房屋，做为库房。这里既安全又不潮湿，是一个贮存文物的好地方。”

地处安顺南郊的华严洞，依山傍水，是一处山清水秀的所在，向以城南胜景著称。其山原名紫峰山，因乾隆时期的贵州学政洪亮吉曾到此一游，并为之更名曰“读书山”，故咸丰《安顺府志》将之列为城外八景之一，名曰“山洞读书”。洞外山寨，鳞次栉比，依山而建。洞口古木森森，加上洞门前建有座古庙，是以十分隐蔽；而洞内又极宽敞、干燥，足可谓天造地设，确是一贮藏文物的理想之地，不愧为“天地妙蕴”（民国贵州省主席的杨森题）之称。

地址勘定之后，一向以严谨、精细著称的故宫人，并非简单地将文物直接搬入洞内了事，而是为保险起见，又在洞中专门修建了木制库房，其式样如庄严所言“稍仿正仓院”。遗憾的是，这座唯一能够证明故宫国宝入藏安顺的物质性载体，却在国宝离安后即被地方政府拆除，事后庄严先生闻之，亦深表不解。

1939年1月22日，藏存在贵阳的文物运抵安顺，入藏华严洞。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亦随之成立，由庄严先生出任办事处主任，其成员有朱家济、李光第、郑世文等。

后因朱、李、郑三位先后离开，另补刘奉璋（峨士）、黄居祥、申若侠（庄严夫人）等。

另须说明的是，1939年4月13日，又有南京古物保存所的五箱文物（主要为青铜器）计118件，因委托故宫博物院代为保存而移藏华严洞。为保护文物安全，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还派出一连士兵到华严洞驻扎，担负守卫之责。

自此，这批故宫国宝在号称黔中福地的安顺，安安稳稳、平平顺顺地待了将近六年。

四、黔南惊变 再上征程

故宫国宝藏存安顺，虽有军队日夜守卫，但也并非像后人传说的那样，戒备森严，严守机密云云。据庄严之子庄灵回忆，他幼时常在父母的带领下，随三位哥哥一同到华严洞玩耍，逢到天晴，还会看到父亲与同事们在洞外晾晒书画。庄严等一干典守人员，也并非因要务在身而画地为牢，抱团自处。相反，每有余暇，他们倒是很乐于与地方人士交往。如曾任国会议员而告老还乡的安顺耆宿黄元操，就数次宴请过庄严等人。普定县有名的富商伍效高，也曾邀请他们到普定莲花洞游览。

对于几经辗转流徙，终得安身下来的这些故宫国宝及其守护人员来说，安顺这一段不短的时光，是极其难得的安稳时期。尽管这里地处偏僻，但与战火纷扰的其他地区相比，远离前方的安顺却有如世外桃源，至少无须再为文物的转运搬迁而日夜担忧、焦虑。如傅振伦先生所言：“慕陵喜其地民俗朴实，风景清幽，六载山居，无异世外。”何况此时的安顺，已经成为许多流亡人士的避难之所和往来通道，呈现出罕有的战时繁荣景象。其间，除一些博物院同仁因公来到华严洞外，也有部分故交顺道往访。如老友向达的来访，就留下了“四壁萧然，案头唯梵典数卷，为之慨叹，留连者久之”的记

载。仅据所见资料，先后到过华严洞的故宫同仁就有傅振伦、徐森玉、励乃骥、马衡、伍蠡甫等等。闲暇时，他们还喜游山玩水，遍访附近的村寨、山洞，甚至结伴邀游过安顺著名的粮仓洞。逢到春节，他们还请人引领，专程赶到北门外“花山”看苗族跳花，又到五官屯看屯堡人跳神，可谓不亦乐乎。除此而外，庄严等人还注重发挥故宫国宝的文化影响，积极参与地方的文化艺术活动。据地方史料记载，1943年10月10日，安顺民教馆为庆祝“双十节”而举办“文化艺术展览会”，其中展品就有庄严先生代表故宫博物院提供的部分书画和青铜器。1944年4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驻安办事处挑选出上百件书画精品，特意在位于贵阳的贵州艺术馆举办了一次轰动一时的书画展，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有报道，甚至有媒体还获许刊登了详细的展出目录。

惜乎好景不长。1944年的“黔南事变”，再次打乱了山中的平静。由于广西战局丕变，日军攻入贵州边境，兵锋最近已达独山县，贵阳告急。一旦贵阳沦陷，则贮藏在安顺的故宫国宝将被切断合适的退路，而只有撤往云南一途。但云南滇缅一线的好几座城市已经被日军占领，绝非安稳之地。国民政府一边派大军组织在黔防线，一边急令在安文物紧急转移。1944年12月5日，藏存在华严洞的所有国宝，奉命装车启运，驰离安顺，经贵阳转往四川巴县。

从1939年1月22日到1944年12月5日，移藏华严洞的这批故宫国宝，在安顺藏了5年10个月零13天。^①

（作者单位：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惠水县两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探析

——以惠水县好花红布依第一堂屋、龙塘陈氏宗祠为例

文/图 陈钱美 宁健荣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旅游的不断开发，乡村振兴项目地推进，人们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意识淡薄，使其该类文保机构受到严重地破坏。本文主要通过查阅资料、走访调查惠水县好花红村“中华布依第一堂屋”，和高镇龙塘陈氏宗祠附近村民，了解两处古建筑的保存与利用现状，并将两座古建筑的保护发展做个对比分析，探讨其更为适合该文化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城市文化 文物保护单位 发展

作为过去民众“住”的物质保障和精湛工艺的代表，古建筑文物是历史的瑰宝，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与传承。然而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城镇化建设方兴未艾的今天，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文物保护的严重缺失。尤其是在偏远地区，无论是在政府的管理、资金的支持、技术能力，还是建筑的利用情况都大有不足。因此，加强古建筑文物的保护是非常急需的，哪怕是对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管与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都是很亟需的，本文对惠水县两处处在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的现存状况进行田野了解，并对其存在问题做简单探讨。

一、惠水县文化概况

“惠水自五代起设南宁州，宋置‘八番’地，明代建程番府，定番州，是一座具有千余年历史文化的小县城，主要有布依、苗、汉、毛南、壮、彝、水、回等十多个民族，”他们将惠水共同打造成今天这样极具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城市。惠水位于贵州省中南部，北邻贵阳，西及安顺，率属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建设也在全面、迅速地展开，规模也在逐渐地扩大，而城市文物保护单位景点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也正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历程，记载着城市的兴衰与繁华，县城内州级以上的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并不多，而好花红村“中华布依第一堂屋”和龙塘陈氏宗祠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见证惠水一路以来的兴衰与繁盛。

保护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首先要保护好城市中最具有特色的文化“景点”，保护这座城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惠水县好花红村“中华布依第一堂屋”、惠水龙塘陈氏宗祠等入选州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有利于推进全县文物的保护，加快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展示了惠水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下

面就其两处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情况进行简单的了解和探讨。

二、惠水县文物保护单位基本情况

(一) 好花红村“中华布依第一堂屋”

1. 堂屋的建设沿革

好花红“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也称“布依博物馆”。作为“博物馆”陈列室始用于2007年，它是直接利用村中心位置的古建筑民居“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作为馆室。据《人文贵州·乡愁密码》中记载：“该屋是当地王氏家族中一名叫王宗义的清朝武官于清道光年间修建，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布依第一堂屋”，是一座土砖木架“干栏式”二楼一底三合院建筑。房屋共计12间，上房面阔5间，两厢对称，配有回廊，均设“美人靠”，整体布局呈U型，共计580平方米。

从外观看，堂屋外围用石料砌成围墙，围墙与正屋斜对四十五度角的地方开设一个小门，也是屋子的正门，经过走访发现村内房屋围墙大门均设在正屋斜对四十五度角处。据当地人说这是一种传统，村内以及惠水地区涟江两岸几乎所有布依族房屋都是此造型，而之所以要正门避开正屋，则是为了不让正门打开就对着家里供奉着的神龛，这是对神灵和祖先的一种尊敬，能让家族兴旺吉祥。

由于“好花红”民歌的闻名远扬，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地极大重视。2006年，经发掘辉岩寨作为“好花红”民歌发源地，并原始村落气息保存较为完整，好花红村成为政府乡村旅游开发项目。经专家考究，2006年11月，王氏堂屋被贵州省布依协会誉为“中华布依第一堂屋”；2007年，作为这房屋第六代拥有者的王科斗先生，将其祖屋以一年100元的租金，出租予县政府，作为布依族文化小型展览馆，租期为50年，世人称“布依博物馆”；2011年，被列为“惠水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被列为“黔南州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也是该旅游基地很多外来游客慕名而来的一个特色景点，据了解“中华布依第一堂屋”能有如此名声。首先，它有着专门的管理部门，惠水县好花红旅游公司；其次，还有属于它特定的宣传方式，那就是文旅结合的博物馆化

开发；最后，在房屋建筑保护上，还有其他专门的古建筑民居修缮团队，笔者去调查也恰好遇到他们在修缮屋顶瓦片。

2. 堂屋的利用情况

该建筑物利用状况是作为陈列馆，主要收藏陈列当地布依族一些代表性文化藏品，主要展陈主人家过去常用生产生活用具供人们游客观赏。如：纺织、织布、刺绣、服饰、炉灶、生产农具以及生活用品等实物，并向公众开放，在村中为游客提供一个观赏之地。

布依博物馆目前馆藏有五百余件（套）藏品，可分五种类型，分别为生产器具类、生活用品类、服饰类、书籍以及活动剪影类。馆藏内容在时间跨度上为20世纪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实物收藏有三百多件，主要实物为过去生产生活用具、农具、服饰、装饰等；图文史料一百多件，主要有与布依族相关民族书籍35本，王氏祖训、家训以及字辈牌2块，还有一些其他村寨文艺活动剪影图片一百余张。

布依博物馆共有11个展厅，可分八个部分。一楼三个展厅主要展出王氏家族自20世纪以来百余年间生产生活器具，以及家训、字辈牌两个部分；二楼有七个展厅，主要还原过去王氏家庭生活场景自居住以来所设神龛、火塘、卧室及书房五个展厅；一间服饰展厅，展厅内主要展示当地布依族特色服装，蜡染及刺绣技艺；另有两间当地民风民俗历史活动剪影展，共六部分。

布依博物馆作为好花红村一个特色展出室，在村内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空间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该村旅游业的

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一）龙塘陈氏宗祠

龙塘陈氏宗祠位于距县城7公里，距省城贵阳30余公里的高镇镇后山村。过去龙塘陈氏宗祠知名度不亚于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也因此两座建筑物能同在2016年，被列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如今就连本县多数人都却只知道中华布依第一堂屋，而不知道龙塘陈氏宗祠，更别说外来游客们会知道。鉴于此，日前笔者专门走进陈氏宗祠去参看它的保护情况。

走进村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排排颜色、构建格局皆统一的现代砖房建筑，而陈氏宗祠则处于村子最里面的小山坡下，如若没人告知，根本不知道村中还有古建筑的存在。走进建筑房屋，只见那庭院已经长满了杂草、青苔，屋里并没有人。据村民介绍：房屋有个专门看管开、关门的大叔，因为平常不使用，也没什么人会进去，所以很少打扫，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有人去祭拜。

龙塘陈氏宗祠“始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享堂、两厢、天井和影壁主要构件保存完好。2011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升格为州文保单位。其正房与南北厢房结构为穿斗式抬梁结构，青色瓦顶，建筑面积238平方米。

正房屋脊中间有一小宝顶，屋脊两角上角和前檐角微翘。正房面阔3间，通面阔14米，进深6米，雕花门窗；大门额匾长2.2米，宽1.2米，从右至左楷书阴刻“陈氏



堂屋阶梯

宗祠”四字；南侧厢房面阔三间，通面长9米，进深4米，面阔3间；北侧厢房长8米，进深4米，面阔3间。抬梁上用红色油漆和彩绘图案栩栩如生。天井为青石铺墁，长8.35，宽8米，且天井内壁绘塑有“福寿”两个大字；院外墙上绘塑有一对黄色狮子，面部相向，极为威严的模样，把守着院门。

祠堂内的房檐、梁柱构件木雕、石雕等很是精美，它的建筑工艺水平相当高，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特点。陈氏宗祠不仅记录和反映了清代高镇陈氏家族经济和文化的兴盛，也向世人展现了古代工匠及当时人们的审美理念、情趣、以及心理特点，美学、礼学等思想观念和工艺技法，也体现了他们对木、砖、石、瓦的应用和支配能力。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建筑工艺和陈氏家族文化提供了实物材料，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

三、保护与发展的困境与思考

好花红“布依第一堂屋”与高镇“龙塘陈氏宗祠”建筑保护单位极为相似，首先，类型上同为古建筑类；其次，申保级别相同，两处文物保护单位都属于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再有就是时代上相近，两古建筑保护单位都属清代，“中华布依第一堂屋”为清道光年间的建筑，龙塘陈氏宗祠则是清光绪年间的建筑。但是，两个文物保护单位不管是在保护上、还是宣传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针对上述两处建筑物的存在与地理位置的不同，可以根据各自保护现状的差异，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制订科学的保护与管理措施，使其县城内两类古建筑文物免受人为因素破坏，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在文物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引导下，基层管理者要结合两处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与开发。

（一）堂屋存在的问题与保护措施

从上述建筑状况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布依堂屋位于好花红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基地，

于是成了村寨内的文化景点之一。在对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上，是通过展览室的方式进行开发，使其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当地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为当地旅游带来了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在对其展览技能、文物整理，建筑的修缮与管理上有所缺失。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更好的保护与开发。

1.继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设施，引进专门的人才管理。

好花红布依堂屋，作为惠水县清朝时期连江河畔布依族人民的建筑代表，又依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好花红调”的发源地，正直旅游业的兴旺开发。堂屋虽然有其专门的管理单位“好花红旅游公司”，但也仅是在房屋打扫、展品布置以及消防上有所管理，而在及建筑物的修缮与展品的展陈上，也仅是适应旅游宣传而摆，以至在灯光的打造与展品的陈列上造成民族文物的伤害。因此，在建筑的修缮与展陈上，需要更加勤奋的修缮与改进。据笔者前去展馆，首先，房屋漏雨严重，使得展陈室内一些民族文物受到一定的损坏；其次，在民族文物展品展陈上，缺乏专业技术的指导与专业灯光的运用，所以灯光便只是在过去展开展馆之时，进行安装，后期并未修缮，最终全部坏掉，屋内黑暗潮湿现象严重，使得游客前去参观的兴趣缺失。

2.加强宣传，切实提升全民的保护意识。

在好花红村内，大家都知道堂屋在其村中心位置，但当问其是否会去参观或者主动参与管理之时，他们的回答基本都是，“那些老房屋有啥好看的，有啥可打理的，破破烂烂了才最能体现出它的历史久远。”在乡村休闲旅游开发的大背景下，加强对好花红当地民众进行文物保护法知识的宣传，增强民众的责任意识，从本质上解决人们对堂屋建筑不管不顾的现状，不至于造成古建筑在损毁之时无人上报与监督。

坐落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基地的古建筑，保护好它不仅仅是保护古建筑，为古建

筑研究者保留更多的研究价值，保护好民族文化，使其发挥更大的旅游效益与经济价值。

（二）宗祠的保护与开发

由于地理位置以及使用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两座建筑物的传承历程与保护方式也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想在现在龙塘陈氏宗祠如此差的环境之下，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参考一下其他建筑物的保护与宣传方式，让更多世人了解并主动关怀该建筑物的发展与传承。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保护该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物。

1. 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以及宣传力度。

政府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价值和宣传利用上，由于省内外对龙塘陈氏宗祠的认知度较低，需要开展专题性的关于龙塘陈氏宗祠文物保护单位的宣传活动。应当大力宣传宗祠建筑物的历史文化背景，陈氏宗祠对当地陈氏家族的影响，以及宗祠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鼓励家族人群在其祠堂内举行祭祀活动时，加大对外宣传。在此，可以借鉴芦山镇硃口朱氏家族在其朱氏宗祠内举行祭祀活动，加大对外宣传，使得整个村寨甚至全镇上人士都知道朱氏家族的庞大与团结。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古建筑的保护知识，还能较好地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环境，突显出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也能充分发挥旅游的经济价值。



宗祠院门

2. 完善基础设施，引进专业人才。

龙塘陈氏宗祠在当地处于无专人管理状态，使得杂草蔓长，房屋破旧，瓦砾破碎，甚至有安全隐患。因此，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祠堂管理与修缮机构，只有建立专门的管理机制，加强对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缓解对建筑物的损毁，才能使得更好的流传下去。

3. 增强文物保护法的宣传，提高人们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

据当地村民介绍，龙塘陈氏宗祠只有逢年过节时候参与祭拜，也就会在那之前才会有人对其宗祠周边及屋内进行除草打理和卫生清理，平日无人打扫卫生。因此我认为，我们要在怀有对祖先的敬畏的同时，也要保护、爱护好我们的建筑物，平日也应派专门人士进行看管打理，不然安排家族人士轮流排值日，或者政府部门组织，请专门的卫生管理人员。

中华民族是个具有五千多年的礼仪之邦，祭祖是中国民众礼仪方式。因此，保护好龙塘陈氏宗祠建筑物不仅是保护好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物的建筑结构以及它所赋予的历史文化内涵，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建筑文化和陈氏家族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上接第14页）1954—1955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川黔两省组织群众有计划地进行打滩，整饬航道。以后每年疏缮，至现在，太平渡至马蹄滩通航里程已达183公里，其间马蹄滩至马桑坪一段可通行15吨以下小木船，茅台至马桑坪一段可通行小机动船，二郎滩至太平渡一段可通50吨木船和机动船，十里长滩的蜈蚣岩而今亦有船曼往来行驶。赤水河上游北岸亦发生了深刻变化。1952年川滇公路上的赤水河架设了第一座铁桥，1957年地处二郎滩的国营郎酒厂在原有基础

四、小 结

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用与保护工作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艰巨历程，而在城镇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中，更是需要当地政府部门加强与区民的知识宣传，甚至通过信息整合与研究因地制宜的制定完善的宣传与保护方案。人民群众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自觉用实际行动来保护身边的文物，加强对文物传承的责任与担当。文

（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

- [1] 惠水.[EB/OL], http://baike.baidu.com/l/UimBvAb1?bk_share=copy.
- [2] 惠水县史志委员会.惠水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 [3] 人文贵州.乡愁密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
- [4] 陈钱美.民族记忆的宝库——走进惠水县好花红布依博物馆[N].贵州民族报，2019.
- [5] 惠水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惠水县文物大观.
- [6] 许浩.中小城市古建筑文物的与合理化利用的方法[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07）：90—91.
- [7] 刘传鹏.论城镇古建筑保护及利用[J].科技经济导刊，2020（06）：82—83.

上恢复后，几经扩建已初具规模，特产郎酒，香飘万里，盛产白煤的岔角滩，青龙嘴一带，解放后兴建的自煤厂，所产优质白煤曾在1955年至1970年源源不断运销合江，重庆，乃至汉口等地，具有光荣历史的太平渡口，而今已建起了装机2×1500千瓦的火电厂，小型造船厂，1981年10月建成通车的长征大桥，进一步密切了川，黔两省的经济联系和人民交往。太平小镇的面目已焕然一新。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锦屏文书起源、现状及特色述略

文 / 龙令浏

锦屏文书，是指以贵州锦屏县为核心的侗族、苗族人民自明清以来长期经营混林农业和木商贸易而形成的大量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是林农们创造和传承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林业法制的历史典范，因此被中外学者誉为“世界记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

因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发现于锦屏县的侗乡苗寨，故被通称为“锦屏林业契约”或“锦屏林业契约文书”。

2005年春，致公党贵州省委向贵州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提交《关于“锦屏文书”抢救的意见》的提案，以新的“锦屏文书”概念取代原先“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的概念，把锦屏周边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三穗、剑河、天柱、黎平等县统一纳入“锦屏文书”的抢救保护范围。其征集的范围仅以反映林业生产方面的契约文书为主要内容。

“锦屏文书”是继甲骨文、汉晋木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也是世界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它对林学、农学、民族学、民族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档案学、生态环境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对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和维护少数民族

族社会稳定和谐也有重要的资政参考借鉴。

近几年，随着抢救保护的深入开展，有关学者和黔东南州档案及文化部门发现，锦屏文书的分布区域不仅覆盖了清水江流域各县市，而且在湖南省境内沅江上游的靖州、通道、会同、新晃等地和贵州省的都柳江流域、舞阳河流域的苗村侗寨里也陆续有发现，保守估计遗存民间的锦屏文书藏量不少于40-50万件。

一、起源背景

锦屏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盆地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非常适合林木生长，是我国南方著名的传统人工林区。锦屏500多年的人工造林历史，在中国堪称独特，在世界也罕见。

据记载，元代中期锦屏县是“丛林茂密、古木阴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的原始林区。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黔南识略·黎平府》载：“自清水江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宗桷之材靡不备具。坎坎之声铿甸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

明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派官军进剿锦屏婆洞林宽起义，溯沅江而上“伐木开道二百里抵天柱”，入清水江流域森林茂密的锦屏，被“深山箐野”之景象所震撼，尤其是锦屏杉木具有“树干通直圆满，木质细腻，有芳香味，坚韧耐用，即使外腐而内不朽，纹理顺直，易于加工，不变形、不开裂；以之作器具盛衣物书籍，久藏不为虫蛀，作棺材，入土百年不朽，不生白蚁”等特点倍受青睐。从此，锦屏盛产优质杉木的信息远播江南、京城。

锦屏境内河流众多，水系发达，清水江境内有乌下江、小江、亮江等大小支流147条，总长1011公里，经清水江入沅江、进洞庭、奔长江，木材水运极为方便。明正德九年（1514）朝廷修建乾清宫、坤宁宫，层层派员到湖广、川黔等省，深入锦屏县内采集“皇木”。

自此“民间木商”大量涌入锦屏，“皇木”“民木”贸易兴起。从而拉动、刺激人工造林业的日益兴旺与繁荣。使大量的侗人、苗人和来自江南、华东等地的汉人在清水江流域从事木材贸易和人工造林、营林。从此，清水江流域的锦屏、天柱及剑河东部、黎平北部等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林业史上堪称独特的林业生产关系，产生了大量的佃山造林、山林管护、木材买卖、木材水运及人工拖运、纠纷调解等民间契约和碑刻等实物，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林业契约文书和珍贵的实物档案。

二、抢救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锦屏县档案部门就开展了契约文书的征集、抢救、保护工作。其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50年锦屏县解放。随即进行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中，对地主、富农的山田地契进行查抄，并当众

焚烧，造成了大批山林田地契约的破坏。只有田土山林分给贫下中农群众的少部分老契约作为群众田土所有者的凭证而幸存保护下来。

1959年2月锦屏县档案馆成立，随后组织少数民族档案征集工作小组到敦寨、九寨、启蒙等公社进行民间契约档案调查摸底和征集，并在平敖、文斗、魁胆、瑶等白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捐赠契约文书到县档案馆保存。1960年初在河口公社韶霭村发现并征集到《皇木案》的手抄本，里面收录了明清两代湖广、黔省征派“皇木”的各种文告、奏疏及批文。同时还征集到《黔书》和《姜应芳农民起义史略》等史料，又在启蒙公社雄黄村者姑寨侗族农民杨胜乾家中征集到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过锦屏留下的署名有毛泽东、朱德的《出路在哪里》的宝贵传单。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规模的征集契约文书及有关档案资料的活动。

1960年8月，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今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成立贵州少数民族近代经济调查组，对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在锦屏县档案馆及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与推介下，调查组成员杨有赅等人在民族村寨调查期间，文斗村知识分子村民姜元钧便拿出家中收藏的两三百件契约文书及木行斧印等相赠。平敖、文斗的其他村民也同意出借少量民间契约供给调查组研究之用。这是国内学者首次接触到锦屏契约文书。这次社会调查，使锦屏文书第一次进入了学者的视野。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的契约、史料又再次被收缴焚毁，档案馆受到冲击，契约文书征集抢救工作因受破坏而中断。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至2005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1981年锦屏县档案局成立。1984年，锦屏县档案局组织开展全县第二次大规模征集契约和家

谱、族谱等民间档案资料的活动。在彦洞乡瑶白村、河口乡文斗村征集到清代契约 280 件。如文斗村乾隆二十八年（1763）姜凤宇与姜远福的“立断卖杉木山场”契约、乾隆四十五年（1780）姜兴周等人与龙文魁等人的“立佃种山场”契约等。

与此同时，杨有赓教授在80年代后，先后多次带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研究所的唐立、武内房司等学者到锦屏县进行考察，并征集、借走近3000件契约文书原件至日本进行研究。

1985—2000年，锦屏县档案局征集抢救林业契约达2875件，复印件 34件，并编目进馆安全保存。

2000年 10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博士到锦屏县进行社会调查，在锦屏县档案馆查阅到大量的林业契约档案，随后到乡村进行考察。2001年 4月，锦屏县档案局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征集、研究、开发锦屏民间林业契约，成立了以锦屏县长为组长、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春声教授为副组长的锦屏县民间林业契约征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档案局。中山大学为锦屏县提供了必要的征集经费及电脑、复印机等相应设备，推进了锦屏文书征集、抢救、整理、保护的规模化和科学化，开创了政府档案部门与省外高校学术机构合作征集研究锦屏文书的先河。

2004年 3月3日，锦府办发[2004]23号文件把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开展锦屏林业契约征集研究工作的任务调整为县志办的工作职责。县志办先后将 1万多份契约原件移出县档案馆。

2004年9月6日，贵州省委领导就此批示：“锦屏清代林业契约是民族的历史文化文物，她不仅是锦屏的民族文物，而且是黔东南的、贵州的文物，很有价值。应切实采取措施，保护好、抢救好，不得流失、倒卖。不搞新闻炒作，今后的林业契约的清理、整理等工作，按省的部署，现终止与国

内外任何单位和组织的合作。”黔东南州委领导也就此作出批示。锦屏县委、县政府为贯彻落实省委、州委领导的指示，将已移出县档案馆的契约收进县档案馆安全保管，同时中止锦屏县与中山大学的合作，档案部门依照《档案法》加大了征集、管理、保护的力度。

2005年1月，贵州省政协委员陈汉彬、张新民等以致公党贵州省委《关于“锦屏文书”抢救的意见》向贵州省政协第九届三次会议提出提案，并将“锦屏林业契约”改名为“锦屏文书”。这一提案，引起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重视。4月，在贵州省档案局帮助下，锦屏县档案馆专辟“珍贵档案特藏室”，添置了密集架，专门保护、保管林业契约，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8月5日，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档案局在《黔文提复[2005]37号》文件中指出：“明、清、民国时期、锦屏各族群众在林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契约、账簿等原始记录，据初步估计，至今散存民间的还有数万件，这些历史文献对研究明、清、民国时期，侗、苗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状况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11月7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贵州大学党委书记龙超云在锦屏档案局视察锦屏林业契约时强调：“锦屏林业契约价值很大，可以依托贵州大学开展锦屏林业契约的征集、抢救、保护、研究、整理、出版工作。”

至2005年底，锦屏县在18个村寨征集到契约原件13666件、山林登记等各种簿册20本、光绪年间编纂的族谱3本。其中，已经整理、修复、裱糊、编目、装盒的达8303件。

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2006年8月，新华通讯社在第407期《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王丽采写的《贵州“锦屏文书”流失严重亟待抢救》一文，引起了国务委员陈至立的高度重视，对贵州“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请宗

源同志阅。‘锦屏文书’需中央政府部门支持的望提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旋即批示“富玉、超云、嘉甫同志：请遵照至立同志指示精神，提出具体可行的立项方案。”王富玉副书记迅即批示：“请超云书记、嘉甫、飞跃同志阅示：可否专门听一次汇报，事先请贵大、黔东南、省直有关部门做一点准备，研究个意见，认真抓一抓，把至立、宗源同志的意见，认真贯彻落实。”10月24日，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专题会议，专题研究“锦屏文书”抢救保护的具体方案和工作措施。

2006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行文成立以副省长蒙启良为组长，有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公安厅、文化厅、林业厅、省档案局、贵州大学、黔东南州政府为成员单位的贵州省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随后，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及锦屏、天柱、黎平、剑河、三穗五县也相继成立了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自此，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走上以各级政府统一部署的工作轨道，并系统而大规模地开展了抢救保护工作。

2008年6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家投资600万元，地方投资1182万元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暨清水江木商文化历史博物馆立项兴建。该馆位于清水江与小江汇流处的锦屏县城状元街、两座风雨桥景观的交汇处，建设总规模为6988平方米，其中地上九层面积5480平方米，地下一层，面积1508平方米。目前第一期工程先实施主楼部分，建设面积5800平方米，现已完成投资1040万元，预计2014年底可投入使用。该馆建成后，与当地名胜古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飞山庙隔江相望，构成一道蔚为壮观的“木商文化”的风景区，也为锦屏文书进一步征集、抢救、保护、开发和研究提供重要馆藏、利用、展示的平台。

2012年3月，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一行，到锦屏就锦屏文书等重点档案的抢救、保护工作进行调研和指

导，并查看特藏馆建设进度和设计施工情况，他希望锦屏县委、县政府加大锦屏文书特藏馆的施工进度，确保工程质量，使散落在清水江沿岸各民族村寨的锦屏文书早日搬进新家，让价值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比肩的锦屏文书得到有力保护。

截至2019年底，锦屏、黎平、天柱、三穗、剑河等9县共征集进馆锦屏文书总数21.2864份。其中锦屏61337份，黎平61010份，天柱33473份，三穗31355份，剑河18131份，岑巩6581份（件），台江593份，从江197份，榕江137份；共计裱糊12，6646份，编目160604条，数字化142775份。

三、类别特色

锦屏文书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从具体内容上分有山林、田地、房屋、宅基地、水塘、菜园权属买卖契；山林、田地、房屋、宅基地、水塘、菜园等家产析分及传承记录契；合伙造林、佃山造林、山林管护、山林经营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诉讼、调解裁决文书；山林土地买卖以及家庭收支登记簿册；生态环境保护契；乡村民俗文化记录；官府文件；村规民约；家乘族谱；文献古籍等等。其中契约文书类馆藏最多、最完整、最系统，是“锦屏文书”的主体。

从载体形式上分有石碑、兽骨、竹木、皮、布、纸等，以土纸书写的纸契为主，内容多为山林田土买卖、佃山造林、拆分山林和家产、山林管护、山林纠纷调解等等。

从功用来分有生活、生产与经营记录等；从记录的形式上分有文字、碑刻、实物与音像等。

以上契约文书，以民间文书为主，官府文书为次。少部分盖有官府印记的称“红契”，大部分没有官府印记的称“白契”。

在文献史料类中多为有关历史资料汇编和私人著作，如反映吴勉、林宽、张秀眉、姜应芳等侗苗民族首领反抗朝廷的起义及其

被镇压的有关史料；还有反映林业生产、木材贸易、货币流通、人民徭役负担等情况的记录。如《莲花山集》、清光绪年间《贵州不缠足会条约》、记名提督朱洪章的《从戎记略》、龙绍纳诗文集《亮川集》，咸丰、同治年间锦屏地方团练抵抗农民起义军的《三营记》、惊动嘉庆皇帝波及湘、鄂、赣、皖、陕数省的《清江四案记》（即“争江案”、“白银案”、“皇木案”和“夫役案”）等等。

而石刻碑文类民间蕴藏量较大，据文物普查统计，仅锦屏县境内就有数千通石碑铭文，经档案馆收集拓片、手抄件和乡镇修志收集整理的已逾500余件。如《奕世永遵》等的木材贸易碑文和林木保护碑文，仅卦治村就有20多件；还有反映婚俗和民俗改革、军事等的碑文，如1831年反映婆洞十侗寨俭办婚礼“八议”款约的“因地制宜碑”，1888年九寨侗族地区抵制封建婚姻陋俗“六礼”而订立的“定俗垂后碑”，三江镇赤溪坪村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定下的《为筑梁以通水道以便民生事》的文告碑等等。

现存最早的石刻类“锦屏文书”是锦屏县敦寨镇龙池村形成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的诸葛洞石刻。石刻上的《诫谕文》及其旁边的三首诗，反映了当地农民与统治者斗争的壮烈场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在以上契约中，年代最早的是明成化二年（1466）的山林买卖契，距今已有546年，现馆藏于天柱县档案馆。锦屏县档案馆现已收集到4件明代“锦屏文书”，分别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2件、明万历十四年（1586）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各1件。

保存最完好、幅面最长、字数最多的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形成的“黎平府开泰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贾右照给培亮寨民人范国瑞、生员范国璠的山林田土管业执照”，盖“贵州黎平府开泰县印”（县印呈边长为68毫米的正方形），长208厘米、宽

52.8厘米，共101列2888字，其中正文为89列2665字，由4张纸粘接而成，粘接处都加盖县印，每列文字的首尾均用朱笔圈点，全文用毛笔竖向书写，卷面整洁流畅，字体苍劲有力，语句精练明了，记载了契约主买断29处田产和21处山林、析分1处田产的详细情况，堪称锦屏县档案馆镇馆之宝。

最体现关心民生、创建和谐社会的契约是“九江坡碑记”。碑文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二十日形成的“钦加盐运使御补用道特受黎平府正堂僧额巴图鲁加三级记录十次俞（谕）”，共571字，规定了九江坡一带山林田土权属，山道隘口守护职责，山民日用柴薪樵采、埋葬用地、扫墓、开荒种菜等事务及范围和立契投税办法等，现馆藏于锦屏县档案馆。

最为悲壮、充满血性的契约是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二十八日的“东庄杨文光叔侄12人立保护山场祖业生死合同”，内容是“叔侄为因文志（湘、美）弟兄横争山场祖业，议立生死合同”，“倘有恶弟兄强砍木植，众等务要出力，生死相顾，评神发愿，许进不许退，如有一人有二心，神圣干察，恐有打死他人，我等即出一人抵偿，众共派田五十石与抵偿人养合家小，所有官事费用，俱各照股均派”，正文153字，现馆藏于锦屏县档案馆。

最珍贵的田契中，当属现馆藏于锦屏县档案馆的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新化长官司乌潭等八寨欧宇太等13头人并众民吐退粮田之正堂验记契”，正文800多字，记载新化长官司调解密帮岑孟四寨因逃贼兵杀掳所遗留粮田耕种及完纳钱粮的事，所描述的历史时空为清康熙十年（1671）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新化长官司所管辖的乌潭等上四寨、杨童等下四寨以及密帮岑孟四寨。涉及历史人物有新化长官司正堂欧阳、新化长官司前任刘太爷、二老爷、八老爷、原差金良弼、八寨13头人、贼兵高李二家等，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康熙十年贼兵杀掳，密帮岑孟四寨逃贼兵荒芜粮田，新化长官司

责令各寨招人佃种以完纳钱粮，吐退粮田以专耕纳，康熙二十四年奉旨清丈田坵，新增摊派丈增粮，吐退粮田有粮无差不得遗累之约定等等，是一份很有历史内涵与研究价值的锦屏文书。

版式最独特的是：长2.08米、宽0.52米的田土管业执照，由老契约、锦屏县田赋管理处卖契本契、卖契税收据及土地管业执照四份粘贴在一起的“四联契”，现馆藏于锦屏县档案馆。

家谱与地方志一体的《龙氏迪光录》：全书共8卷，8开楷体印刷，系自元代始设亮寨蛮夷长官司世袭龙姓的传统老家谱之一，

龙绍纳所著，成书于清同治三年（1864），现馆藏于锦屏县档案馆。该书不仅记述龙氏家族的繁衍迁徙、世代谱系，而且将家族发展和地方发展结合起来，成为记述亮寨长官司发展历史的地方志。对查考黎平、锦屏，特别是以敦寨镇为中心的亮江流域的人文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文学艺术、旧典、山川古迹、土产等，不仅可查考当时当地的文化、经济状况，而且可让人领略当时当地的风俗人情。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锦屏县档案馆）

（上接第45页）不假之纯嘏，使竟传所业，岂斯文之秘犹将不欲毕留人世，抑又不可诘焉！第黔中数千百年以来，求学术之醇且备，与著述之精以富，曾未有盛于斯者，得非千古一时之会欤！所愧知同蠢愚无似，有玷箕裘，兢守遗编，恐终不克繡梓永世，祇益危惧。”但是，郑知同的担忧或许是多余的，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两位前辈莫友芝、黎庶昌，他们的名山事业将流传千古，福泽后世。

《樗蚕谱》于道光十七年（1837）在第一次刻印后，又有多家翻刻，如遵义华氏泸州刻本、河南臬署刻本、宜宾官署刻本、贵州善后局铅印本、上海农学会铅印本，《巢经巢全集》收录。《樗蚕谱》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贵州及周边省区山蚕饲养业的发展。

在历史上，樗蚕曾经带给黔北经济的

富足，也促进了黔北文化的发展。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考求郑莫黎三贤撰述《樗蚕谱》意蕴，光大业已岑寂的绝学，因地制宜发展名优特色产业，对于我们今天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参考文献：

- [1] 郑珍著.郑珍全集[M].黄万机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2] 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M].张剑、陶文鹏、梁光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3] 黎庶昌.黎庶昌全集[M].黎铎、龙先绪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5]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 [6]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7

从沙坪红岩岩画 看贞丰远古社会发展状况

文/图 崔利军 唐仲嵘

摘要：沙坪红岩岩画位于贞丰县沙坪乡金山村石柱组，于2015年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四组岩画入手，结合文献分析论述贞丰远古社会发展状况，认为贞丰红岩及周边地区在距今3.5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汉牂牁郡谈指县中心区域当在红岩及周边洛凡沿北盘江一带，夜郎亲支部族谈指与以稻作为生的古骆越人有关。

关键词：沙坪岩画 贞丰 远古社会

贞丰县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沙坪红岩岩画位于贞丰沙坪金山村石柱组南2公里外海拔555米的红岩山断壁上，山体宽562米、高262米，岩壁上凸下凹，因断壁处大部分呈铁红色，故称“红岩”。红岩山体以石灰岩为主，两侧高中间低，岩画座东向西，存于断壁处近百幅，宽183.7米，高0.5~20米，最高处距离地面30余米，画面精华部分宽100米，距地面0.5~5米。岩画前是一片能容纳几百人活动的斜坡台地，宽度50~100米不等，台地中置一方敲琢填垫痕迹明显、周长5.42米、高0.98米，形若祭台的巨石。左侧山径直达石柱组下方北盘江支流的洛凡古渡（册亨县境），顺流而下与北盘江干流的白层渡口相连。2013年至

2017年，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瑛、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宗教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宋新民，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曾先后在小径两侧发现大量古人生产生活使用的打制石器。

红岩岩画直接以红色颜料涂绘于岩壁，具有典型的南方岩画特征。颜料由动物血汁与朱砂混合而成，以写实手法涂绘人物、手掌印和野牛、鹿、猪、狗、马、蛇、孔雀等动物形象，其中“猪”形图案在北盘江流域中尚属首次发现。

红岩岩画由左至右绘制，内容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的阴阳手印、动物到反映劳作、狩猎、类神生物的画面逐渐增多，并伴有多层叠画，画风具有明显的时代演变特征，显然非一时一代一人之作。其创作年代，从以下几组代表性图画可见端倪。

一、“手掌印”图

“手掌印图”位于红岩岩画左端1米~20米不等的岩壁上，由无数指印、掌印拓印叠压而成，线条粗糙、构图简单，以阴掌印为主。除一个掌印为手指向下的右手阴掌印外，其它均为手指朝上的左手阴掌印。该掌印居于数千掌印上方，似有引领众人起



誓之意。这种崇拜掌印，以掌印表达心愿的方式在16世纪以前的古印度十分流行。妇女们常用涂上颜色的手，印在她们房子的墙上，崇拜它们，以满足她们的许愿。

据2014年10月9日《自然》杂志所载澳大利亚内华莱士群岛西南部马洛斯地区发现的12处掌印图案放射性岩检测显示距今约3.9万年，1处猎鹿图距今3.4万年的论断和涂绘材料、手法的一致性可知，反映“手掌印”的红岩岩画初始创作年代当与马洛斯岩画处于同一时期，可追溯到距今至少在3.5万年以上。结合岩画周边发现的大量古人类所用打制石器，当时正处于使用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

二、“狩猎图”

“狩猎图”居红岩岩壁中偏右，是整个岩画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有面具、人物、野牛、手掌印等元素图案。野牛以简笔手法细线勾勒而成，上覆盖掌印，以阳掌印居多。野牛右上方还有8个有尾饰的舞蹈者。现就图案元素阐述如下：

一是面具与舞者。



作为人类原始文明的产物，面具产生于原始狩猎活动中，此后“基于‘万物有灵’基础上的巫术意识，促使面具和巫术又发生密切的关联”，形成原始狩猎驱逐巫术。狩猎图中的面具象征带着面具的巫覡，8个尾饰装束舞蹈者在巫覡引领下，跳着仿生舞，企求获取神秘之力，使猎物现身。此种场景，与北美印第安曼丹部落跳“野牛舞”迫使野牛出现的狩猎巫术仪式极其相似。岩画中狩猎巫术仪式的出现，揭示了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天地通”的巫覡巫师已见雏形的社会状况。

二是野牛图。

据有关手印的早期文献资料记载，数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第一波赫姆智人就已经普遍创作过洞穴图案，手掌印意味着占有的实例，狩猎图中掌印覆盖的野牛，当是野牛捕获后人们共同分配、享有猎物场面的具体反映；面具、掌印分别代表收获者的身份、人数和分享成果的群体。

结合画面中表现的狩猎巫术仪式，狩猎图亦反映了人们对狩猎巫术的迷信，揭示了人们对巫覡在实施狩猎驱逐术后顺利捕获猎物的迷信心理。

三、“男女对视”图

“男女对视图”靠“狩猎图”右侧，画面上男女屈膝对坐谈心，女子头戴牛角饰，手持长尾羽冠，双腿修长；男子腿部粗壮，背负孔雀，双手交叉仰视女子，似在聆听女子话语。



“男女对视图”展示了一幅温馨安宁的生活画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初期的古代贞丰男女平等关系的社会面貌。

四、“谷神”图



“谷神图”在红岩岩壁右侧，“谷神”圆脸大耳，法相庄严，体态壮硕，头戴穗冠，足登祥云。肩头双兕（水牛）相伴，右手托兜哈，左手握谷穗，腾蛇旁伺于侧，不怒自威。

该组图笔法娴熟、图案精美、构图准确、比例恰当、内涵博大、隐意深远，具有典型的唐宋风格，画面中兕、谷穗、腾蛇等元素，也反映出农耕民族的特点，其年代当在唐宋时期。

上述四组岩画，从距今3.5万年前的原始旧石器时代到部落社会时期并延续至唐宋，时间跨度长达数万年，以画面形式反映了古代贞丰远古社会的演进过程，展现了贞丰厚重的历史。

延续数万年的岩画、岩画前开阔的台地、状若祭台的巨石、原始人群使用的打制石器、直达册亨洛凡连通北盘江的小径，无一不表明：早在距今3.5万年前，贞丰红岩一带就有了人类活动，从原始社会直至唐宋时期，人们就在这里生产、生活，繁衍后人，并逐步形成了以红岩及周边洛凡沿北盘江一带为重点区域的古代文明。

考贞丰在战国、秦汉时期为夜郎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属牂牁郡。据咸丰《兴义府志·地理·沿革》“今贞丰、安南（晴隆）境为汉谈指县地”，《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牂牁郡》载“谈指出丹砂”，《兴义府志·风土志》亦言“永丰（贞丰）州出丹砂，近粤西地”。就音韵言之，“谈指”“丹砂”一音之转，“谈指”意即出产丹砂的地方。丹砂又称朱砂，红岩岩画颜料亦以朱砂为主，其使用朱砂的年代上溯至数万年前。因此，贞丰为牂牁郡谈指县地当毋庸置疑。而谈指县中心区域，则在以红岩及周边洛凡沿北盘江一带。

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牂牁郡》“晋元帝世，刺史王逊分夜郎以南为夜郎郡，领谈指、夜郎二县。”可知，东晋初，牂牁郡分裂之际，牂牁郡谈指县地的贞丰已析出划归新设置之夜郎郡。按秦汉以来“即其部落列其郡县”的羁縻郡县划定原则，谈指、夜郎既同属夜郎郡，当同属一部。又，“夜郎郡，夜郎国也。”夜郎郡即原夜郎本部。故而，贞丰亦为夜郎本土。结合贞丰红岩沿洛凡河通北盘江直达广郁之形势，诸志所记“夜郎临牂牁江”之牂牁江即为北盘江。因古文简略，所谓“夜郎临牂牁江”系指夜郎部临近牂牁江，而非夜郎国邑临牂牁江。

至于夜郎县，则在原兴仁雨樟的交乐（今义龙新区雨樟镇交乐村）。而与夜郎同根同源的亲支部族谈指，从红岩“谷神图”和邻近的册亨、望谟地区保留的“纳夜”（“骆越”转音）、郎卧（册亨古称，反切作“骆”“佬”）等地名中可知，当与以稻作为生的古骆越人（布依族）有关。^①

（作者单位：黔西南州文化广电旅游局
贞丰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参考文献：

- [1] 刘振华、赵凤仪.从狩猎巫术和图腾崇拜看面具起源中的戏剧质素[J].戏剧文学, 2019(1)
- [2] 崔利军、陈林.从遗物遗存看汉代交乐[N].黔西南日报, 2014.11.10.

《樗茧谱》 与沙滩三贤实学经世的意蕴

文 / 谢孝明

【摘要】 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是贵州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三位先贤。他们终其一生勤勉治学，学问淹贯博雅，著作等身，名重士林。三贤生活的时代，正值古老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经历“千数百年未有之奇劫”的晚清时代。内忧外患，时局危殆，他们虽不幸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辛，但他们并不以个人忧患艰辛为甚，而更多关注、焦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们深具家国情怀，以通经致用的学术使命观照现实世界，因而他们的为学趋向具有强烈的知识救世意识和担

当。承循良之绪，撰述《樗茧谱》，以实学裨益于国计民生，彰显的正是三贤的这一为学精神。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考求郑莫黎三贤撰述《樗茧谱》意蕴，光大业已岑寂的绝学，因地制宜发展名优特色产业，对于我们今天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樗茧谱 沙滩三贤 实学 忧患 经世

晚清士林，郑珍、莫友芝并称“西南两大儒”。加之生活于同一时代，但较郑、莫稍晚出的黎庶昌，则前人尊之“三先生”，而今人多尊之“三贤”。由此可见郑莫黎在历史的地位和受世人尊敬。的确，郑莫黎三贤在并世的学人群体中，作为“沙滩文化”三位主将，堪称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终其一生勤勉治学，熟烂经史，博及诸子百家，于经学、小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农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以及书画艺术，无不精研覃思，创获丰硕。三贤学问淹贯博雅，著作等身，名重士林。而他们的为学宗旨则带有通经致用的鲜明特点和趋向。承先贤之绪，撰述《樗茧谱》，以实学裨益于国计民生，彰显的正是三贤的这一为学精神。考求三贤撰述《樗茧谱》意蕴，光大业

遵义沙滩“三贤堂”
(李芳 摄)



已岑寂的绝学，因地制宜发展特名优色产业，对于我们今天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家国忧患与通经致用的为学趋向

清王朝建立后，曾有过辉煌的“康乾盛世”，那时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军队强大，国家统一，无论从哪方面与汉唐盛世相比都毫不逊色。然而极盛而衰，自乾隆后期后，特别是进入嘉道之后，清王朝江河日下，逐渐走向了衰败的道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变都有其共同特点，土地兼并严重，统治集团腐化，吏治腐败，军备废弛，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尖锐，农民反抗斗争频繁，政治危机四伏是其常态，清后期的封建衰世也复如此。但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清朝的封建衰世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这一前所未有的强敌，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却昧于世界大势，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不自觉悟。因此，清王朝的封建衰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多，内忧外患更为严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狂飙突起，古老的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千数百年未有之奇劫”，清王朝进入内忧外患交迫，黑暗如磐，风雨飘摇的末世。这就是三贤生活的充满忧患的时代环境。

国家遭际灾难深重、危急存亡的大世变，三贤又复遭遇个体生命的艰难坎坷。这些艰难坎坷其一是经济的拮据与家计的困顿。郑珍出生贫寒，“家四壁立”。成年以后以游幕和担任教职为生计，收入低微，于家计无补多少。道光十七年丁酉郑珍三十二岁乡试中举，尚贫困艰窘，多得巡抚贺长龄赏识其才华，“极加矜恤”。中年之后，郑珍“益绝念仕进，日以读书课子、种灌宰木为事”“有终焉之志”，然“以贫故”，先后权古州厅儒学训导、镇远训导、荔波训导

等。同治二年癸亥，郑珍已界五十八岁之年，因“贫况不堪，仍欲赴绥定”，投奔在那里做官的挚友唐炯。莫友芝之父与侔，以翰苑词臣，担任过四川盐源知县、遵义府学教授等低级官职，因其清廉自持，宦囊空乏，积无余财，加之子女众多，故生计维艰。所以，莫友芝虽生于仕宦之家，早年生活也很清贫，其传记多有“友芝家贫，嗜古”“君家贫，嗜古”之类记载。莫友芝成家立室，自为家计，多以书院讲席、塾馆为职，“所得馆谷常不贍，粗粝菜根历十余年”，收入菲薄，家计艰难。莫友芝困顿大半生。咸丰十一年，莫友芝五十一岁，已过古人所言知命之年，他投奔曾国藩，仍以“苟得依公为闲客，免饥寒、于愿足矣”为言。不过，莫友芝人生的最后十年，游于曾幕，在曾国藩的照拂下，生计稳定，衣食无忧，才算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同样，较之郑、莫晚出的黎庶昌，早年也经历了饥寒的磨砺。“训导卒于开州，时公方六岁，家贫也，而尪弱多疾，伯兄教之严，祁连寒盛暑不少懈。”黎庶昌六岁失怙，依长兄为活，“百苦具罹，含辛茹素”。二十五、二十六岁赴顺天参加辛丑科和壬戌恩科乡试，“两试下第，困不得归”。后受朝廷委任，发往曾国藩大营效力，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及至曾国藩从两江移督畿辅，黎庶昌的家境仍处于“家贫亲老”的状况。曾国藩死后，黎庶昌卸职失所依，“家贫甚，赴保定谒李鸿章求事，未得。”黎庶昌的家计困窘状况，直到他以三等参赞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才有了根本的好转，甚至生活也开始由俭入奢，“不主故常矣”，失去了清贫的本色，当然是不好的。

郑莫黎三贤经历的艰难坎坷其二是遭受的科举仕途的偃蹇困顿，不能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郑珍十五岁受业舅氏黎恂，十七岁补县学弟子员，之后屡试不售，直到三十二岁才中举。后于三十三岁、三十九岁之时两赴会试，皆不第，从此决意科举，不复应试，科名终于举人。郑珍的宦途，也仅

担任聘秩低微的县级教职，其科举仕途可谓偃蹇困顿。莫友芝情形更为坎坷曲折，虽然他二十一岁中举，早于郑珍十一年，但之后六试不第，最后一次应试已五十岁了，三十年慢慢科举路，多少风霜雪雨、酸甜苦辣，非常人所能道。而莫氏一生，除出任主讲书院和领衔书局，担任一些文教职务和游幕外，几乎未入仕途担任正式的官职。黎庶昌二十一岁入府学为附生，学已大成，但其时，由于苗民起义，贵州停乡举者十五年，黎庶昌克服重重困难，远赴京师两应顺天乡试，皆下第，之后再无应试之举，因此其科名尚不及郑莫二氏。然而，黎庶昌的宦途却非郑莫二氏所及。他不仅在曾国藩两江辖区内署理过吴江、青浦知县，之后，又随郭嵩焘、曾纪泽出使英法，并两任驻日大使，扬厉中外，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贡献。最后出任川东兵备道，多有惠政，为士民爱戴。

郑莫黎三贤经历的艰难坎坷其三是迭遭战乱兵燹和家庭多故的忧危悲痛。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其势力很快席卷江南半壁江山。受其影响，1854年8月，斋教首领杨龙喜于桐梓起义，兵围遵义府城达四月之久，莫友芝适在城中，亲历此次战乱的全过程。此年郑珍得选荔波训导，11月挈家之任逃乱。1855年张秀眉率苗民起义，贵州各地军纷纷起义，黔省更是陷于战火兵燹之中。荔波县城遭苗民义军围攻，郑珍代县令率兵民抗御，县城转危为安。1856年8月，莫友芝家乡造兵燹，故居影山草堂也付之一炬。1862年春，白号军张保山入据禹门寺，沙滩黎氏住宅和郑珍望山堂全被烧毁。在战火兵燹、流离颠沛中，郑莫黎三家藏书和文稿多有焚毁，实为沙滩文化一浩劫。同时，在这场战乱过程中，郑莫黎三家有十余位亲人死亡，变故频仍，使三贤经历太多的人间苦楚、世事沧桑和悲欢离合。

三贤所经历的这些人生忧患和艰难坎坷是交织在一起的。而郑莫黎三家互为师友，

又互为姻亲，是一个休戚相关、荣枯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历史境遇下，三贤的忧患与国家民族的忧患交织在一起，如影随身，直至他们人生的终结。诚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三贤生活的时代，是古老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经历“千数百年未有之奇劫”的时代。同时，这一时代，也是经世思潮翻涌，志士仁人奋身报国，力挽狂澜的时代。湘军名将罗泽南“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左宗棠“万方移难，吾不能为一身一家之计”。这种经世的精神，也同样贯注于三贤的学术与人生践履之间。即以黎庶昌为例，其早年于诸兄弟中“独留意经世之学”，而其发扬蹈厉也为曾国藩所激赏，赞其：“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抗战时期，吴鼎昌刊行郑珍著作，认为郑氏之学必大有裨益于抗战救国的民族大业。其《序》云：“学术为民族思想之精英，其振兴弛废有系于国家之隆替。时值艰危，我民族精神愈趋发扬，扶持固有学术，以冀复兴大业，举国上下咸有同心。”而黎庶昌抗声懦懦小儒，以为学术乃济世觉民的天下公器：“文章之道，莫大乎与天下为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议”，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同一意绪。

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更有积极的进取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内忧外患，时局危殆，三贤虽不幸而饱经忧患，备尝艰辛，然而，“家益贫而学弥勤，志屡乖而志未尝稍懈”，他们并不以个人忧患艰辛为甚，而更多是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和焦虑。他们孜孜矻矻，潜心学术，又以通经致用的学术使命观照现实世界，熔铸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他们的为学具有强烈的知识救世意识和担当。这正是三贤精神贯注、

撰述《樗茧谱》深潜的文化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引力。

二、循吏的惠政与遗泽

郑珍撰述《樗茧谱》其初衷是为了表彰遵义太守陈玉璜的惠政与遗泽，也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以此阐发先贤的遗意，观照黔地经济民生，期以黔北樗茧业能够再度辉煌，造福黎民百姓。

《遵义府志》录《樗茧谱》记述遵义府贤太守陈玉璜关心民生，殚心治道，为民兴利的事迹：

玉璜，字韞璞，山东历城人，由荫生补光禄寺署正，出同知江西赣州。乾隆三年，来守遵义。日夕思所以利民，事无大小具举，民歌乐之。郡故多榭树，以不中屋材，薪炭之外，无所于取。玉璜循行见之，曰：“此青、菜间树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归历城售山蚕种，兼以蚕师来。至沅、湘间，蛹出，不克就。志益力。六年冬，复遣归售种，且以织师来，期岁前到，蛹不得出。明年，布子于郡治侧西小邱上，春茧大获。遂遍谕乡里，教以放养、缲织之法，令转相教告。授以种，给以工作之资，经纬之具，民争趋若取异宝。八年秋，会报民间所获茧至八百万。自是，郡善养蚕。迄今百年，遵绸之名，与吴绫蜀锦争价。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玉璜之力也。道光十八年，题祀名宦祠。

从这段记述，陈玉璜于乾隆三年担任遵义太守，“日夕思所以利民，事无大小具举”，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孜孜求治，为民兴利。他经过仔细观察和思考，发现原本不能成材，只能当薪炭之用的榭树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果用以养山蚕，发展养蚕业，“吾得以富吾民矣”。经过一番挫折与曲折，陈玉璜最终取得了成功，为遵义的黎民百姓开创了一条致富之路。从此，遵义成为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最富饶之地，所出产的遵绸在市场上与久负盛名的吴绫蜀锦竞争也

是当仁不让。这是陈玉璜的惠政和遗泽。也因此，这位封建循吏受到了遵义士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在遵义任上，“民歌乐之”；死后，“题祀名宦祠”，士民祭祀他、纪念他、缅怀他。而百年之后，遵义最著名的学者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著书立说来表彰他的贤德和惠政，继承和推扬他的事业，可谓俎豆千秋，流芳百世。

三、继承先贤遗绪，撰述《樗茧谱》

郑莫黎三贤以学术同道兼姻亲，彼此推重，互相砥砺。作为名重当时和后世的大学者和西南文献大家。他们在治学和著述上多有合作，但多在郑莫二人之间，如二人共同编纂的《遵义府志》，时人以为可与《水经注》《华阳国志》相比，梁启超更是赞誉它为“府志中第一”。而黎庶昌生年稍晚，他能与郑莫一以精神贯注，共同撰述传播的著作则唯有《樗茧谱》一书。

在绝大多数有关郑莫二人的传记资料和研究著述中，排列他们的著作之目时，郑珍总有《樗茧谱》，莫友芝则总有《樗茧谱注》。郑莫编纂《遵义府志》，也将《樗茧谱》及《樗茧谱注》的内容收录其中。除此之外，莫友芝尚有吟咏樗茧诗篇。至于黎庶昌，则在其编纂的《牂牁故事》专辟《农桑水利》一卷来记述陈玉璜的事迹和录入郑莫撰注的《樗茧谱》，阐明蚕事，从而丰富了郑珍的《樗茧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郑珍著《樗茧谱》，莫友芝为之注解，而黎庶昌则推广其说，三人之间默契而自觉接力，以一贯的精神传述一部完整的《樗茧谱》。

另一方面，郑珍撰写《樗茧谱》和莫友芝为之作注，两相时间在他们整个的著述中，写作和刊刻的时间都是比较早的。考莫友芝《樗茧谱注叙》，莫友芝以《樗茧谱》荐之欲求民利的遵义县知县德亨，因郑氏之文书词雅奥，凡人难以卒读，遂为之疏注，其时为道光十七年四月。《樗茧谱》于是年

秋刻印，成为郑珍梓行的第一本专著。当然也可以视为郑莫二人合作撰述的第一本著作，比之他们合作编纂、刊印于道光二十一年的《遵义府志》早了四年。这都说明了他们对这本著作的高度重视。

郑珍著《樗茧谱》，系统而翔实地叙述了放养山蚕，以及缫丝、织绸的全套操作技术规程，是遵义地区劳动人民数百年来，养蚕织绸经验的结晶。养蚕、缫丝的技术要求很严，稍有差池，不是蚕病，就是减产。《樗茧谱》介绍了四十九套技术，从《定树》《定茧》《蚕山》《蚕地》，到《蚕忌》《蚕害》《下茧》《剥茧》《炕茧》《缫丝》，以及《道经》《道维》，还有《蚕刷》《机杆》等工具，都写的十分精细。

郑珍《樗茧谱自序》：

戴君者民也，养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织也。不耕则饥矣，不织则寒矣。饥寒，乱之本也；饱暖，治之源也。故衣食，自古圣人之所尽心也。尧命羲和，为此谋天也；禹八年于外，为此谋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为此尽利也；汤、武诛放桀、纣，为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继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于栖皇，求善此之柄也。无衣食，古今无世道也；舍衣食，圣贤无事功也。

自井田废而食之路隘矣，虽名至治，无干戈而已矣，无灾异而已矣。豪富者无恶岁也，贫苦者无丰年也，为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则倍于古矣。古麻丝葛而已，今则中土之克丝也，西北之毛也、绒也，其名不可胜数也。而为唯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犹仅蔽前也。

古之桑麻，妇功也，皆自为自衣也，余始通易也；虽王后亦亲蚕织以供天子冕服也。今则男事矣，非为衣也，以谋食也。故古之民，上劝之而犹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其力而惜其无地可施也。故虽尧舜亦无法也，有可衣食，任自为也。

今贵州之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

人也，无吴、楚、齐、秦利也。榭茧，先郡守遗以食遵义者也。今食者十之八九矣用田者，且食之矣，皆榭也。但有山也，皆可榭也。榭则食矣，但蚕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义也，非一贵州也。此谱之所以作也。

郑珍在他的序言里，总结了儒家的圣王之治是为民兴利除害。治道的基本要求，是老百姓必须有衣食保障。如果这一最基本的要求达不到，即使圣王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维持社会稳定。所以他说：“无衣食，古今无世道也；舍衣食，圣贤无事功也。”而正是在强调百姓衣食重要性的基础上，郑珍肯定了先郡守陈玉璧所开创的山蚕业，认为这不只是对于解决遵义、解决贵州的衣食问题非常重要，对于贵州以外的地方也一样的重要，这正是他撰写《樗茧谱》的原因和目的。在这里，郑珍表现出他极为鲜明和极为强烈的实学经世的意思。

莫友芝的《樗茧谱注》，则给郑珍的原著增色不少，不仅精细注解了原著中古奥艰深的文字，增加了内容，丰富了山蚕养殖的知识。而且，对于陈玉璧开创的养蚕业的社会价值和影响，还从儒家政治传统的角度作了很高的评价。莫友芝同时对郑珍撰写《樗茧谱》的目的和用心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来分析他的两篇序文。

莫友芝《樗茧谱序》：

贵州府十二、直隶厅州四，属州、县四十八，而遵义县为大县，疆域广袤三四百里，户口二十余万，赋税几敌全省半，岁科乡会人士亦居十二。呜呼，盛矣！而其先广袤者如故也，户口租赋十无四五，岁科乡会如故也，人士十无二三也。何今之美，昔之陋欤？抑其致此者皆有自来欤？

夫遵义之地，岡峦峰阜相攒叠，无一里原，无五里陆，依山为田，皆如梯枕，其土瘠石瘦不可田又不可胜计。以二十万户人衰然耕凿其中，我知各阙口之不给，而何有以输纳租赋，而何暇于陶冶诗书也？而后乃今知陈省菴旧守之诒泽远矣！夫子之言曰“富

之教之”，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尽县而山则难均，难均则多贫，多贫则难安，难安则民皆思去而至于寡，此地势之必然者。而遵义自有槲茧来，寡者日以众，贫者日以富，二十万户罔不含哺鼓腹，怡然于槲阴丝窳之间，而其秀者亦得所凭籍，以优游乎文林义府，争闲雅都丽，以与吴、越、齐、秦人士相轩轻，均无贫，和无寡，既富乃可加教，意在斯乎？

陈公去遵几百年矣！仁声惠政，犹幸啧啧人口，而志乘阙如。因陋就简，再数十年，遗老向尽，一邑之衣而食之、社而稷之者，恐至不能道其姓字。摘果而忘柎，饮羹而忘水，君子有世道人心之患。郑君《樗茧谱》之作，盖大惧乎此也！故首之以志惠也，定树以辨物也。定茧以正名也，别时地、析利病，详其烘靛眠食、居守移下之方，箸其炕煮、缫净、导牵之事，白紬品之良否，明易且要之器用形状，然后以种槲终焉。蚕始即食槲也，终终始始之义也，凡皆陈公以富庶尊民之遗法也。且夫四十八州县，其十九皆山，犹遵义也；山之宜槲，犹遵义也；而户口独少于遵义，赋税独少于遵义，岁科乡会人士独少于遵义。论者以疆域之广狭、土地之肥磽、习俗之文野，不可强而同，吾独谓无有若以槲茧福民之陈公也。不尔，则三四百里之州县，贵州所常有，而遵义一县能几膏腴？能几才俊哉？守土者尽能依其法而行之，则不必陈公而山国尽可遵义欤！

在这篇序文中，莫友芝分析了遵义经济社会状况为什么前后会发生巨大变化，他认为根本原因是陈玉璠开创了一条富庶尊民的养蚕之路。这个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很符合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义理和不患寡而求均平的思想。同时，莫友芝强调，陈玉璠的惠政和功德不应该被遗忘，而其“遗法”，对于遵义、贵州仍然是很需要的，所以郑珍撰写《樗茧谱》是很有价值的，

莫友芝《樗茧谱注叙》：

德云衢明府莅遵义，唯民之利病殷殷

然。耳熟槲茧之法，昉旧守陈公百年以来惠泽滂礴，而邑无志乘，循迹就湮，日思所以表彰之而未发。适邑人以从祀名宦请，大愜所愿，未浹旬，而详牒抵上游矣。既又熟虑陈公法施遵义效如是，贵州州县土地物宜亦遵义也，槲茧何以不遵义也？皆法未施也。乃询友芝以种槲，伺蚕、缫丝、织紬之方，粗穠未能颯缕，审我友郑君子尹草有《樗茧谱》，聊以塞责。而明府是时方延郑君主讲，时其来，及索稿，将授梓以分遗寅好，期各行之所土。此其便民之意与陈公同，而其观成也尤大，诚所谓不朽盛事之美也。

顾郑君书文词雅奥，伯仲乎有宋之陈泰《农》、《蚕》二著间，颇无意于规模《考工》，而笔墨时时与之律，有非过目可了了者。在郑君不过偶焉落简，藉以旌纪前贤，藏之名山，备异日地志掌故，使他人不嗤陋我邦已耳。明府欲称闾名迹，诩饰山县，则是书诚卓矣。而不然者，此斑焉古色、眩于目而棘于口者，将覆瓿不暇，而尚欲以家喻户晓，不几于秦人之入越，夏虫之语冰也哉？因嘱友芝加之音释，辞不获命，暇日逐事咨访，举郑君书细校一过，当疏其难明而附以未备，征文据典，皆在所略，凡三日夜卒业，而叙之如此。呜呼，友芝居遵义十五年，不能濡瀚传记其大夫之贤者徽法，注郑君书而益滋愧矣。

莫友芝这篇序文，其目的，一是支持遵义知县德亨访求良方，为民兴利的行动，因此乐意将郑珍的《樗茧谱》推荐给他。二是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注《樗茧谱》的原因是为了疏通郑书雅奥难识的文字，便于著作流传。而莫友芝的注对《樗茧谱》流传和推广，也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黎庶昌对《樗茧谱》也致力颇多。他辑《牂牁故事》在《农桑水利》一卷中也记述了陈玉璠引蚕富民故事。同时也录入郑珍、莫友芝撰注的《樗茧谱》，宣传蚕事。

在《牂牁故事》中，黎庶昌所录陈玉璠引蚕富民故事与《遵义府志》所载内容大体相同，但更为详细。从文章记述过程中作

者插入的话语可以看出，黎庶昌在编写是书时，曾经做过民间采访，获得了不少信息，所以，他记述的故事内容细节要丰富些。

《牂牁故事》卷十七《农桑水利》记述：

乾隆七年春，知府陈玉璽始以山东榭茧蚕于遵义。玉璽，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年来守遵义，日夕思所以利民，事无大小具举，民歌乐之。郡故多榭树，以不中屋材，薪炭之外，无所于取。玉璽循行，往来见之，曰：“此青、菜间树也，吾得以富吾民矣。”四年冬，遣人归历城售山蚕种，兼以蚕师来。至沅湘间，蛹出，不克就。志益力。六年冬，复遣归售种，且以织师来，期岁前到，蛹不得出。明年，布子于郡治侧西小丘上，春茧大获。尝闻乡老言，陈公之遣人归售山蚕种者，凡三往返。其再也，既于治侧西小丘获春茧，分之附郭之民为秋种，秋阳烈，民不知避，成茧十无一二。次年烘种，乡人又不谙薪蒸之宜，火候之微烈，蚕未茧，皆病发，竟断种。复遣人之历城，候茧成，多致之。事事亲酌之，白其利病，蚕则大熟。乃遣蚕师四人，分教四乡。收茧既多，又于城东三里许白田坝诛茅筑庐，命织师二人教人缫煮、络导、牵织之事，公余亲往视之。有不解，口讲指话，虽风雨不倦。今遗址尚存，邑之人过其地，莫不思念其德，流连不能去。遂谕村里，教以放、养、缫、织之法，令转相教告。授以种，给以工作之资，经纬之具，民争趋若取异宝。皆乾隆七年事。八年秋，会报民间所获茧至八百万。是年，蚕师、织师之徒，能蚕、织者各数十人，皆能自教其乡里。而陈公即以冬间致政归，挽送者出贵州境不绝，莫不泣下也。惟蚕师、织师仍留。自是郡善养蚕，迄今几百年矣。纺织之声相闻，榭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五五五，骈坐而立聆。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又时以茧成来埽鬻，捆载以去，与柘丝相搀杂，为绉越紈缚之属。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皆玉

璧之力也。

黎庶昌记述的这段故事，大意可以归结几个方面：一，陈玉璽勤政爱民，与民兴利，得到士民的爱戴、信赖和支持。这是他在遵义兴办蚕利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二，陈玉璽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生计，所以他在推行养蚕的过程中，就能够不怕挫折和困难，坚持下去，最终获得成功。三，尊重织师、重视人才培养，是陈玉璽能够成功推广他的养蚕事业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四、陈玉璽之后，百年来，遵义的养蚕业很发达，带动了遵义的经济发展。遵绸成为一个重要的丝绸品牌，在市场上可与吴绫、蜀锦竞价竞争。五，遵绸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交流。六，在与外界的联系交流过程中，遵义人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拓宽了心胸，提高了素质。

黎庶昌讲究蚕法，主要是传播郑珍、莫友芝撰注的《柘蚕谱》，其内容条包括考释树名、蚕名。记述蚕事包括：蚕期、缫丝、蚕山、蚕地、蚕树、蚕祥、蚕忌、蚕害、蚕病、蚕眠、蚕食、春蚕、烘种、蛾靛、蛾卵、售种、辨筐、上树、秋蚕、薹林、剪移、下茧、剥茧、茧病、炕茧等二十五个方。面记述织事包括：缫丝、缫别、净丝、道经、道纬、牵经、诸绸、绸病、胰丑、毛茧、汤茧等十二个方面。记述蚕具包括：蚕刷、蚕兜、蚕剪、蚕筍、机竿、排套、沙撮、擎露、茅刷等九类。种榭：树实一则。

郑莫黎三贤生多忧患，他们研究和传播养蚕技术，寄寓了他们经世济民的理想和诉求。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生命的体验证实了《柘蚕谱》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郑知同在传述他的父亲郑珍一生艰苦卓绝的事迹时，惻然深悲之际，又忧惧先人学术将沦为坠绪，成为绝学：“呜呼！先子抱不世之才，生当晚季，辟处偏隅，暂位卑官，羈身贫囊，文章志业，半得之忧虞艰阻之境，岂天之所以玉成在人者，类必如是耶？然茶蘼备尝，以柘食躬衣终世，垂白厄穷尤甚，重足悲矣！而天復（下转第35页）

铜仁杨氏土司的形成与历史功绩

文 / 图 杨通清

【摘要】 铜仁被称为黔东明珠，梵净山、九龙洞、朱砂古镇、碧江古城、石阡温泉、乌江山峡等自然人文景观为世人所熟知，而黔东大地存续700年的土司文化却被人们所淡忘。笔者根据《宋史》《元史》《铜仁府志》《思南府志》等史籍文献及明代以来各时期的《杨氏族谱》之记载，梳理出铜仁杨氏土司之历史沿革及各历史时期对地方的贡献，供地域文化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 铜仁杨氏土司 形成沿革 历史贡献

一、铜仁土司的历史沿革

（一）铜仁土司的形成

铜仁土司形成于宋朝，从杨再西奉召于宋淳熙八年（1181）开辟省溪、铜人大小江时开始，铜仁乃至贵州尚未形成之前，属思州宣慰司管辖；直到明永乐十一年，铜仁府成立，隶贵州布政使司，辖省溪司、万山司、提溪司、乌罗司、平头司等土司；再至清光绪六年（1880）“改土归流”废袭，杨氏土司共存续了700年历史，遍及铜仁全境及重庆秀山、酉阳，湖南湘西凤凰等地区。

宋朝时，杨氏土司逐步形成势力。宋朝初期，由时居务川的思州沿边溪洞万户总管的杨再西，受朝廷指令开辟省溪。进入省溪司后，积极与田氏配合，逐步参与田氏治理蛮民，但由于思州田氏土司统治时间太长，腐败突出，蛮民反抗，民族矛盾激烈，加之田氏土司“内斗”，各地蛮民归附杨氏土司，使杨氏土司政权迅速发展壮大。史载“南宋淳熙间，省溪境内，民蛮判服不常，又半属田氏所据，苗民不能安其身者久矣，以致先经向化，蛮民率多奔向于公”。“宋淳熙八年（1181）诚州刺史杨再思八世孙再西率弟再濛子政疆、政迁等开辟省溪、宙逻、铜仁大小两江，奏请以长子政疆守省溪为洞官。”杨再西二弟杨再濛镇守坝马；杨再西三弟杨再佃镇守提溪；杨再西次子杨政迁镇守龙围、铜人大小江，……；三子杨政刚后裔镇守秀山、酉阳等川东地区。

元代，杨氏土司逐步走向兴盛。元代，铜仁属思州田氏土司的辖区，但在这一时期，铜人大小江及其周边渝黔边界的秀山、酉阳、黔阳和湘黔边界凤凰等地区杨氏土司政权逐步加强，此时田氏土司逐渐衰落。据《杨氏族谱》载：“元，置铜人大小两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隶都云定云等处安抚司”。结束了元初“思播田杨二氏，负固不

下”的历史。

思州田氏内外战争大都是杨再西后裔任武将，创造了思州田氏辉煌的同时，杨氏土司也赢得了朝庭的肯定，强化了杨氏土司的地位，这一时期整个“黔东”“川东”地区划入杨氏土司的辖区。据《杨氏族谱》记载：“遣使纳款，王语二使曰：归语尔主，速归所隶。以全民命”。思州田谨贤受命，于至元十二年越境请降，十四年五月世祖“诏谕思州安抚使田谨贤”“使其来附”。思州附元后，铜仁杨姓土司一并内附。十八年八月，“改思州宣抚使为宣慰司，兼管内安抚使”；二十一年闰五月，改思州“隶顺元路宣慰司”；二十九年五月，“改思州宣抚司为军民安抚使，隶湖广省”。“元至正间，镇远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伪夏明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府，徙今治，宣慰田琛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二矣。”元末，思州从宣慰司降为宣抚使。

明朝，田氏土司因内斗被灾，贵州形成，杨氏土司分别归铜仁府、乌罗府、石阡府管辖。明朝时期是田氏土司逐渐走向灭亡的时期，其原因主要田氏内部发生矛盾，思州一分为二，即：思南、思州。这一时期，贵州省的建制（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形成，贵州田氏土司消亡，杨氏土司分别隶属铜仁府、乌罗府、石阡府。据《杨氏族谱》载：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思南宣慰司田琛、田宗鼎不轨事露草，去宣慰司，祸延诸

长官，易长官为洞长”“永乐十一年三月二日，思州宣慰司田宗鼎与副使黄禧结怨，朝廷改任黄为辰州知府，黄禧暗结思州宣慰使田琛与宗鼎争地相互攻杀，朝廷命镇远候顾成捉二田与黄押京究办，遂将思南、思州两宣慰司39个土司改设八府，省溪、提溪两长官司隶铜仁府”。

永乐十一年，铜仁府辖省溪司、万山司、提溪司、乌罗司、平头司等土司，土司官全是杨氏出任。至此，铜仁杨氏土司处于鼎盛时期。据《杨氏族谱》记载：“正统四年乌罗府废，以所辖乌罗平头两司来属，万历二十六年巡抚都御史江东之巡按御史应朝卿因铜仁土司官不法具，题改设铜仁县隶本府今领县一长官司五”。包括铜仁县、省溪司、万山司、提溪司、乌罗司、平头司，五司均为杨姓土司任二长官，铜仁县为流官制。秀山、酉阳保留了四大杨氏土司（邑梅、平茶、石耶、地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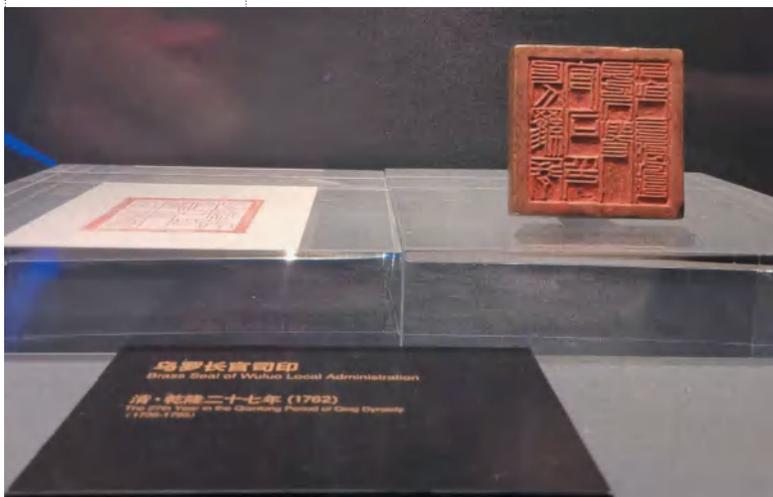
其间，据雍正《杨氏族谱》载，长子通万，袭父职，居赛万，以功授赛万长官司等，改为铜仁大小两江等处军民长官司长官职，沿袭传至明洪武间被思南宣抚头目李渊构婚夺职改为铜仁进义长官司。永乐十一年，铜仁进义长官司李渊与其它四处杨氏土司官一并归附于明。

清初，杨氏土司全部“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消亡。随着杨氏土司全面归附清朝，长官司世袭从康熙至光绪间，铜仁杨氏土司逐步“改土归流”或撤除。省溪司是最后一个撤除的土司，“二十四任成章宏煦之子，光绪二年（1876）袭父职，至光绪六年（1880）废止”，其实是杨氏土司“时值贵州巡抚岑毓英调集川黔湘三省兵力。镇压梵净山黑地大王刘满起义后，奏请改土归流”。

（二）铜仁杨氏土司的发展

从宋至清，杨氏土司作朝廷在基层的自治政权，其名称的叫法不一，有的叫洞长，有的叫“蛮夷长官司”，有的叫“军民长官司”，有的叫“长官司”。“蛮夷长官

乌罗长官司印
（贵州省博物馆藏
杨云鹏摄）



司”“军民长官司”是宋代开始对土司的建制名称，掌军兵、民匠及钱粮等事。明代，又有“长官司”建制名称，以当地首领充任，秩正六品（副长官从七品），为武职世袭土官，管理辖区内一切事务，按例进贡，服从征调，不纳租赋；其建制又不同于蛮夷长官司，宣德二年（1427）规定：“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长官司”。清代土司官的名称、品秩、职责与明代相同，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隶属于兵部。

据《杨氏族谱》记载：“再西（秀初长子）居洪门大都，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袭父职，授金吾将军思州沿边万户总管府（今务川），淳熙三年（1176）父卒，再西兼袭父代伯职，都云定匀安抚使”。“宋淳熙八年（1181）再西公一面呈情，一面率二兄弟三子，以长子政疆为督军。同年七月初九，奉诏开辟省溪吐洞（江口）、宙逻（江口太平）、铜人大小两江、次及川东（注：原四川东部，酉阳、秀山、黔阳等地）安彝等处地方。所到之处，芟险锄凶，随分立洞官，抚彝安境，奏请分茅守土，以长子政疆坐镇省溪，以次弟再蒙坐镇坝马（今坝盘），以三弟再佃坐镇提溪（今闵孝），以次子政迁分镇龙围（今龙鱼）授征蛮将军万户总管职，以三子政纲分创川东，后以其裔分授邑梅军民府，平茶直隶，石耶各司、酉阳、洪安等地。再西是铜仁杨氏始祖矣”。

铜仁杨氏土司的发展情况：铜仁境内有11个土司，即：乌罗（松桃乌罗）、省溪（江口双江）、榕溪芝子坪（松桃甘龙后迁水德江）、瓮遥（松桃平头）、瑶洞（碧江六家洞）、坝马（江口坝盘）、龙泉（石阡城关）、平头著可（松桃平头）、勒畲（碧江龙鱼）、提溪（江口闵孝）、大万山（万山区万山镇）。

重庆南部有4个土司，即：九里江（松桃土屯）、石耶（秀山石耶）、邑梅（秀山邑梅）、平茶（秀山平茶）。

湘西凤凰有1个：五寨（凤凰沱江）。

黔东南境内有6个土司，即：邛水十五洞（三穗长吉）、白岩（镇远金堡）、金容金达（镇远舞阳）、岑松（剑河岑松）、隆里（锦屏隆里）、湖耳（锦屏湖耳）。

明初，铜仁大小两江等处军民长官司为杨氏土司，其间李渊构婚夺职1个，铜仁还有10个杨氏土司：即乌罗、省溪、榕溪芝子坪、瑶洞、坝马、石阡、平头、勒畲、提溪、万山。

二、铜仁杨氏土司的历史功绩

杨再西及其后裔进入铜仁后，承袭了杨震的“廉”治和杨再思的“诚”治精髓，以廉自律，以诚待人，保护蛮民，教化蛮民，兴修水利，发展农耕等“治土原则”，巩固了铜仁及湘黔、渝黔边界地区的土司政权，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维护社会稳定，理顺管理体制

宋时，铜仁土著民族以龙、吴、石、姚、徐、黄、潘等姓氏为主，因蛮夷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战争仇杀，又因赋税较重使官民矛盾突出，特别是思州宣抚使田姓不断扩充地盘，内部管理混乱，民族矛盾一度激化，出现了多次蛮民暴动，朝廷称之为蛮夷

省溪司遗址
(杨忠平 摄)



之乱。杨氏土司为扭转局面，安抚土著民族，严惩暴乱分子，平息了暴乱，因此在民间称杨再西杨政疆父子为“两江大王”。其主要施政措施是：一是以大的自然村寨为单位建立“洞制”，任用吴、龙、石、向、黄等各大姓头人为洞官，理顺了管理体制，实现了“以蛮治蛮”的目的。二是“芟险锄凶，随分立洞官，抚彝安境，奏请分茅守土”，清理社会不安定因素，及时向宋朝廷汇报治土方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按功绩分土治，并世袭管理。

（二）注重蛮民教化，促进民族团结

铜仁在古代属蛮荒之地，杨再西及其后裔进入后，善待蛮民，教化蛮民，蛮民归附，实现了文化融和，民族团结。

一是弘扬飞山文化，朝野信奉，官民和谐。在民间，因杨再思以“诚”待民，深受蛮民敬仰，各地少数民族建飞山庙纪念杨再思，成了各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的保护神。在官方，杨再西后裔发展了“飞山”的“诚”治和“洞”制文化精神，土司治下和谐稳定，深受朝廷器重，因此“飞山太公”九次受封，后清仁宗亲诏题“宣威助顺”匾正式列入府、州、县、厅衙，谕旨各府、州、县、厅衙把杨再思列为正式祭典，例定每年六月六日为侯生辰、十月二十六日为侯忌日，由府、州、县通判亲自率员至当地飞山庙（宫）祭祀，成了国之栋梁、做官的“榜样”。

为方便铜仁当地官员和民众祭祀，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土官李椿组织在东山建了一座飞山宫，后被损毁，万历四十年（1612）由铜仁知府陈以跃重修。《铜仁府志》记载了这一事实，即：“正德间，土官李椿建。万历四十年，知府陈以跃重修，扁曰‘靖边安民’”，并撰文祭祀东山飞山宫。2006年飞山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铜仁市碧江区政府于2011年修复了飞山宫。遗憾的是铜仁飞山宫内没有应有文化内涵。

二是与蛮夷联姻，蛮汉一家亲，民族大

融合。杨氏入主铜仁后，先是为了“政治效果”，土官与蛮酋之家联姻，以平息战争；后是为了“社会效果”，普通杨氏与蛮民通婚，促进民族团结。这成了文化融合的重要形式，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通过联姻或通婚，相互之间生活在一起，习性相融，语言相融，形成了“汉夷一家”局面，至使杨氏后裔多为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在人口普查中，江口杨姓为土家族，玉屏杨姓为侗族，松桃杨姓为苗族等等。

三是杨氏七字辈，与蛮夷共享，加强异族情宜。自唐末杨再思任诚州刺史，以“峒”制为基础，创立了杨氏字辈“再政通光昌胜秀”七字，以分尊卑，沿用至今。其第八世孙杨再西及其后裔进入铜仁后，因当地蛮民没有文化，更没分尊卑的字辈，相互之间在联姻或通婚基础上，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姓氏都沿用了杨家的字辈，如：龙、石、麻、吴、姚、谢、黄、蒋、徐等十多个姓氏也使用杨氏七字辈份，尊长爱幼，写入各自家谱，体现了杨姓土司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情宣和文化融和。

（三）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统一

在宋、元、明、清时期，西南蛮夷土著势力相互残杀、相互兼并的历史洪流中，朝廷一方面考虑土著民族利益，一方面考虑国家统一，于是对蛮夷之地实行“民族自治”，即：实施土司制度，以蛮治蛮政策。只是随着朝代的变更，土司的名称和内涵作了相应的变更，宋末（1260-1279）期间，朝廷为加强对蛮的控制，由原“洞长制”改为“蛮夷长官司”；元朝时期，思州宣慰司田氏归附忽必烈，将“蛮夷长官司”改名为“军民长官司”；明朝时期，思州宣慰司田氏归附朱元璋，更名为“长官司”，沿用至清光绪六年废。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尽管铜仁杨氏土司先属思州、思南管辖，明代后分属铜仁府、石阡府、乌罗府管辖，始终是在维护统一的前提下发展壮大自己。如平播战争，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朝廷疑播州土司有叛逆之意，朝廷派兵围攻多次未果

且损失惨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廷敕令省溪、提溪、勒舍、乌罗、平头、平茶等杨氏土司官兵3000多人参加平播战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如晚清名将杨芳（1770—1846），他长年征战沙场，忠于朝廷，在新疆的平叛战争中，活捉张格尔，晋封为果勇侯，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新疆人民敬称杨芳为民族英雄。

（四）注重农商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劝农立社事理》载：杨氏土司在开辟西南的过程中，坚持立社劝农，适时播种，开垦水利，立义仓，奖勤劳，立社学，助牛耕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重视农耕，改良耕作方式，促进粮食增收。一是立社劝农，发展农业生产。《铜仁府志》均有统计土司辖户、人口情况，这是土司制下的管理方式。二是改良耕地，促进粮食增收。在管区平坦地带，开垦大坝良田，如江口省溪司大坝、凯德大坝都是经过几十代人长期开垦耕作而来。三是改良农耕技术，实现粮食增收。学习汉族的农耕先进技术，大力推广牛耕文化，统计耕牛数量，发展耕牛互助。四是兴修水利，利用水车引水灌溉农田。这些农耕改良，结束了刀耕火种历史。

2. 重视农事，发展农耕文化，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一是掌握节气，适时播种，促进农作物生长。如“讲春”，铜仁大小两江均有“讲春”人，大江为杨再蒙管辖，小江为杨政迁管辖。据江口岑忙老人说，以前大小两江均有不同人“讲春”，因地处两江分界线，两江“讲春”人都不去。“讲春”就是春天到了，每家每户都有一张纸，那天翻地耕牛，那天播种，让农户知节气，适时开展农事活动。对于古代人没有钟表而言，普通农户更不知节气，“讲春”人初为土司制作派人送达。二是实行奖励制度，鼓励种棉养蚕织布，确保境内蛮民“衣良无忧”，安居乐业。

3. 重视农商，开辟市场，促进商业发

展。一是开集市交易农产品。实行定期的境内“赶场”，一般是每月一次，把农产品拿到固定集市进行交易，后从每月一场发展到每五天一场。同时，在边境地区扩大边境贸易与交易。二是建立粮食仓库，帮助民众在灾年度过难关。如“杨百胜，乐善好施，道光元年，岁大饥，米贵于珠。百胜出粟减值、平市价，并赠乡里日用油盐，所济甚多”。

（五）注重人才培养，立“家风”树“榜样”

1. 建立助学机制，促进人才培养。如《杨氏族谱》载：和平土司建立的资金助学制度，几百年以来一直实施，设有祠堂公田，分租给其它人，收入归祠堂所有；同时建立助学基金，每户收取固定的钱物作为助学基金，贷于贫寒有志之士，凡入会家庭子女都可以申请，培养了一批朝廷官员。主要人员如下：

明朝杨光德，岁贡生，正德辛巳，任四川夹江县主簿，寻调丁内艰起补湖广孝感县主簿，升桃源县令；杨昌伟，岁贡，隆庆己巳年，任四川南川县训导，癸酉升四川江津县教谕，丙子升贵州普定教授；杨昌言，岁贡，隆庆丁卯，任四川隣水县训导，隆庆壬申任升四川渠县教谕；杨胜迪，字明康，由岁贡，任乌沙教谕，升福建彰州府教授，又升四川长太县署理县事，升四川重庆府通判；杨秀麟，字仁辅，天启癸亥由岁贡任四川珙县训导，升陕西隆德县教谕；杨秀獬，字贞甫，中万历戊午科乡试会试，始任河南开封府河阴教授，又升湖广德安府安陆县知，后调福建泉州府县知县，万历二载升湖广荆州府归州知州等等。这种“公田”助学制度为贫寒学子争取上进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除此之外，铜仁杨氏还培养了若干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杨栋秀（号云埔），再蒙后裔，居铜仁坝黄屋场沟。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后改授汾州府、潞州府、太原府、绍兴府知府。光绪五年（1879）与杨芳重修省

溪族谱。又如：杨秀涛（1896-1979），贵州省江口县人，当时在省溪司就是靠宗族助学培养的人才。是江口中学创始人之一，获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硕士学位，著名画家、教育家。在法留学期间，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引导和帮助，多次参加周恩来同志主持的革命会议，他开画展积极筹措经费支持革命。回国后，最后留在家乡一生从教。

2.建乡贤堂，树“家风”立“榜样”。早在1422年，杨氏族人在铜仁府城建有杨氏乡贤堂，经过三次扩建，后改名为杨氏祠堂（原地区公安处附近），于解放后被改造为竹器厂，在原杨氏祠堂里有杨氏文化传承。在乡贤堂，陈列有各个时期杨氏名人传记，如杨政德、杨政华，供后人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如：2017年6月17日《铜仁日报》头版刊登的《省溪司杨氏家风传千年》的文章，有“忠君爱民杨秀铭”“倾心教育杨秀涛”“淞沪抗战八勇士”“一心为民杨再炼”等先进事迹广为流传。又如：抗日英雄杨胜治等书写的《杨氏的忠烈故事》。这些人物和事迹皆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六）注重廉洁自律，承袭清政家风

杨氏土司世袭制下，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和家风家训，对为官要求甚严，出了一批又一批清廉官员。如：“杨秀冕，铜仁人，举人”“为令七年，致仕归，囊仅积俸百金。萧萧环堵，诵读自如，只字不入公门者四十馀年。卒年八十。”又如，杨如皋，谱名政

军，字师虞，再蒙后裔，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进士，任顺天府玉田县知县，后升云南道监察御史，为官清政廉洁、严惩贪腐。

对土司官犯错误，必须严惩严办。据《省溪谱》载“杨光能（杨再西曾孙）于南宋宝佑六年（1258）三月十七日承袭父（通铭之子）职，后失职不称其位无道，被众房灭之，并将其吐洞地方占领，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九月十六日由其弟杨光浓袭职，改授龙虎卫上将军，任思州沿边溪洞万户都总管世职。”

综上，杨氏土司文化具有700年的悠久历史和历史功绩。同时，写此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重拾被人们遗忘的历史，意在为“一带双核”建设增添土司景点提供文旅参考，以吸引游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文

（作者单位：铜仁市万山区司法局）

参考文献：

[1]（嘉靖）思南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务川自治县委员会.编印本.1990

[2]杨再思氏族通志概论[Z].杨氏族谱//（清）杨芳、杨栋秀纂.刻本.1827（道光丁亥年）

[3]江口县志[M].江口县志编纂委员会.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点校[M].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5]（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M].元文类//卷六五.苏天爵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嘉靖）思南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务川自治县委员会.编印本.1990

[8]铜仁府志·民国缩印本点校[M].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室、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平茶司土司府
（杨正斌 摄）



从《皇清职贡图》说贵州僰人

文/图 王 义

“僰(bó)人”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待君篇》,其记载为:“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说文人部》:“僰”,键为蛮夷,从人,棘声。其意为“生活在刺巴林里的人”或说“棘从中生活的人。”“僰”与史书记载的“濮”是一回事。中原人将其西南诸族统称为“濮”,又称“百濮”。

一提到僰人,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关于僰人之源,历来有土著、迁徙二说;对僰人族属,有氐、羌(彝、白)、濮、越诸论。以考古资料,甄别其语言,僰人即《礼记·王制》中“西方日棘”的棘人。

一、贵阳僰人概述

从相关资料和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皇清职贡图》上发现:早在公元前1045年,棘(僰)人就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其后随着西周的建立,棘(僰)人首领受武王封侯,建立棘(僰)国。其治在今河南省永城县的古吴越与楚国相互对峙的分界线上。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越国被楚所灭,棘(僰)国则随之崩溃,棘(僰)人随即南迁,定居于僰道。僰人

继承和发展了百越民族的稻作文化,创造了西南地区独树一帜的“千顷池文化”。春秋时期的棘人,就是先秦时代的僰人,是地地道道的百越民族。四川省《珙县志》(旧志)上说:“珙本古西南夷服地,秦灭开明氏,僰人居此,号曰僰国。”

北宋政和五年(1115),僰人在首领卜漏的带领下,在僰王山上筑城堞、修寨门,聚众造反,揭竿起义,但被宋军用“火猴战”打败,僰王被宋军擒获后招安。僰人兵败僰王山后,在400多年的时间里偃旗息鼓,在滚滚历史长河之中,云贵川三地的僰人不断的发展壮大,成为西南一带,少数民族的领袖,此时的官方组织早已经对他们虎视眈眈,特别是僰人的性格,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但是不受管束的性格也让官方机构忧心忡忡,历朝历代以来,僰人都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明朝万历元年(1573),距1600年“平播”前7年,估计与“平播”事件有关,再次在兴文、珙县两地造反,明王朝派四川总兵刘显、刘挺父子率领十四万官军大举围剿,最终在四川兴文县九丝将僰人彻底剿灭,僰人从此销声匿迹。

二、普安州属僰人说解

由于所讲的“僰人”长期与本民族的居区隔离，致使贵州的地方文献中对他们的记载鲜少，长期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民族识别工作往往是以省为单位去分别进行，不容易建立起全局性的观念，这乃是聚居区的白族，长期以来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个“远房宗亲”在贵州存在的客观原因。然而不管世人如何看待他们，甚至不管学术界是否引起足够的关注，他们作为白族的一个有机部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皇清职贡图》卷八“僰人”的这一记载，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总体上把握白族和白族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白族早期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条资料至为珍贵。

（一）普安州属僰人

僰人，在唐为于矢部、元属普安安抚司，明置普安州，仍以土州同领之。清康熙四十年改土归流。男女皆披毡衣，垢不沐

浴。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岁首，朔望日不乞火。性淳好佛持诵，梵咒凡保罗、仡佬、仲家苗，言语有不通者，常以僰人传之。

（二）图文注释

1. “僰人”，“僰”字作为族名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典籍《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等，以上记载那提及“僰”等称谓，在这些名称中“僰”都是指古代民族。但“僰人”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组成，是元代才有的用词例。此处的“僰”，作为贵州白族古代先民。“于矢部”，唐宋时期，“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之一”，该部在唐代势力鼎盛，一度控制了整个黔中和黔西地区。当时的水西、乌撒等地彝族势力都曾受其控制。其后大理兴起，该部又臣属于大理，随着水西彝族乌撒势力的强大，其原有领地逐步缩小，在黔中属地逐步地被水西夺取。到了元朝初年，普安、乌撒、水西构成贵州族的三大势力集团。“普安安抚司”，即普安陇氏土司、“普安州”，明永乐十三



图片选自
《百苗图抄本汇编》

年置，治所位处今贵州盘县西北。

按：明代的普安州辖境甚广，涉及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普安、晴隆两县全境，兴仁县的一部份，今六盘水市、盘县全境，总面积近五千平方公里，万历三十九年改属安顺军民府。雍正五年改为南笼府。嘉庆二年，改南笼府为兴义府，故该地求属兴义府统辖。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原为彝族土司领地，在唐末时被称为于矢部。故如前文称“梵人”，在唐宋时被称为于矢部，“州同”官名，知州的佐官，属于直隶州的，相当于同知。需要注意的是原文加有“土”字，意在说明该州同为当地土人世袭相当，故称。

2.“康熙四十一年，改土归流”，全句是指康熙四十一年，清廷裁普安州土州同，将其统领地划拨给普安州统辖一事。查《圣祖实录》卷二一〇载，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朝廷“裁贵州普安州土州同，其版图、赋税归并普安州知州管理”，此处的原文记，即以此为依据

3.“披毡衣”，如前文言。梵人属氏羌系民族，早年从事半农半牧生计，用羊毛诸家畜毛制作外披，乃是其农牧生活衣着习俗上的反映。从男女皆披毡故可以据示其氏羌文化的传统。按：氏羌系统民族，一般多生息在海拔高区段，从事游牧生活，这样的地区属高寒区。氏羌系民族在该区域生活形成了使用披毡习俗。这样的披毡多由羊毛穿在身上，大可以卸寒，雨天可以防雨，冬天可以卸寒，甚至还可以搭建帐篷。在明代，此披毡还成了羌民上交给朝廷重要的军事物、品等。《太祖洪武实录》卷四十三载，洪武十七年辛丑，乌撒回二月王星，贵州宣慰司霭翠来朝，及“《太祖洪武实录》卷一六二载：洪武十七年辛丑乌撒，岁输毡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乌撒、茫部皆岁贡八百领。”《东川府志》卷十八《物产·方物附》亦载“毡服，明东川面市中，有毡衣四百领”，等等。“垢不沐浴”，是说明他们长期不洗澡。

4.“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岁首，朔望日不乞火”，全句是以汉族农历计算人的岁首。其中在朔日和望日，梵人皆有不向邻居讨取火种的禁忌。该以上记载值得关注，汉族农历的六月，在早期的佛经译本中被确认为迎牟尼的成道日，因而此处的岁首不能做习惯性的理解，而需要与早期佛教或南传佛教的典籍相衔接，才能理解其原意。至于“朔望日不乞火”，则是来自于古氏羌民族传统的习俗。

5.“性淳好佛，性情单纯，信仰佛教”句，按：此处的佛泛指佛教的各种信仰，包括敬佛、诵经、供养僧侣等。“持”，此处是用其引申义，意指坚持某种宗教信仰。“诵”，诵读。“梵咒”，指梵文原版的佛教咒语，注意这是早期佛教的宗教仪轨。

6.“保罗、仡佬、仲家苗”，指贵州西部的各少数民族，其中保罗，即彝族。“仡佬”，即指仡佬族和苗族。“仲家苗”，即布依族。“不通”，指因为民族文化差异，不能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传”，原意为传播、传达。此处当理解为沟通和翻译。

（三）图解

《皇清职贡图》卷八“普安州属梵人”男妇图是以“性淳好佛”作画，其中男图反映的是一梵人男子手捻胸戴佛珠，身披毡衣，头戴礼佛帽正在进行礼佛活动的情景，而女图画的是—妇女双手合一，胸披佛珠，口念梵咒走在路上的画面。以上两图反映了梵人信佛范围十分广泛，男女皆有，这与我我国其他地区的礼佛活动有别。其次是他们信仰佛教，但没有形成职业性的僧侣举行宗教活动，都是民间信仰。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图中执行礼佛活动的男梵人是赤脚，而女图则是穿着鞋。这一画法真实反映了佛教的实际。早期的印度佛教信徒均打赤脚，特别是在礼佛的时候必须赤脚。南传佛教一律不穿鞋，进入寺院的信徒也不能穿鞋。但在走路时，却穿有鞋，这些画法符合早期佛教的传统。如前文言，梵人属今白族的先民，属氏

羌系统，氏羌系统民族中崇信佛教的主要有藏族、白族等。但藏族信仰的是藏传佛教，而不是北传佛教。西南的白族地区在隋唐之际从汉族地区传入北传佛教，并影响到当时的南诏和以后的大理政权。由此可见，文中的樊人可能是南诏、大理政权的遗民。同时利用唐宋不直接干预其民族事务的时机，向东拓展，因而樊人很可能是南诏大理时期流入于矢部的彝族或白族军人或民间集团。以后由于社会的剧烈动乱，这些樊人在接受佛教后，但又与其他佛教失去了联系，故在礼佛活动中，特别是图画中，没有在庙宇中拜佛像，而是在野外崇佛的情景，这与中原唐宋时期佛教有很大的差异，也体现了原始佛教早期的特点。故以上图画对于我们了解早期佛教的特点，探讨贵州樊入的来历和南诏大理政权时期边疆历史有着积极意义。

（四）附录

1. 明万历《黔记》卷五十九《诸夷》



图片选自
《百苗图抄本汇编》

载：“樊人，十二营长部落，皆罗罗，仲家、仡佬、蜒人，语言不相谙，常以樊人为通事译之。性悍戾，倔强好斗。服饰、居处、婚丧、嗜好皆与宣慰司罗罗同。按：这一记载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肯定他们为氏羌系统的民族。其二是肯定他们在语言上具有充当翻译的特殊技能。其三是肯定他们为普安土司的下属贫民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土司宗族成员。因而他们不属于彝族，而应当是白族的居民。

2. 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蛮夷》载：“樊人汉为〈犍〉为郡，唐为于矢部，尽南诏之东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樊，言使逼寄于夷也。其樊人善事佛男女手数珠，持番咒祈祷辄验，多有削发为僧者，号曰提奢。稍淳而易治，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谓虎曰‘金波罗’。”按：这一记载极为珍贵，其中隐含着早期佛教的众多内容，与中原的北传佛教差异甚大，因而是了解白族早期信仰和早期佛教的重要资料。不过文中所称的南诏，事实上是兼指南诏和大理两个政权而言，非专指南诏。

3. 清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载：“樊人在普安州土官各营。男女皆冠毡片。垢不沐浴，与滇之僮同。”

按：“普安州土官各营”句，元明两代的普安土司下辖十二个营，每个营各有名称，此见载于元明两代正史，其中马乃营在明清两代影响最大。明永乐改土归流后，普安土司改任为世袭土同知，但其所辖十二营建制，仍然为彝族各家支首领所统辖，这一格局直延伸到清代，故此处的“土官各营”，就是指这十二营而已。之所以要称为“土官各营”是为了避免与清军各旗营相混，而特意追加的说明。

4. 康熙田雯著《黔书》卷上《苗俗》载：“樊人（【按】接，土司有保计、鲁土、布雄各营，散在各属。侯计在今盘县，鲁土在今兴仁县，辛酉八月附识）在今普安州土官各营。男女皆冠毡片，垢不沐浴，与滇之僮同。”

5.清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苗蛮》载：“僰人在晋安州土官各营。男女皆披毡衣，垢不沐浴。凡保罗、仲家、仡佬言语不相谳者，常以僰人通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于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朔望日不乞火。性淳而佞佛，常持素诵梵咒。”

按：“土官各营”与上文所载“上营各营”含义相同，都是指由彝族各家支头人世袭掌管的各营。

6.清谢圣纶著《滇黔志略》卷二十九《贵州苗蛮》载：“僰人在普安州土官各营。男女皆披毡衣，垢不沐浴。凡保罗、仲家、仡佬言语不相谳者，常以僰人通传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于六月二十四日祭天过岁，朔望日不乞火。性淳而佞佛，常持素珠诵梵咒。”

7.《嘉庆重修统志》卷五〇一《安顺府苗蛮》载：“僰人评见兴义府。”

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一四《普安直隶厅苗蛮》载：“僰人居深山中，男女皆冠毡片，垢不沐浴，与滇之保保同。”

按：遍查《嘉庆重修一统志》诸府厅志有关苗蛮的记载，兴义府无“僰人”记载项故安顺府苗蛮言“僰人详见兴义府”误。

9.清李宗昉《黔记》卷三“僰人”载：“僰人在普安厅各营司。性淳佞佛。凡保罗、仲家等苗，言语不相谳者，常赖僰人通之。”

10.刘雍藏《柒拾貳苗全图》“僰人”载：“僰人在普安各营司。男女皆披毡衣垢不沐浴。性惟佞佛，每置经于岩洞中，礼拜以申诚敬。凡保罗、仲家、仡佬等诸苗，言语不相谳者，常以僰人通之。常诵梵咒。”

按：“每置经于岩洞中，礼拜以申诚敬”句，这一记载乃是早期佛教的宗教仪轨，其要点为不竖立佛与菩萨的雕像，而对佛经极为尊重，往往要藏在隐蔽之处，信仰者直接拜佛经，而不拜佛像。因而僰人保持这一传统，足以证明，其先民早年曾经接受过早期佛教，其传入的路线显然不是从内地传来，而是由海路由缅甸传入，否者典型

原始佛教仪轨就不能在白族部分人群中得到延续。而这一史料对今天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佐证价值。

11.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九《苗蛮》载：“僰人威宁、兴义县、贞丰、普安县、普安厅有之。男女皆披毡衣，不沐浴。六月二十四日为度岁，朔望持斋梵诵，通各苗语。”

按：这一记载对人在贵州的分布区有了详尽的说明，值得参考，大致而言，唐宋两代于矢部的核心范围在后世都有人分布。

三、贵州白族简况

从相关资料得知：居于今贵州地区的白族群体自古就以各种称谓呈现于文献，并参与建设了古代贵州各个地方性“方国”，如春秋时的牂牁，战国时期的夜郎国和西汉时期的夜郎县（前126年）。

秦汉时期，活动于在今贵州西部地区的白族先民群体的称谓有白蛮等，宋以后，主要称谓有僰、白蛮、爨并炯蛮。龙家、罗苴等，明清、民国至20世纪中期，其主要称谓因地域封闭等原因更是多而杂乱，有“民



图片选自
《百苗图抄本汇编》

家”“龙家”“南京人”“七姓民”“白儿子”等以及“段氏”“尚氏”“杨氏”等家族性白族遗裔群体现。

贵州白族约逾20万主要分布在该省中西部之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4个地区。按县域及人口数量看，大方、盘县水城、织金、毕节这五个县人口最多，约逾贵州白族人口数量的60%以上，（水城县与钟山区分治后，后者约有10000余白族人）其他主要分布区为西秀区、钟山区、威宁县、赫章县、普定县、纳雍县、黔西县等。此外贵阳市、黔东南岑巩县内约有5000余人，岑巩县的白族估计由湘西地区因种种原因迁移而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省在白族小聚居之地建立了15个白族乡，白族被明确为贵州省世居民族之，同时也被贵州中西部区域的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确定为当地世居民族之一。贵州白族姓氏按人口数量主要有：赵、段、谢、杨、钱李、祝、肖、钟、焦、周、张、刘、苏等，相对而言，其民族文化总体程度在贵州民族地区较高。

贵州白族没有大的聚居区，分布形式基

本上是散居，小聚居。没有自治县，甚至连一个单独成立的白族乡都没有，只有人口较为聚居的村寨，所以白族人口较多的地区都是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成立联合的民族乡。

现在贵州白族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民族乡有如下几个：

六盘水市有：水城县龙场苗族白族彝族乡，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盘县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共计4个。毕节市有：七星关区千溪族白族乡，阴底族苗族白族乡；黔西县绿化白族彝族乡；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普底族苗族白族乡，核桥族白族乡；织金县三甲白族苗族乡；纳雍县库（音社）东关族苗族白族乡，昆寨苗族彝族白族乡；赫章县松林坡白族苗族乡。共计11个。白族人口除了分布在上述民族乡，还有些白族人口相对较多的对寨分布在毕市与六盘水市的其他乡镇安顺市普定县讲义寨有白族600多人，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白族村寨。❶

（作者单位：贵州省话剧团）



贵州白族女青年

参考文献：

- [1] 樊[EB/OL].<https://baike.so.com/doc/2403847-2541516.html>
- [2] 马国君、刘锋、李红香.皇清职贡图·抄本汇编[M].杨庭硕校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 [3] (清)傅恒等纂.皇清职贡图·贵州诸夷研究[M].门庆安等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 [4] 马国君等著.皇清职贡图·抄本汇编[M].杨庭硕校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356
- [5] 马国君等著.皇清职贡图·抄本汇编[M].杨庭硕校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358
- [6] 马国君等著.皇清职贡图·抄本汇编[M].杨庭硕校订.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360

黔东北傩坛绝技

文/图 喻诗涵

居住在梵净山麓的土家族和苗族，不仅流传有众多的傩愿日，而且还流传着许多惊险神奇的傩技绝活，堪称“中华一绝”。如“上刀梯”“上剃头刀”“纸包火”“下油锅”“踩铧口”“开红山”“吃碗”“悬斗”“喝卡子水”“钉鸡”“白马悬蹄”“雪山令”“过天桥”“脚踩碎玻璃”“吃香火”“吞玻璃”“口含红铁”等。

上刀梯——是傩坛中还“刀良愿”的一种法事。在场地中央，耸立着一架十八层三十六把锋利的刀梯，只见傩法师从一层一层刀梯踩着把一把把锋利的刀刃攀登而上，上到顶端时，在空中展翅，手舞足蹈，令人惊心动魄。接着，他又从顶端逐一往下踩着刀口，直到底层，光着的脚板毫无损伤。

上剃头刀——其程序和过程与上刀梯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所上的刀是锋利无比的剃头刀。比上刀梯更惊险，更吸引观众。

纸包火——又叫八卦纸。傩法师用一张普通白纸铺在地上，中间盖上一个碗，用手指着白纸念一通咒语、画八卦图，然后铲一堆燃得通红的炭火倒在白纸上，傩法师边唱边跳数分钟后，把炭火拿走，而白纸仍完好无损。常言说：纸包不住火。但傩法师却能办到。

下油锅——用两公斤菜油倒进油锅，放

在火炉上烧滚，使油的温度达到极点，然后傩法师挽袖，清水净手后，坦然走向翻滚的油锅，用手插进烧得滚滚翻腾的油锅里，来回搅动，捞出事先掷下的豆腐等，手指手板一点不被烫伤，再用手在油锅里自由自在地“洗手”，根本不怕烫伤，实在神奇。

踩红铧——这是一项扣人心弦、惊心动魄的傩技绝活。其过程是将犁田用的铧口烧得通红，先从火中将红通通的铧口用铁夹夹出放在地上，然后傩法师通过一定的秘密手法后，赤脚在烧红的近1000度高温的铧口上任意踩踏，只听得双脚被烫得哧哧作响，但见油水直冒，可傩法师却安然无恙。

开红山——初听使人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神奇的事。观看表演，令人怵目惊心的是，不知傩法师用了什么秘密手法，才产生这种超凡的“法术”。他当着观众的面，用锋利无比的刀尖对准自己的脑门猛钉进去约三公分深，绕场圈，然后请观众拔出刀子，在纸上滴上几滴鲜血后，血立止，伤口立合。

吃碗——傩法师把瓷碗口沿放进嘴里，只听到一阵阵咔嚓声，很快只剩下了碗底，嘴里一阵吃炒包谷似的响声后，碗底已被嚼烂，吞进肚内，而口腔、内脏无损。

悬斗——傩法师用一根木秤杆，正正

地插进装满二十多斤重米的瓷坛里，然后提起秤杆，那米坛随着秤杆往上提起，像粘紧一样，米坛不会脱落。当把坛里的米统统倒出，让观众仔细看看坛底里并没有什么勾挂或粘合物，再次把米装进坛里，再行第二次表演，当秤杆插进米坛，又顺当提上来。但秤杆由观众试提时，怎么也提不起来。让人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

喝卡子水——雉法师面对观众用钢刀把一支支筷子砍成数节，每节长两寸左右，然后含在嘴里和着清水吞下肚，每表演一次可吞下数节两寸长的筷子，就像吃糖一样，别有风味。

定鸡——雉法师左手举起一只大公鸡，将鸡头贴在一根木柱上，右手把一根筷子粗的四寸圆钉从鸡的左眼穿进，右眼穿出，再把鸡钉在木柱上，鸡一阵扑腾、蹬抓、扇翅、挣扎后，脚伸直了，翅膀不扇了，观众以为鸡死了。四、五分钟后，拔钉放鸡，鸡眼未见出血，亦无伤痕，丢在地上不到半分钟，鸡就从地上弹跳起来，伸颈引脖，摇头晃脑，转溜着眼睛，发出“咯、咯”叫声，似在寻食。

白马悬蹄——表演时在雉坛左右各摆一个碗，碗里装满米，然后雉法师把两条长凳的各一根腿放在碗里，其它各三根腿离开地面悬空，凳子居然能悬在空中纹丝不动。

雪山令——雉法师吹起牛角，手摇师刀，边唱边跳，然后把牛角栽在板壁或木柱上，牛角贴紧后纹丝不动，形成勾状，上面可以挂师刀、排带(约二市斤重)而掉不下

来，雉法师拔下牛角，壁或柱上痕迹全无。

过天桥——表演时用七十二条板凳宝塔式重叠起来，上面搭上红布，形如天桥，雉法师身穿法衣，手执师刀，肩插法鞭，脚穿白边新布鞋，从“天桥”上走过，甚是惊奇。

脚踩碎玻璃——雉法师先把一大堆碎玻璃散撒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光着脚在碎玻璃上踩来踩去，如履平地，没有异常感觉。

吃香火——雉法师捏着一把香，用火点燃，火花点点，浓烟缭绕，然后把点燃的一头往嘴里塞，再取出，接着又把一支支香炷点燃，再用嘴含着一支支地咀嚼用水吞下往肚里咽，象吃米面一样，仍喜笑言开。

吞玻璃——雉法师先把玻璃瓶若干个用铁锤打碎，然后用牙齿咀嚼成粉末，再用水吞进肚中，当众表演多次，总是津津乐道，没有异常变化。

口含红铁——雉法师把放在火炉里烧得通红的铁板，用嘴含住铁板，嘴里的口水淋在铁板上，发出吱吱声响，冒出青烟缭绕，而口、牙、舌却安然无恙，一点不被火烧伤烫焦。使人看了毛骨悚然，惊味十分。

近几年来，许多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先后多次对梵净山雉文化进行考察，经现场勘察，不少专家对梵净山雉文化的研究价值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近年来，梵净山土家族苗族雉戏老艺人在北京、深圳、河北、陕西、广州等地以及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多次表演中，他们的雉技绝活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文

(作者单位：铜仁华友机动车检测中心)

雉技悬斗表演

雉技上刀山表演

雉技踩红铧表演



布依族“搭桥”民俗

文/图 岑海燕 王忠寿

布依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代表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贵州省的南北盘江流域，是贵州世居稻作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岁月演进中，布依族人凭自己的生存智慧，建立了一套丰富多彩民族生活习俗，其中，布依族传统“搭桥”仪式就是既神秘而又发人深思的宗教习俗。

一、布依族“搭桥”产生的根源

传统文化中，各民族均有传宗接代的思想。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赵岐的《十三经注疏》注解为：“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这里的“后”广义上就是指“后人”，狭义上专之“传宗接代的儿子”。

布依人民居住在中国西南部，志书统称的“苗蛮”地区，由于中原文化传入较晚，居住地区人烟稀少，生产条件较为落后，生活上缺医少药，长期忍受着饥饿及各种疾病的威胁。布依人在民族崇拜、民族信仰活动过程中，出于对神的尊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求子习俗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认可，演化出“搭桥”“供土地

庙”“立指路碑”“换种”“找保爷”等求子、护子习俗，形成独有的宗教礼仪。在这里，我们以点带面地重点从“搭桥”仪式来看布依人的求子习俗。

二、布依族的“搭桥”仪式

布依年轻夫妻若在结婚的三、四年后，夫妻双方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生育，没有子嗣。布依族老人们一般不从医学角度去分析考虑，而是把不能生育归咎于年轻夫妇中的某一方因某语言或行为得罪了神灵，也或两人命理不合，再或说孩子积德行善造诣不够，需要请巫师看一个吉日良辰，做一个仪式进行化解。这个仪式，布依人把它叫“搭桥”。搭桥，是千百年来布依族人用来“修阴功、积功德”“逆改命数”的重要礼俗。

搭桥当天，夫妻双方的家族成员都要该早早地聚在一起。丈夫一方的姑妈接受小夫妻的请求，回家后在房前屋后或田地里砍一棵竹子。用竹条编制一个桥栏，利用红绿两色的纸张剪出纸桥花，粘贴在桥栏上，完成手扎桥花后备用，同时要在家中准备好猪、牛、羊等各种祭祀肉食。然后邀请村里其他家族的村民参加搭桥仪式，村民会在搭桥当天为小夫妻送来各式各样具有红、绿两色的

物品，如彩色的糯米饭、红、绿两色纸桥花及煮鸡蛋等。

准备好必要的物品后，搭桥仪式就要在选定好的良辰吉时开启，搭桥仪式分两步进行。首先是搭建“田坝桥”，这是一个请神送子的仪式。搭桥地点要选一处过往行人众多的显眼田坎或沟坎，在其上搭建一块宽大平整的石板，由巫师在石板上摆放祭祀物品，燃烛点香烧纸，念咒施法，借助祭品，请求传说中的红绿花神为年轻夫妇送子。期间，还需要将家族中的长辈妇女请到“田坝桥”周围，所站之人应背一个空背带，寓意需要为家族背着大孙子回家。仪式结束后，主人家会将两色鸡蛋和糯米饭分送给过往行人，并尽可能全部吃完。

其次，在完成“田坝桥”搭桥仪式后，还要立刻返家“搭房门桥”，这是一个接子到家的仪式。搭房门桥仪式的地点选择夫妻婚房，在房子的门外两边同时插上两根竹子，称为栽竹。在门槛上方摆放桥栏及祭品祭祀，巫师重新念咒施法，口中默念为主家求子祈福，祈祷诸天神灵显威降旨，赐子送福，并保佑家族所有成员都能健康、吉祥如意。用过的桥栏会一直摆放或悬挂在婚房中，直到夫妻生子后还愿时才烧掉。在搭桥仪式结束后，家族内的妇女与外家的妇女会组织对歌，歌词内容都是相关搭桥所寄予的祝福和期望，庆贺搭桥的成功。

当然，由于布依族居住地域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搭桥仪式略有差异。如有些地区会让巫师先用选好的竹条编成一个小竹筐后，在竹筐的外表面贴上不同颜色的小纸人，这些小纸人可用剪刀剪成手拉手形式的。在不同祭祀过程中，有的巫师会默默祷告，静若处子；有的巫师大声诵读，神灵附体，唱跳自如。

三、布依族的“搭桥”存在的现实意义

首先，搭桥仪式有疏解不育夫妇的心理

压力的作用。在搭桥等仪式的求子过程中，布依族人坚信凡人通过巫师作法能与神灵对话，搭桥仪式整个过程中，祈祷者、巫师、与神灵保持十分和谐和默契的对话关系。主人要心诚，要怀着敬畏和虔诚之心进行祷告；其次还要将所有的程序全部执行到位。仪式的结束，代表礼成，即主人的要求已经全部向神请示，通过祭祀与作法，神已经同意赋予不育夫妇的生育权利。主人会放下心理包袱、解除心理压力，憧憬美好未来。

其次，搭桥习俗具有传承的延续性。任何事物能够传承下来，并在民居有生存之地，一定是有其生存原因的。布依族视不能生育为社会与家族污点，因此不能允许妇女婚后多年不育。一旦谋一妇女通过“搭桥”怀上了孕，便会一传十，十传百，直至家喻户晓。布依族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存在，使得各种求子、保子的仪式在布依族现实生活中经久不衰。

再次，搭桥对民族道德提升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搭桥习俗产生于远古时期，由于存在很多无法忽视自然的力量，对于古老的民族而言，他们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神秘的大自然带给他们的考验，对日月、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对山川、河流、古树、巨石等自然物带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依赖与敬畏，认为自然对万物都有一种神灵在掌控，从而形成了潜在的多神崇拜意识。包括妇女会生小孩都是神的赐予，而非纯粹男人和女人结合的产物。于是乎，结婚没有小孩，就肯定是得罪了某位神仙，也就理所当然需要心理上的忏悔，行动上的补救，对神灵进行祷告和祈求，求得原谅并赐予。虽然这样的举动在现代文明中看似有些荒诞，但通过“神”对人的教育，认为只有在生活中行善积德才能修得正果，推行积极向善的思想和开展修桥补路等正能量的行为，对推进民族道德建设、惩恶扬善、弘扬正气有积极作用。❶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婚俗博物馆）

“滇黔锁钥”关索岭

文 / 胡应铃

关索岭，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东，俗称“关关上”，为关岭县城东面天然屏障，旧时为“关岭八景”之一“关岭接天”。

一

关索岭峰峦连绵，南北丛列，北起六枝特区郎岱镇，南迄县境断桥镇，全长50余公里，平均海拔千余米，主峰“太子阁”海拔1237米。相传诸葛亮南征时，蜀汉名将关羽之子关索率兵驻此，山岭由此得名。民间相传，关羽死后成神封帝，其子顺理称为“太子”。“太子阁”既是阁名，又是关索岭主峰名，在岭脊关丫口南侧。顶分两尖，尖端北面下10余米处有一岩洞，相传关索曾在此歇息，称“太子洞”，后在峰巅建阁祭祀关索，便称“太子阁”。永宁州维风书院山长李逢春诗曰：

登峰犹记汉将军，屏障滇黔共策勋。
岭峻曾无鸢踞地，山高自有客凌云。
松风竹月真娱我，石栈天梯屡唤君。
最要留心跻绝顶，前途佳趣久知闻。

关索岭是滇黔古道之咽喉要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辞海》注云：“关索岭，在贵州省关岭县东北，县名以此。周百余里，势极高峻，当

滇黔两省之通道，亦两省间之要隘。”《永宁州志》云：“滇南之岭，以关索名者多矣，然其险峻不若此。岂非滇黔之锁钥哉。岭南北横绝，东凡四十三盘，西凡九盘。一线鸟道，行者拟之蜀道之难，盖去天尺五焉。登而望之，罗列儿孙，众山皆小矣！”

明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三日，旅行家徐霞客抵达黄果树，观赏大瀑布后即登鸡公岭，穿越灞陵河大峡谷直上关索岭，对沿途所见作了较为详细而准确的记述：

“……逾而西，又一里，乃迤迳西南下，甚深。始望见西界遥峰，自北而南，屏立如障，与东界为夹，互相颉颃；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上，一下三里，从桥西度，是为关索桥。越桥，即西向石级上，其上甚峻。……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二里，遂陟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明末清初诗人吴中蕃有《关索岭歌》数十言，开篇即是“关索岭，四十三盘才及顶。行人初至北极关，只道前头路已尽……。”辽阳女诗人蔡琬康熙年间随其夫高其倬(署云贵总督)到过关索岭，亦写有“关索岭”诗一首：

山从绝域势遥分，天限西南自昔闻。
烽静戍楼狐上屋，风喧古木鹤惊群。

横盘石蹬危通马，深锁雄关冷护云。

叱驭升平犹觉险，挥戈谁忆旧将军！

关索岭群峰排列，悬崖成壁，隔灞陵河与东岸群山对峙，形成双岭雄峙之灞陵河大峡谷。峡谷深切800余米，母当河(郎岱河)自西向东横切关索岭，河水层层跌宕，从双峰口倾泻而下坠入峡谷，如蛟龙断壑，狂飙天落，形成三级相连、总落差为410米的巨大飞瀑，悬挂在西岸关索岭大山之上，喷云涌雪，气势磅礴，这就是著名的滴水滩瀑布。清人有诗赞曰：

飞涛直落势飞雄，崖壑争鸣震碧空。

映日常留千丈雪，为霖直借一帆风。

山腰玉练何年系，天上银河此处通。

不到匡庐观望后，哪知别有画图工。

关索岭及其周围遗留古迹甚多，且大多数与三国传说相关，有古驿道、灞陵桥、双泉寺、顺忠祠(关帝庙)、关索洞、晒甲山、诸葛营、孔明塘、孟获屯、鲍三娘山等，联系起来，几乎就是一部三国蜀汉南征的历史故事。

岭上现存古驿道一段，长约5千米，东起灞陵桥，西抵关岭自治县县城。驿道宽2~3米，两马并行有余。石级依山而铺筑，多为白石，每级高20~30厘米不等，陡缓相间。驿道历经千百年风雨磨砺，人踩马踏，已是光滑白亮，马蹄印痕深可数寸。关索岭古驿道始筑于秦代，史籍载“秦开五尺道”即此，迄今已两千多年，是贵州遗存不多而且是保存最完好的古驿道之一。

二

以这条驿道为主线，连接着几处重要的人文遗迹。

灞陵桥：亦称关索桥、关仙桥、通云桥、八里桥，横跨灞陵河上，为四孔石拱桥，长40米，宽5米，桥高20米，质朴古雅。桥东西两头各有古黄桷树一株，树高10余米，主干5人合围，枝繁叶茂，顶圆如盖，半覆水面，誉为“天沟凉亭”，亦是旧时关岭八景之一——“骑桥古木”。《永宁州

志》云：“跨灞陵河，在城东四十五里(当时城址在永宁)，一名关索桥，以在关索岭麓也；又名八里桥，以关索岭关口至桥八里也。桥左右各植黄桷树，盖千百年物。”

清庠生李枝青《晓行灞陵桥一首》：

野店茅檐接岩低，桥头古树护新堤。

鸡声晓唱关前月，好送征人过岭西。

灞陵桥始建于何时以无从考证，从桥石风化程度及桥头树龄来看，年代当为久远。《永宁州志》云：“《黔志》载，灞陵桥未详创始，道光十六年(1836)重修，匠人于旧石内得‘兴朝通宝’钱十余枚，大三寸许，重一两。查历史纪元，并无此二字年号，存以候考。”

自古以来，灞陵桥是滇黔道上第一要隘，给无数过往兵马商旅以便利之济，直至近代。民国二十三年(1934)修筑滇黔公路，将此桥维修作为公路桥梁之用。二十五年(1936)公路通车，灞陵桥又成为滇黔大动脉的险关。抗战后期，滇黔公路是后方通向国外运送抗战物质的唯一通道，日过汽车以数百计，由于过往缓慢，后在古桥下游3千米处修建了新灞陵桥，汽车分道而行。灞陵桥可以说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历史“功臣”，可惜，这座饱经沧桑的古桥，毁于1950年关岭即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关索镇镇长唐显达派人炸毁一孔，古桥从此废弃。

双泉寺：位于关索岭半山驿道北侧，由灞陵桥上至岭上十六盘处即是。“双泉”缘于传说。相传关索率兵越岭至途中，人困马乏，而岭上四处无水，加上天气炎热，将士口渴难耐。关索正愁无解救之法，忽然坐骑扬蹄掘土，一股清泉便从地下流出，众将士欢呼，马却堵住泉眼不让人汲水，还撒尿在泉水里，关索见之大怒，遂以刀靶戳地，又一股清泉涌出。这就有了有名的“马刨泉”(马跑泉)和“刀靶泉”。至明代，于此地建一寺，因泉而名“双泉寺”。该寺建筑为两房两厢，四周石砌围墙，八字石拱山门，门额镌“双泉寺”3个字。门内有长形水池，上架小桥，桥后建关圣殿，为单檐四

角回廊式建筑，殿内塑关羽、周仓、关平神像。关圣殿后隔天井即是佛殿及左右两厢。寺庙古朴典雅，环境清幽，昔日有僧人，香火旺盛。寺侧为“马刨井”，寺内为“刀靶井”，泉流源自山腰，透石而出，清冽甘甜，不枯不盈，终年长流，名传千古。

鄂尔泰(清雍正年间贵州总督)有《马跑泉》诗一首：

岭开传汉代，树老自何年？
寺出层云外，泉流古佛前。
落花浮涧水，飞鸟破溪烟
独坐幽篁里，悠然憩众缘。

双泉寺是“关岭八景”之一，誉为“半岭琼浆”。《永宁州志》“形胜·附八景·半岭琼浆”曰：“关索岭东偏有马跑泉，潏然仰出，嚼然不滓。行人至岭下十六盘而下，奔走背汗，到此一饮，涤烦消渴，沁人心脾，不异蓝桥琼浆也。乾隆己未(公元1775年)州牧善君长泰，即庙侧构凉亭，游者益众。假使陆鸿渐过而品之，行路正苦，香敬一瓿，正不知曰为天下第几泉矣。”

李逢春咏“半岭琼浆”诗曰：

蹶电追风战马来，三军休望岭头梅。
气冲牛斗双蹄健，水涌珠玑一鉴开。
泉脉讵输驼识得，天浆休使士休回。
长亭古寺陪仙境，留与诗人矢妙裁。

更有奇者，马刨泉不远处有一泉，深尺许，不盈不缩，而饮者必哑，故名“哑泉”，后盖以巨石，并立禁碑：“亘古哑泉”。田雯(清康熙年间贵州巡抚)有《哑泉》诗一首，借哑泉针砭时弊：

一窦沄沄碧沼连，直从石壁泻潺湲。
世情不欲多饶舌，拼得山腰饮哑泉。

明末贵州诗人谢三秀亦有《哑泉》诗一首：

人云哑者泉之忒，我云哑泉泉之德。
当此巧言如流时，何不一歇口常默！

马刨泉及哑泉，史籍均有记载。《永宁州志》“山川·关索岭”载：“旧志。山半有马跑井，相传索统兵至此，渴甚，马跑地出泉，故名。又有哑泉，饮之，能令人哑，

立石以戒行者。”《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述：“二里，有观音阁当道左，阁下磬石池一方，泉自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东下，是为马跑泉，乃关索之遗迹也。阁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为哑泉，人不得而尝焉。”

御书楼：位于关索岭岭脊关口中心驿道上，为圆拱城门式楼台建筑，驿道从楼下拱门穿过，因康熙皇帝亲笔书写“滇黔锁钥”四个大字悬挂于门楼之上而得名。

御书楼凌驾于城门之上，面阔三间，单檐四角，九脊筒瓦，檐角垂悬风铃，走廊为透雕花凤石栏。整个结构古朴别致，楼台临风而立，气势恢宏。御书楼西下不远处有关山城垣，即“二道城门”，直下抵关岭县县城。

清代初叶，随着中原与边陲在军政、商业等方面交流日趋频繁，滇黔古驿道作为唯一通往云南的大道显得尤其重要，朝廷对古驿道进行了规模维修。康熙皇帝玄烨对“关索岭”早有所闻，竣工之后，即题写“滇黔锁钥”四字，遣人送往贵州，赐赠贵州提督张文焕(同时题写“建牙统众”四字，张文焕镌刻于安顺提督署“御书坊”)，后制成黑底金字木匾。“滇黔锁钥”匾用楸木老树制成，长约1.5米，宽约0.8米，四个大字为阴刻，匾上方中部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印一方，左下角为“臣孙清彦拜书”等字。其匾为何是孙清彦所书？清初在山岭关口建城门两道，“滇黔锁钥”匾悬挂在二道门楼上，后门楼失火，原匾随同门楼化为灰烬。光绪年间重建门楼，由贵州提督赵德昌延请时署安顺知府、云南呈贡人、著名书画家孙清彦仿康熙笔迹书写此四字。重修御书楼时有碑刻记述其事。’

顺忠祠：即关帝庙，位于关索岭岭口古驿道北侧，紧靠御书楼，坐北朝南，前低后高。整个祠宇有高墙围护，四周林木苍翠，后山有古柏数株，右侧有泉水一潭。山门为牌坊式建筑，两边护栏刻俯狮石鼓。进入山门为一横向长廊，东上书楼，北进关圣大

殿。大殿面阔5间，进深10米，九脊重檐，青瓦屋面。神龛原供关索。后改供关羽。

大殿下，有黑底金字“神武一家”匾一方，亦是孙清彦仿康熙笔迹所书。西厢有厢房侧殿，为僧舍。上殿依山而筑，基高5米，面阔3间，进深9米，单檐五脊，前后分水，是佛殿。

顺忠祠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都督马烨创修。祠前道旁有古碑十数方，多为庙记及捐资德政。其中有一大碑《关汉将军庙碑记》，明嘉靖十年(1532)所立。碑文盛赞关索忠贞英勇，随诸葛南征，纵擒以攻心为要，不主杀戮，全凭对少数民族的恩德、诚挚取信于民。故这一带布依族、苗族中广泛流传他的故事，世代祭祀他。当地百姓若遇水涝、天旱、兵灾、瘟疫或家中有不平安之事，必前往祠前祈求免祸。明代状元、著名学者、诗人杨慎有《过关索岭谒忠顺祠》诗一首：

关索危岭在何处？猿啼鸟道凌青霞。
千年庙貌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
月棹西来武露布，天威南向阵云除。
行客下马一酹酒，候旌风偃寒吹笳。

又有清代著名诗人舒位《汉将军关索庙下作》诗一首：

鸟道青天上，将军百战来。
赤心先世上，白面少年才。
史阙千秋恨，山空一庙开。
书生惭橐笔，不记旧云台。

关索岭古驿道上这些文物古迹，经过历代兵荒马乱以及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

随着时代的进步，交通业的快速发展，关索岭古驿道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线贯东西，天堑变通途”的世界著名高架索桥，横跨在灞陵河大峡谷之上。然而，高入云天的关索岭，其雄伟的景象和浓厚的历史氛围使之成为一道永不消逝的壮阔景观，呈现在今人面前，远去的历史也将永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之中。正如清道光举人修武谟《关索岭》诗曰：

汉臣破虏辟雄关，
眼底全收岭外山。
战马功高谁第一，
万年烟祀白云间。

(作者单位：安顺市文化和旅游局)

(上接第69页)高，先进的施工机具不断涌现，多用隧道和桥梁的方式穿越千山万壑，基本消除了纵坡和弯道，使公路里程缩短，路面使用先进的高性能材料铺筑，道路宽大平顺，车辆安全，速度加快，驾驶舒适。2009年油小线就从图云关下飞凤山中用隧道贯穿了两千多公尺，在新见龙桥上游以南约七百米的龙洞河上凌空建起了一座跨度极大的现代公路特大桥沟通小碧乡与机场。2012年从东路高连山脉上往东打通黑垭口隧道，用高架桥的方式，又在见龙桥上游数公里上飞架一特大桥跨过龙洞河，往前连接大外环秦旗立交后，与厦蓉高速公路连接。自此龙洞河龙洞堡段就有了古今六座桥梁，这六座桥梁，一座比一座先进，一座比一座雄伟壮观，一座比一座技术含量高，民国年间修的那座三孔旧见龙公路石桥，早已不适应

现代交通运输的重任，息肩以后利用来作农贸市场继续为人们服务。至于古道上的那座古龙洞桥，在为人们服务几百年之后，早已成了历史古蹟，让人们通过它可以看出古贵州交通的艰辛，古道的艰难闭塞。

另外还有一座小桥在古龙洞桥上游的三岔河段上，这里景色优美，山青水秀适宜休闲，河段水体清澈，深浅适于游泳，来这里休闲游玩游泳的不少，市区游人都慕名前来，有人就到此修房建屋，搞“农家乐”庄园，每到夏日，每天游人络绎不绝，此桥就是2002年那时搞“农家乐”时修建，小桥架于河上，虽然粗糙，却也有些小桥流水的景致，随着龙洞堡区域的改造，此桥是否能够存在下去，就难说了。

(作者单位：贵阳市原人防工程处)

省城东大门前的龙洞堡

文 / 图 谷多林

龙洞堡，也叫龙洞铺，龙洞哨，距油榨街大约六七公里，它位于贵阳到湖南广西的要道上，是贵阳的东大门，是古代驿道上负责传递公文的小站，按明万历、嘉靖《贵州通志》，清《贵阳府志》所记，元朝时期为了公文的尽快传递，颁行铺递之法，铺属军事编制单位，派有铺兵，铺递初分巡警、急递，后来专事急递。此地因近旁有一呼为乾龙洞的溶洞，此铺也就因洞而称叫“龙洞铺”，因它是贵阳东大门驿道上的第一个递铺，故也有“头铺”之称。

明朝统一中国后，洪武帝（1368—1398）朱元璋在贵州等地实行“戍边军屯，移民建堡”的屯堡屯垦戍守措施，于是在这里设的屯堡也因龙洞铺或龙洞又被称为“龙洞堡”，龙洞堡隶属于贵州前卫下的千户所，贵阳有两个卫，一即贵州卫，一为贵州前卫，两卫共管一百多个屯堡，“堡”按字面解释“古时用土石磊成的小城”、“在冲要地点作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龙洞堡是其中之一。明时卫所塘汛也都是军事编制单位，专任沿线治安，保护商旅，递送文书。

这地面因之得名的龙洞，在老贵南路旁，距老街数百米，面向龙洞河，相传有人在此见到有龙经过，以后这洞就被人们呼为见龙洞，据有关遗迹来看，至少在六百多

年明朝嘉靖以前，仕大夫们就在洞内活动过，还在洞内留下摩岩石刻。洞壁高处有高约尺余宽约三尺的诗碑，是明“嘉靖庚子”（1540），落款“镇守贵州总兵□都督营道李章与贵州□□□史南充唐英”相互唱和的“游龙洞”诗碑，在碑旁还有距这诗碑六十来年后的明朝晚期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在该洞留下的“见龙洞”落款“万历辛丑岁（1601），泰和郭子章题”的题刻摩岩一幅，由此可以想见这方地面及其龙洞，明代就已很有些知名度。

明朝初期贵阳称叫“贵州宣慰司城”，建省以后贵州城才有了“贵州布政司城”的称呼，布政使司、宣慰使司与贵阳府县也都同时在贵阳城内同城办公，即所谓“土流并治”，其辖地：“府县管城北，宣慰使司管城南”，龙洞堡属宣慰使司辖地，明万历郭子章的《黔记》载道：“自南门官道十里至龙洞铺（注意此时的称谓），多通小路，四面皆夷，系乡宦私庄，此安宣慰地方”，同时明地方军事当局也在今天的图云关上和龙洞铺设有哨所，以作防卫，关于这两处哨所，《黔记》说：“关口哨（图云关），总甲一名，小甲一名，哨兵二十名，龙洞哨，哨长两名，哨兵三十三名，以上二哨委把

龙洞河上的“龙门”



总一员带铺兵一百名，团聚于龙洞哨，为一大哨防守”，以此，龙洞铺又有龙洞哨之称。

随着时代变革，时光的飞逝，明代屯田的屯堡今已演变为村寨，城镇，昔日的寨墙堡垒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明朝灭亡，清朝建国之后，撤卫并县，就将明时贵州两卫所属地与所设的新贵县合建为贵筑县，自此明朝的卫所屯堡哨戍的制度就不复存在了，但递铺还在。清朝取消哨戍以后，以驻军的塘汛代替哨戍防卫。对于元朝以来一直延用的铺递制度，随着清后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贵州巡抚贺长龄的“请汰铺递”，于是包括龙洞铺在内的贵筑县铺递自此悉数被裁去，历元明清三代的铺递遂告结束，堡”既读“保”也读“普”，“龙洞铺”的“铺”发音又接近“普”，几种发音好像都在民间普遍混用，而龙洞铺之名已被呼叫了五百年来，龙洞铺被裁结束，人们所呼的“铺”“普”也没人较真，与“保”的叫法含混地继续下来，人们书写行文普遍都是“龙洞堡”、“龙洞铺”，“龙洞哨”之名却好像没人喊叫了。只是现在的龙洞堡地域范围已扩展数倍数十余里了。

贵州是个山国，贵阳完全处在群山之中，铺上块石面层的贵阳古驿道出油榨街，向东直上图云关，道路在数公里长的树林中穿行，过了这片有纵横数公里宽阔，密密麻麻高刺青天的林区和山区以后，过了匹亚关、马跑井，再行数百米，前方就是贵阳城东的龙洞河了，河的东岸小山坡上是龙洞堡，只见深壑前横，两岸高差很大，壁立的岩岸上长满灌木野草，藤萝倒挂，深壑之中即龙洞河，此河有大地、大关山一带发源，流经小碧寡婆桥、猫洞石头寨、谷立、秦棋、黄泥哨等处附近来的两条水流和若干股小水流，在牛家田、木头附近共汇为一条叫三岔河的主河道后，就是龙洞河了，河道北上过了龙洞堡，再经阿栗、汪家寨、沁人谷、后所，沿途又接纳了几

条支流，在乌当麦穰来仙阁侧汇入南明河，东北而去注入乌江。此河道全流域宽窄深浅不一，沿河风光随途变化，在龙洞街见龙桥北侧河边有一山前横，岩岸似刀削斧劈，上有“龙门”两字摩岩，有民国间胡雨高落款，为龙洞堡一景，岩壁犹如一道屏风，挡住前方去路，河水到此转了一个弯北去，被人呼为阳仓河，再往前流过鱼梁河村，就被人们呼之为鱼梁河。

龙洞河在峡中行，图云关下来的古驿道也只能沿陡岸下到河边，驿道为官道，驿道与一般道路的区别，驿道都是用石块铺以道面，一般道路都是土路，没有石面。河上有石砌的古桥，此桥应该在有此古道时就建有，估计至少有六七百年，桥有多次维修增建过的痕迹，过了这座低矮的古龙洞桥，又沿着山坡的东岸前行，古道如一线羊肠陡上陡下，山坡之上就是龙洞堡。以前到处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就不是战乱年代，经过森林公园和见龙洞瓦琢坡地段，还有“棒老二，黑松林中跳出李鬼”的事发生。仅从油榨街出城后经图云关（关口哨）、龙洞堡、二堡、黄泥哨到与龙里交界的倪儿关，才十多公里地，沿途关山重重，高高的图云关与倪儿关，真有“高踞翠微颠，穿云欲到天”之势，还是省城周边就是如此，可见，要走出贵州不知还要经过多少艰难险阻，古时官道就随着这种“上则层霄，下则九渊，蔽日寻云”的山势蜿蜒，由于构筑条件原始，行进在这种道路上，任何车辆根本无法使用，唯靠人背马驮的那点原始可怜运输能力，就是那“四达的驿道”，由于山地的险恶，“行路倍难于他省者”，外面难进来，省内东西难运出去，物流不畅，省内丰富的煤铁矿藏和各种物资，除了自用，无法运出，完全封闭在这块土地上，等于无用，就是省内各地的人们也难与交流，也是贵州穷困的根源，自古以来给外界的印象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一个蛮荒化外之地，史志说贵州：“千里山川，险阻扼塞，僻处遐荒，孤悬可念，崎岖

民国时期修建的“怀忠桥”即所谓的“见龙桥”



万状，商旅不通”。由于山川险阻，运输困难，加上兵匪战乱，信息难通，使外地人对贵州的了解太少，贵州人也难以了解外界，与外界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隔绝的世界，传说夜郎王想了解山外的世界，问汉使“汉与夜郎孰大”，于是几千年来，就给贵州人背上“夜郎自大”的恶名。后人叹道：“古时夜郎非自大，实是封闭大山中”。可见贵州的闭塞程度，真是“黔道之难，更难于上青天”。

龙洞堡地处省城东部要道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周西成修公路时，将古驿道改造修建成了贵南公路，这条路西接滇缅，东出湖广而达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是从滇缅输送援华物资到前方的重要通道，在这个通道上，龙洞堡作为东大门，且不说见证了历史以来不知多少次重要历史事件，只说近代抗战时期最悲惨的难民大潮；1944年末日军侵犯湖南广西，另一路窜犯贵州，当时的贵州属“陪都”重庆侧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急到贵阳，调汤恩伯军队入黔堵截日军，调石觉军在贵阳南敞，沿图云关、茶店一线驻守，构筑工事，后来日寇到独山后退走，贵州免受了战火荼毒，但图云关上到如今还能看到其时所构筑战壕掩体的遗存。

就是那年的十二月，华东南华中以湖南、广西、黔东为主难民汇为一股，潮水般的涌来，“几百公里的黔桂路上，人如潮涌，昼夜不息，又值隆冬，严寒裂肤，道路结冰，三步两跌，人多路窄不够容足，则满山遍野而行，……擦肩接踵，随人进止，有日行五六里者，有日行二三十里者，哭声震天，怒骂不已，沿途乡村城市，居民逃空，肚饥无食，口渴无水，饥饿倒毙者，犹以小孩妇女死得更多，溃兵、坏人乘机抢劫，枪声响处，以为日寇追来，弃物逃命，衣物行李遍布路间，一家骨肉，分离四散……逃难中妇女生产者，亦复不少，伤心惨目，不忍卒述……自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底，才头十天，逃到贵阳难民约四十万人……”，好悲惨的一幅逃难场景，面对滚滚的难民潮，

处于公路上的龙洞堡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房舍被难民占宿，门窗家具多被毁取暖，难民潮过后，十室十空，直到解放初期这里都未完全恢复起来，大雨过后沿公路两旁不少地方，还有被雨水冲刷出来当年掩埋不少难民的森森白骨。

龙洞堡地区群山起伏，重峦叠嶂，道路崎岖，田土干瘦，昔时屯堡的寨墙堡垒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十九世纪中的清道光年间，龙洞堡包括“杉树林、马跑井，居民八十户”，才几百千把人，到民国年间，从图云关来的古驿道开始变成公路，公路上跑起了汽车运输之后，这片地区才开始得以发展，人口渐有增加，在龙洞堡古道边上的老街，公路边上又形成新街，但发展缓慢，贵阳县还在这里设置了龙洞乡，管理龙洞堡、黑坡、木头、马跑井、老李坡。及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小村镇，整片龙洞堡区域清冷萧索，人迹稀少。

区域内人烟稀少，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不知是否还有屯堡人的后裔，新街多居民，老街多农户，毕竟这里是贵阳的东大门，元朝以来几百年这里均有公所营盘设置，所以老街一片当时还残留不少雕饰过的房屋构件，和与砖木组建并有院墙围合的几重屋瓦宅院。龙洞堡地区盛产层岩，整个村镇可见木头构筑房架，就地取材以层岩片石作墙身护壁、隔断，或以石片垒墙，以石片盖作屋面的房子，也有不少土墙茅顶，用小树枝条编结作门，门上外糊牛屎作防风保温的原始草房茅舍，那些年代生活水平低，一般人家家用器具都极简单，然堂屋正中都供有“天地君亲师”和祖先牌位，古风犹存。

后来公路从汤耙关方向而来，在老街北侧过境，过往汽车的交通，靠公路形成的街区上，修起了站房邮

龙洞堡因此而得名的龙洞（见龙洞）



局，民居、商铺也向这路两边靠拢，服务设施相应增加，有几家小商铺卖点日常用品，卖点简单的饭食餐饮供路人消费。这片地区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再后来，机关、院校、厂矿、农场、畜牧场以龙洞堡街为中心，相继沿公路两端数公里的周边扩展起来，龙洞堡的地域也随之扩大，老街民居虽还杂乱，但多已变成砖混，砖木，外饰磁砖的小楼房，职工宿舍、高楼大厦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矗立，同时沿着图云关道路，形成了摩天村、水井湾、黑坡、木头村、马跑井等一个个居民点，行政范围更加宽阔。龙洞堡已是一个工农商学兵兼有的镇子，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区，到现在为止，这个区域常住人口已经超过数万，公路也随着街区化了，见龙洞路、园林路、机场路……的名称取代了过去过境公路的名称。近年来，随着贵阳几条射线道路的修通，一个新的居民区、临空经济区、食品工业区、旅游休闲区，文化区……的规划建设正在实施中，龙洞堡已不是一个村镇，可见不久的将来，一个现代化的龙洞堡新城将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伴随城镇改造，现在龙洞堡区域房屋完全征收，已拆成一片平坦的坝子）

说了龙洞堡的过往，也来说说龙洞河上的桥梁。马跑井到龙洞堡老街之间的古驿道上，隔着一条河，就是龙洞河，跨着这条河，河上的那座好像原为一孔，后又加建两孔的三孔古石桥，就是古龙洞桥了，估计这座桥至少元代修驿道的时候就架设在这里。根据桥身的材质和痕迹，可见几百年来它也曾多次扩建修葺过，现在看来它虽然是一座低矮，原始、古老的小桥，但它当年就是以它那不大的身躯，勾通两岸交通，承载了贵阳城东南驿运、人物流的重担几百年，它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了力量，立下了功勋，是一座劳苦功高最古的古桥。

到了近代，贵州兴起了近代公路，汽车运输与公路的通达才开始改变贵州的命运，但还是由于技术与建材的限制，公路基本还是在古道线路的基础上开拓，另行开辟

了一些盘山减小坡度适应汽车运输的路段，代替原纵向陡坡路段，以后，从油榨街、观音洞方向，沿图云关山区边沿，经汤耙关绕行，另行开辟了一条坡道较缓的新公路，在距原古道三百来米的龙洞河上，以当时的条件，还是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修建出两车可以并行，宽十一公尺三孔石砌称叫“怀忠桥”的公路桥，即所谓“见龙桥”，此桥桥身虽比原古桥长、宽、高了几倍，但还是低于高峻的两岸，因此这段公路与桥面呈马鞍状，那一时期的公路技术含量很低，路陡、弯道多，沙石路面，车过处，晴天卷起灰尘遮天蔽日，雨天溅起泥浆四处乱飞，路面经常被压得坑坑洼洼，车辆行在其间颠簸异常，速度缓慢，公路上每天都有专门设置的道班养护。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改造铺成沥青路面以后，路况和环境才有所好转。随着时代发展，工艺技术的提高，1985年交通部门另在离见龙桥北不远处新建了一座新见龙桥，新桥桥身提高与两岸公路齐平，桥面宽阔平坦，是为当时龙洞河上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跨度最大，高度最高，宽度最宽，很有技术含量，雄伟壮观的单拱近代公路大桥。但那时公路还是弯多路陡，汽车“老牙”，车速无法提高，运行缓慢，常为车匪路霸骚扰。

随着经济建设的提速，城市建设的加快，先进的建材和技术也不断更新，路桥隧道技术更臻成熟，机械施工代替了以前的人工人海战术，大型桥梁，大型隧道不断涌现，伴随机场的修建，市区通往机场的汤耙关机场路、贵新高速路也同时修建，在高高低低，高差很大的山区，逢山开洞，遇壑建桥，修出一条条平坦宽阔的高等级公路，于是机场路笋子林处龙洞河上又修建了一座现代先进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进入新世纪后，市政府决定扩建了三环十六条射线作这个城市扩容的部份框架，从上世纪末，贵州的公路建设更突飞猛进，设计标准和技术标准，建材与施工技术更不断提（下转第65页）

李侠公留学苏联的前前后后

文 / 图 李 芳

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和东征、北伐的胜利进军。其间，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干部、青年学生赴苏联，学习苏俄的革命理论和经验，掀起了一股留苏学习热潮。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及一些军事院校，为国共两党培训了一大批军政人才。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留苏人员中，贵州籍留学生先后有镇远周达文(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学员、列宁学院教员)、安顺王若飞(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学员)、谷正鼎(国民党员，中山大学学员，其夫人皮以书女士亦为中山大学学员)、谷正刚(国民党员，中山大学学员)、贵阳李侠公(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员)五人。中共留苏学生，有的回国后投身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及红色武装的组织和创建，有的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和杀戮，有的成为苏联“肃托”(即所谓肃清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及中共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中的牺牲品……

优秀的黄埔政工干部

李侠公(1899—1994年)，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1919年取得公费东渡日本，留学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4年春毕

业回国，在上海与留日好友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同年7月，应广东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贵州兴义人)之邀离沪赴穗，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1924年11月，经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成员周逸群、鲁易介绍，李侠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军事政治工作。先后担任军校教导团秘书、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

在东征军驻军汕头时，因交通员不慎遗失李侠公写给“君伟”(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的隐称)汇报一师官兵情况的信件，被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窃取，作为共产党“分裂”、“破坏”国民党的“证据”，在各报上影印散布。李侠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受到何应钦身边的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的寻衅围攻。李侠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作一番慰留的客套表

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时的李侠公



演后批准李的辞呈。李离开汕头直赴广东，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其公开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同熊雄、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党员组织和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担任《青年军人》杂志编辑。在广东大佛寺组织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时，李侠公作为大会主持人，受到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慧生(贵州贵定人，黄埔一期学生)开枪射击，捣乱会场。所幸会前周逸群等人早有预防，安排专人监视和控制“准备闹事”的王慧生等反共分子的举动，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机关工作期间，李侠公主要协助军委代理书记张伯简搜集整理新编番号的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官兵情况，做好调查和分析工作。国民革命军整装待发，中共两广区委的军事工作重心转入北伐军前线。同时，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将一些成为反共分子“攻击目标”的重要干部选派赴苏联学习，以回避国共两党激烈冲突，极力避免国共分裂。李侠公成为中共中央选派留苏学习人员之列。

1926年8月，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中共代表谭平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应邀赴苏，途经上海，中共中央还为邵力子召开欢送会，

欢送他退出共产党，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李侠公亦在上海搭乘国共代表团海轮直渡海参崴，再转乘火车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李侠公晚年回忆：“一天，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听取我工作汇报后，征询我是否愿意去苏联学习，我表示愿意去。这样，我就在1926年秋间离粤到沪。到上海后，首先见到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是在广州时就会见过的。我还经若飞同志的介

绍去会见陈独秀。见陈是我的请求，是出自于仰慕我们党的领袖这样的单纯思想。在上海，由于等候谭平山率领中共赴苏代表团的搭船机会，8月间才得启程，到达莫斯科大约是9月间。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是10月间”。

苦涩的风雨留苏岁月

李侠公留苏期间(1926年9月至1930年7月)，发生了中共留苏学生与“旅莫支部残余”及校方斗争的“东大学潮”罢课请愿、与陈绍禹“宗派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肃托”背景的影响，许多当年参与斗争的当事人对此段苦涩的留苏生活讳莫如深。在长达近四年的留苏生活中，李侠公在其《简历》中记述：“入校(东方大学)后，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人达同志指定我作旅支宣传部长，并走出校外作些华侨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1928年4月间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1930年夏间，中共驻苏代表团决定派我回国，8月间到达上海”。对其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敏感人物，简而隐之。根据80年代后出版的马员生《旅苏纪事》、陆立之《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等史料的公开出版，人们才对这一时期留苏学生纷纭复杂的内部斗争情况有所了解。

莫斯科东方大学(简称东大)，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专门培养训练苏俄东部少数民族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革命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1926年至1929年间，东方大学的校长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曾担任过苏联驻波斯大使的舒米亚茨基。东方大学中国班最早的一期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周达文等人，第二期学员有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童庸生、马员生、张际春、李富春、吴季严等中共党员。由于苏联教师不懂中文，且不习惯称呼中国人的姓名，为方便起见，校方要求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一个俄文名字作为代号，周达文取名“丘贡诺夫”，李侠公取名“罗蒙诺索夫”(俄文名：Ломоносов)，童庸生取名“奥斯特

李侠公
《简历》手稿

此图为一手稿，内容为李侠公在苏联期间的工作经历。文字为繁体中文，部分文字被圈出或划线。内容大致如下：
 1. 1926年8月，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中共代表谭平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应邀赴苏，途经上海，中共中央还为邵力子召开欢送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2. 李侠公亦在上海搭乘国共代表团海轮直渡海参崴，再转乘火车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3. 李侠公晚年回忆：“一天，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听取我工作汇报后，征询我是否愿意去苏联学习，我表示愿意去。这样，我就在1926年秋间离粤到沪。到上海后，首先见到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是在广州时就会见过的。我还经若飞同志的介

洛夫”(俄文名:Остров),马员生名“毕托贺夫”。有的留苏学生的俄文名字沿用了许多年,如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

中共旅莫支部先在东大成立,这是从西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旅法支部和旅欧支部学来的。因为学校中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懂中国话,认为中国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也无可。李侠公入校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王人达(湖南浏阳人,留法勤工俭学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调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后,由武胡景(又名武怀让,河南孟县人,中共党员,1924年夏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接任支部书记,旋即东大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学生的管理由东方大学支部局负责,中国班支部委员会书记由东大支部局指派俄人韦尔特纳担任,武胡景仍任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会成员多为没有中国革命经历的留欧学生,拿着高工资养尊处优,工作脱离实际,沿袭前旅莫支部的遗风:一是反对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理论,视要求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员为“学院派”,进行指责和批判。二是家长制作风和党内生活中不谈政治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相互揭发,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全是生活琐事,他们被学员们戏称为“旅莫支部残余”。同时,东大校方教学内容、课程安排及教材的选用,完全脱离中国的教学实际,对学员们提高理论素质、解开大革命失败之迷惑等没有实际帮助。对学员们提出改进教学方法及内容,校方置若罔闻。至1927年10月,有三百余名来自国内斗争第一线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进入东大学习,这批学员留学的目的希望在苏联学到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斗争技能和武装斗争经验,学以致用,实现救国图强之理想。东大校方的教学及中国班支部的所作所为,让这些学员大失所望。作为支部委员的李侠公,决不赞同校方及支部委员会的作法,并站在广大同学一边,对支部委员会提出严厉的批评。1927年暑假期间,在国内资历较高的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等人的号召下,一百余名东大学生列队游行,前往共产国际总部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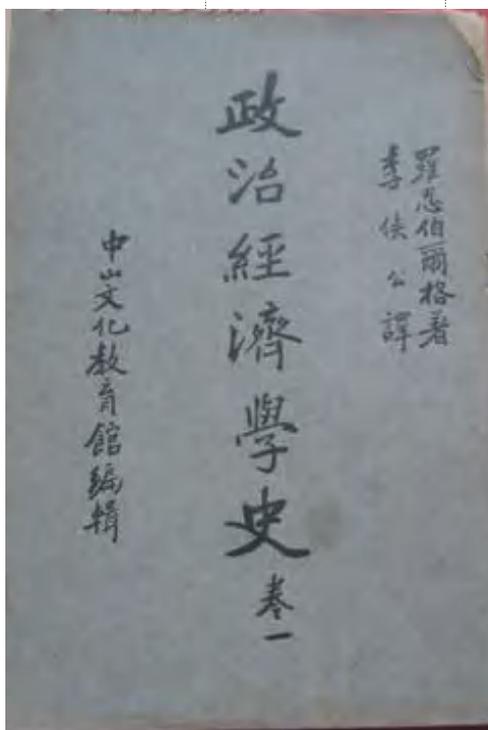
愿,要求东方大学对课程进行修改和对中国班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改组。这就是震惊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东大学潮”罢课请愿事件。

“东大学潮”中的学生领袖朱代杰,四川成都人,南洋大学毕业,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鲁易,江西黎川人,幼年随父移居常德,早年留学日本,后留法勤工俭学。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侠公的入党介绍人;学潮中的积极分子罗汉,湖南浏阳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在琼崖经陈公培、鲁易介绍入党,曾担任过《青年军人》发行股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具有较高地位及威望的中共党员,且有与国民党右派及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斗争的经历。

1928年1月20日,共产国际组成东大冲突调解委员会,由联共中央宣传部委派施坦作为工作组组长,到东大进行调查,召开三次全体学生(三百多人)大会,听取留学生们的诉求,并提出处理意见。第一次学生大会由李侠公、童庸生、马员生等人进行现场发言,朱代杰到中山大学请人将学生们的意见译成俄文交给工作组。第二次学生大会,由施坦主持,宣读解决东大学潮方案及措施。坚持中国班党支部在东大党委(支部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因而会后应当改进。然后,让学生们对工作组提出的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大家听后,全场哗然。李侠公在会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大家说:“大家不同意工作组的方案,表决时可以表示,但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中央。因此,不赞成时,只能投怀疑或不同意”。会场安静下来后,施坦宣布表决,先问赞

李侠公

1936年翻译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史》



成的，举手的东一个，西一个，不过二、三十人。次问反对的，因李侠公有言在先，举手的只有几人，但马上放了下来。后问怀疑的，全场哗然一片，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学生大会否决了工作组的方案，工作组吃惊地匆匆宣布散会。2月27日，联共中央组织局听取施坦工作组的汇报，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一、解除东方大学党支部书记韦尔特纳的职务，将支部主要负责人武胡景、黄士嘉、宗锡钧、竺廷章开除，将示威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鲁易、李侠公、朱代杰、贺声洋、马员生开除。二、批评舒米亚茨基的失职错误，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和组织分配处加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管理。第三次学生大会先后分别在东大中国本班及军事班召开，仍由施坦主持。在东大本班只是增加说明中国班支部的缺点和错误；在军事班，才宣布了开除李侠公、朱代杰、鲁易、马员生、贺声洋(马员生之说为童庸生)五人的决定。

1927年末，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李侠公、朱代杰、鲁易、马员生等被东大开除的五名学生在莫斯科找到中共代表团的向忠发、李震瀛，说明东大大学潮的起因及其处理结果，要求代表团为其办理回国手续，回国在白色恐怖中参加革命工作。李侠公、朱代杰在国内就与向忠发熟识，向忠发、李震瀛亦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东大大学潮的具体情况。1928年1月23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马上改革东方大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加强党的领导、改组东大军事班。这封信与李侠公、朱代杰等东大学生的请愿诉求相一致。向忠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协商，将东大开除的五名学生领袖继续留在苏联，转入他校学习。不久，朱代杰、马员生

转入列宁学院。3月，李侠公、鲁易等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实际上取消了对李侠公等人的“处分”。随后，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中山大学，并将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2月停办)。“东大学潮”事件，为留学生中的陈绍禹(王明)宗派集团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发现、扶植、重用创造了条件。学潮中的李侠公等几位学生领袖及部分积极分子，亦为后来陈绍禹宗派集团所排挤和打击，在苏联“肃托”、“清党”系列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审察，马员生乃至受到关押审讯。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又称军政大学)，全称为“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1927年设立中国班，第一期学员有朱务善、蒋经国、傅钟、肖劲光、李特等，分别为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基辅军官学校、红军军事学校转入。1928年3月，李侠公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中国班第二期学习，与鲁易、孔祥鲁、董良史、李秋萍等成为同期同学。因学校教学全用俄文俄语，李侠公转入时曾得到同学蒋经国的辅导，并结下了私人情谊。1929年6月，转入列宁学院的朱代杰、马员生到列宁格勒参观、实习和工业考察，曾到军政学院看望李侠公、鲁易等被东大排挤出来的同学，带去中共六大文件，转达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精神，并交换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李侠公离开中国留学生聚集、政治风波迭起的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后，谨言慎行，专心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日后翻译罗恩格尔伯《政治经济学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免去卷入留学生中的“托派”风波和苏联“肃托”灾难。但在苏联1930年的“肃托”运动中，马员生因“交代思想”而被认定为“托派”分子遭受“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审问和关押。在苏方人员的审讯当中，让其交待与李侠公的接触情况，意图将李侠公列入“托派”嫌疑之列。朱代杰就是因“托派”嫌疑开除党籍而遣送回国的。

留苏期间，李侠公与孙冶方(中山大学翻译)、罗汉(东方大学学员)等留苏同学友善，以

1936年3月李侠公、姜曼薇夫妇摄于上海



至后来成为密友，与贵州籍学员周达文、王若飞有所接触或交往，而与国民党籍的谷正鼎、谷正刚兄弟(二人1927年8月回国)的交往未见任何记载。直至晚年，李侠公还有嗜好俄式黄油、烤面包，喜唱俄罗斯民歌等，尚留有苏俄生活之依恋情怀。

杰出的党外民主人士

1927年4月16日，已到达苏联留学的李侠公，作为“共产党首要”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即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1930年8月，李侠公由苏联回到上海，由党组织安排在四马路的一家旅馆，学习党内的一些文件，等待分配工作。因在旅馆迎面碰上国民党特务王慧生(广东大佛寺开枪射击李侠公的那位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李急由后门避走，不能再回旅馆居住，当时又没有准备失去联系后新的联络方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约两月之后，李侠公在大马路碰上当年的黄埔学生、中共秘密交通员陈赓，告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及化名和居住地。三天后，陈赓派人与之接头，自称是江苏省委的人送来20元生活费后，竟未再来，联系再次中断。李侠公因通缉在案，不能在公众场所露面求生，以免被国民党特务及中共叛徒认出。李侠公在流浪上海街头时，曾与一家书店发生“窃书”纠纷，被英国租界巡捕房拘押，因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旋被释放出狱。在身患重病，身无分文，万般无赖的情况下，李侠公只有向其上海兼任招商局总办的兄长李仲公(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时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求助，得到其兄资助而驻进医院治疗。在医院又遇上同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孙冶方，病愈后同孙一道去孙的家乡无锡教书求生，后曾匿居于李仲公在苏州的家中。

经与孙冶方相商，李侠公将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交由其兄李仲公修改审订后，以李仲公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成为国民党政坛及广大爱国

知识分子率先发出的抗日先声。李侠公与中山文化教育馆签约，同孙冶方一道赴日本东京，闭门译著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教本——罗忍格伯《政治经济学史》(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发行)，以著述为生。1935年，李侠回由日本回国，在无锡、苏州之间过着流亡的“打单”生活，后经孙冶方三嫂介绍，与上海道南小学教师姜曼薇相识相爱，于1936年11月在苏州结为夫妻，相伴终身，白头偕老。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侠公在上海遇见留苏同学罗汉(曾为早期的中国“托派”组织骨干)，两人结伴到南京，找到中共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要求恢复中共党籍及安排工作，1937年8月与罗汉一道赴延安，行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林伯渠、王若飞的热情接待，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周恩来推荐，李侠公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将)，后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为郭沫若)。留苏同学朱代杰，回国后参加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活动，由政治部长陈诚推荐，亦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总务厅长。李侠公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担任谭平山等人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成为一名杰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民主人士。^①

(作者单位：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

参考文献：

- [1] 马员生.旅苏纪事[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 [2] 陆立之.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 [3] 李杰群、李杰明.朱代杰传[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4] 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M].孙冶方//关于中共旅莫支部.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6] 彭军荣编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 [7] 李侠公.入党申请书[Z].手稿本.1983

马员生著《旅苏纪事》

彭军荣编著《红场记忆——中共早期留苏档案解密》



红色特工宋良诚的一段“枉事”

文 / 图 吕金华

1927年7月，贵州瓮安人冷少农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剿共军前线指挥、湘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何应钦身边潜伏下来，公开身份是何应钦的军政部秘书，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军事情报中心负责人。1928年底，参加过武昌起义的绥阳人宋良诚来到南京，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收编的黔军第121师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冷少农与宋良诚两位老乡在南京相遇，成为同乡好友，后来冷少农经过考验将宋良诚发展为中共党员，协助他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间，以冷少农为核心的地下工作者们通过各自的渠道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经钱壮飞、李克农转手送到周恩来手里，为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幸的是，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冷少农、宋良诚等一批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由于冷、宋等人坚贞不屈，挺过了敌人的种种酷刑，最终于6月被杀害在南京雨花台。至今，在《当代南京人物大典·英烈卷》中还收录有他们的名字和简介。

最近，笔者在查阅民国史料时，意外读到一本民国《军政公报》（第一百〇三号），在附录中发现一份关于宋良诚的刑事判决书，揭开了一段宋良诚的“枉事”。该

判决书全文如下：

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判决书（法字第七六五号）

判决被告人宋良诚，年二十五岁，贵州绥阳县人，住绥阳县城内，军官补习班学生。右列被告人因被告杀人未遂一案，经本部军法司简易军法会审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宋良诚无罪。

事实：

宋良诚前在第十师驻京通讯处帮办副官事务嗣，经该处主任陈玄秋将其取消，命熊养吾接充宋良诚，以陈玄秋、熊养吾均系孙香亭之至好，疑其从中唆弄所致，对人无后言，事为孙香亭闻知。十九年十月十日下午五时三刻，孙香亭自江苏电政管理局公毕，乘坐自备人力车回家，于行至润德里西口，被人用手枪自后狙击，中而未死，当命车夫王振才追赶凶手已经不及，亦未见其形状，仅闻诸行人谓有半大小孩子手持数寸长之黑物跑去。事后，经警厅侦探长及第二警察局长前往调查，追询与孙香亭结有仇怨，或比较可疑之人，由孙香亭之弟孙季星及熊养吾代答，因孙香亭向无仇人，乃述及平日稍有意见之人，宋良诚亦在被述之列。经第

宋良诚



二警察局派巡官郭玉秀、服务员黄钟池往宋良诚所住之东莱旅馆检查，以宋良诚对该巡官所言，与调查所得有不符处，认为不无嫌疑，即将拘送警察厅，转送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处侦查，复以宋良诚系属军人，转解到案。

理由：

本案警厅认被告宋良诚不无嫌疑之点以：（一）、该被告及茶房蒋学仁于出事当夜对巡官郭玉秀等所称出入时刻，与卫戍司令部稽查队所称（因该被告自称日间均在卫戍司令部稽查队，故该巡官等当夜前往该队调查），及该报告在第二警察局所供不符；（二）、该被告羁押第二警察局时所致友人杨英荣、龙方啸等之函嘱，各于其当日出入时间特别注意，不无串证情形。查（一），该被告与茶房蒋学仁当夜所称出入时刻，系据巡官郭玉秀及服务黄钟池之报告，无论该巡官等当夜果有是言，然据该巡官等在本司供称，当夜系当作检查旅客，调查并未说明查案等语，则该被告等视为通常查夜，长警向其问话认为无关紧要，随便置答亦属恒情，自不能据此为犯罪唯一证凭。该巡官等所报情形既不足凭，而该被告在第二警察局所供“当日上午出门，二时回栈，四时半以电话向友借钱，五时半收到信洋，六时半再行出门”，迄今并未翻异，且与卫戍司令部稽查队当夜所称“宋良诚于四日下午七时许到队，直到夜间十二时回栈”，及茶房蒋学仁在本司供“一点钟出去，三四点回来，到六七点又出去”各语均无矛盾，自不能以所称时刻不符相责难；（二）该被告被拘第二警察局后，已知为杀人案所牵涉，则对于可以为其作证之友人请其对于该被告当日行动之时刻特别注意，原属正办，虽该被告致其同住之杨英荣一函，有“前天十二点钟出门，二点钟回寓后，六点半外出的，一一记着，勿忘”之语，不无串证之嫌，但据该被告所述经过情形，可以作证者不止杨英荣一人，其余如茶房蒋学仁、友人龙方啸（即该被告以电话向其借钱之人）均属重要人证。该被告既本以出入钟点函告而其所称亦均大致相符，且该被告自二时回栈，至六时半外出，中间在旅馆之

动作并未预行函告。而据杨英荣所述亦与该被告所供相仿，其非出于事后串饰，已可想见至其同时致龙方啸一函，只说“我那天四点半电话借钱，你何时派人送钱来的，请你勿忘为感”，其非串供尤为显明。依此观察，该被告所称当日出入时刻既难认为不符，又无串证情形，而出事时间为当日下午五时三刻，复经上述各证人证明，该被告正在旅馆，且经第二警察局当夜派员前往检查，并未搜获可疑证凭。即被害人孙香亭亦称（由其弟孙季星代行到庭陈述），枪杀之事不能断定是宋良诚。况该被告与孙香亭并无重大仇恨，仅因所充第十师驻京通讯处帮办副官被取消时，疑系孙香亭所为，稍有意见，更无将其致死之必要。本案犯罪嫌疑认为不能证明，自应予以宣告无罪。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判决

简易军法会审审判长邱毓楨印、军法官吴冰印、军法官麦廷彦印、书记官郭作民印
本件经核对与原件无异，特为证明。书记官郭作民

这次“枉事”，使宋良诚遭受了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所幸的事“无罪”释放。至于是谁作的案，当时没能查清，现在就更是无从弄清了。但令人叹息的是，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红色特工，被白白浪费掉了四个多月为党工作的宝贵时间。更为令人痛心的是，宋良诚出狱一年左右，又遭叛徒出卖，二次入狱，三个月后竟被敌人枪杀于南京雨花台，年仅二十七岁。^[文]

（作者单位：绥阳县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 [1] 薛友津.残酷美丽冷少农烈士传[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 [2] 谢崇祿、范祖贵.冷少农传[M].雨花台烈士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 [3] 军政部陆军署军事判决书(法字第七六五号)[J].军政公报.第一百〇三号附录.1930(民国二十年): 110-113